

55712/
477

苏联的社会变革

鲍里斯·迈斯纳主编



供内部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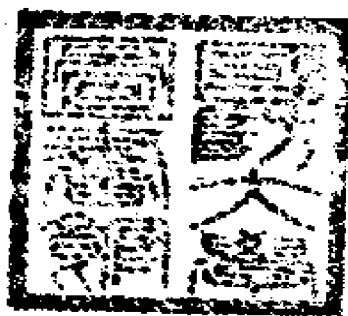


苏联的社会变革

俄国走向工业社会的道路

〔西德〕鲍里斯·迈斯纳主编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部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ocial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Russia's Path toward an Industrial Society
Edited by Boris Meissner
Translated by Donald P. Kommer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2

原著以德文出版。本书系根据美国诺特瑞·达姆大学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英译本转译。

苏联的社会变革
俄国走向工业社会的道路
〔西德〕鲍里斯·迈斯纳主编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5印张 131,000字
1977年1月第1版 197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2·185 定价0.52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1963年6月，西德东欧事务协会举办题为“俄国的社会变革”的第一次社会学讨论会。会上提出的一些论文，后来经过修改补充，汇集成《苏联的社会变革》一书，于1966年在西德出版。这里译出的是其中的三篇文章。

这三篇文章主要论述苏联怎样从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着重分析苏联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种种政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指出今日的苏联已蜕变成为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戴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因此，他们不仅混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同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当权时期的本质区别，甚至污蔑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反之，他们对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种种事实却揭露得很不够，甚至把赫鲁晓夫采取的一些措施说成是“进步”的。

尽管本书的观点十分错误，但作者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各个时期的政策演变及其造成的社会后果，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且引用了相当多的材料说明苏联阶级的分化、工资差别的扩大、等级和特权的形成及发展、教育的提高同阶级分化的

关系,等等,对于研究苏联怎样变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原著为德文。中译本是根据 1972 年美国出版的英译本转译的。

目 录

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社会变革..... 鲍里斯·迈斯纳	(1)
一、苏维埃社会的演变	(1)
1. 革命和军事共产主义(1917年—1921年)	(1)
2. 新经济政策(1921年—1928年)	(8)
3. 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1928—29年到 1938—39年)	(15)
4. 战争与后期斯大林主义(1939年—1953年)	(32)
5. “新方针”与赫鲁晓夫主义(1953年—1964年)	(49)
二、苏联的社会结构	(63)
1. 形式上的苏联社会阶级结构.....	(63)
2. 新的工人阶级.....	(84)
3. 集体农庄农民.....	(92)
4. 职员和知识分子.....	(97)
5. 苏联的社会阶层分化.....	(117)
6. 苏联阶级结构的真相.....	(130)
三、小结和展望	(143)
苏联的教育政策和社会结构..... 奥斯卡·安韦勒	(145)
一、从社会学角度对苏联教育的分析	(146)

二、1917 年后的苏联教育：它的平等——	
民主时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	(148)
三、在斯大林干部政策下的社会分化	(156)
四、苏联全体居民的教育水平和社会结构	(160)
五、从社会学角度看赫鲁晓夫的教育改革	(166)
六、现代社会的教育在苏联的变种	(178)

从社会学角度看苏联经济政策的影响

.....	卡尔·C·塔尔海姆 (181)
-------	-------------------

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社会变革

鲍里斯·迈斯纳

一、苏维埃社会的演变

1. 革命和军事共产主义(1917年—1921年)

俄国革命主要根源于旧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虚弱。^① 这种虚弱——撇开战争条件不谈——是1917年2月成功的革命后俄国自由主义者所以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和巩固他们的胜利的主要原因。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都提倡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不能阻挡当时在策略上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取得最后胜利。

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坚持的急进的社会革命，确实是符合激进化了的群众的愿望和期待的。他们利用和驾驭被革命解放出来的基本社会力量，就能挫败那些以沿着西方民主路线

^① 见C·E·勃拉克，《俄国社会的变化》(1960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英文版)及K·塔尔海姆，《苏联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第1版(1962年科隆德文版)22页及以下；又见K·H·罗夫曼，《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社会变革》(原收入本文集，本书未译出。——译者)

去改造俄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为主要目的的对手。

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少数派夺取了政权，这是在苏维埃的合法斗争的土壤上培育出来的。^① 但是塑造新政权的主要是布尔什维克中的职业革命家，其中大部分属于旧俄知识分子的激进派，而并不是被认为真正是工人和农民代言人的那些人。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被用来作为创建苏维埃国家和社会的基础。^②

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在俄国确实发生了涤荡一切污泥浊水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按照从经济上的考虑和强权政治出发所制定的决策，在分成的若干发展时期或阶段中进行。^③

在以革命和军事共产主义为标志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④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人们对立和剥削的根本原因。对他来说，废除私有制是建立一个没有统治者因而也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使人的个性在自由与平等的最适宜的情况下得到发展。^⑤

当列宁把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下并废

① 见G·冯·劳奇：《布尔什维克俄国史》（1955年维斯巴登德文版）91页及以下。

② 见B·迈斯纳：《苏维埃民主和布尔什维克党专政》，载R·列文塔尔，《社会变迁中的民主政治》（1963年柏林德文版）153页及以下。

③ 关于苏联经济政策的社会影响，见塔尔海姆收于本书中的一文。

④ 见B·迈斯纳：《进步思想和社会改造》，载布克编的《进步的观念》（1963年慕尼黑德文版）107页及以下。

⑤ 见G·华根勒纳：《卡尔·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建设》，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1卷（1961年）249页及以下。

除市场经济时，他自己就是以马克思的这些基本观念为指导的。^①他把这一点看做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达到马克思所要求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最好办法，从而也是缩小俄国同西方工业发达社会之间差距的手段。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必须消灭十月革命前掌权的上层社会阶级。在这些所谓“剥削阶级”中，有城市的大部分居民（工业人员、商人、房产所有人、文职官员等）以及地主和富农。这些“资本家”阶级在1913年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九，当国家进入国有化经济时，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了；因此，这些人生活的基础也被剥夺了。1918和1919年，所有工业、金融、贸易和运输企业连同所有住宅和土地的私有财产都国有化了，同时地主和大多数大农场主的地产也都在农村无产阶级中间分掉了。继承私有财产的法定权利被废除了，1920年小商业也国有化了。

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结束时，作为把革命前上层社会阶层拉平的这种初步尝试的结果，这些阶层仅存的成员都是那些宁愿降低他们的地位而侨居国外的人。1918年夏，随着劳工权利的逐步受到限制，有计划的工业国有化付诸实施了。到1921年1月1日，大部分重工业包括五千八百三十四家工厂都国有化了，^②这就为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1918年夏季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机会来制订强有力的社会平等政策。列宁想要给普通工人固定的收入，同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相等。内战和西方盟国封锁所造成的经济灾难，有助于把这个国家在社

^① 见塔尔海姆，前引书25页及以下；H·劳帕赫，《苏联经济史》（1964年赖因贝克福德文版）34页及以下。

^② 见H·冷培，《苏俄工业企业国有化的发展》（1928年柏林-布勒斯劳德文版）109页。

会上拉平。一种普遍平等的情况终于实现了，不过是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上的平等。

可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开始出现了一种相反的趋势，这对了解苏联以后的发展是重要的。由于城市食物的供应情况，产业工人的人数减少了一半（1917年为三百万人，1920年到1921年为一百五十万人），同时职员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1913年为一百五十万人，1920年为二百四十万人）。①

职员大部分来自公民权利已被剥夺的过去属于上层社会阶层的成员。仅次于列宁的托洛茨基，极力赞成雇用资产阶级“专家”。② 早在1918年3月28日，托洛茨基就曾说：

“这些技术员、工程师、医生、教师和过去的官员，象我们那些闲置着的机器一样，是我国人民拥有的国家财富。如果我们要解决困扰着我们的许多基本问题，就必须迫使使他们去工作……”。③

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在托洛茨基曾对其创立起过主要作用的红军中，1921年有百分之三十三点七的指挥员是由过去沙皇的官吏和军官所组成。④

在农村中，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农业革命⑤分两阶段进

① 见J·彼得罗夫和P·彼得罗夫，《苏联经济发展》（1926年柏林德文版）69页及F·朴洛克《苏联计划经济的试验，1917至1927年》（1929年莱比锡德文版）105页。

② N·I·卢钦科，《苏联知识分子》（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5页；W·霍夫曼，《苏联工人状况》（1956年柏林德文版）492页。

③ 列·托洛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23年汉堡德文版）133页；霍夫曼，前引书492页。

④ 卢钦科，前引书5页。

⑤ I·P·基姆，《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发展》（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

行。首先,把大部分没收来的土地分配给个体农民使用。

我们常常听说,革命的结果增加了一亿五千万公顷以上的可用农地,同时普通农民获得了过去耕地的百分之九十七。^①苏联的统计数字并没有证实这种说法。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的报告,沙皇俄国的农地(按1939年9月17日苏联的边界计算)总面积为三亿六千七百二十万公顷。^②这些土地面积中,二亿一千四百七十万公顷(占百分之五十八)已由普通农民在耕种。^③在这个数字中,八千万公顷以上的土地在富农手里。^④余下的一亿五千二百二十万公顷(占百分之四十二)^⑤,其中六千一百万公顷大部分在贵族地主手里^⑥,而九千一百万公顷属

① 见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卷,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43页;苏联中央统计局,《苏联国民经济,统计汇编》(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97页;A·约各夫,《苏联国民经济及其问题》(1929年德莱斯登德文版)102页;O·奥哈根,《农业》,载G·多帕特,《红色经济》(1932年哥尼斯堡德文版)98页。

② 《苏联》〔苏联大百科全书特辑〕(1959年莱比锡德文版)774页。根据《苏联国民经济》97页,这个数字是三亿六千七百万公顷。又见柯切托夫斯卡娅,《苏联的土地国有化》(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146页。

③ 《苏联》774页。根据《苏联国民经济》,这个数字是二亿一千五百万公顷,因而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二。可以假定,除了1907年在俄国欧洲部分四十五个州的那些农民村社土地和农民的私有地产合计达二千八百七十万公顷之外,这个数目还包括由地主和国家出租的土地在内(1917年共有三千八百八十万公顷左右),但哥萨克的土地不计在内。

④ 《苏联国民经济》97页。

⑤ 《苏联》774页。根据《苏联国民经济》97页,这个数目是一亿五千二百万公顷,因而占百分之四十一一点八。

⑥ N·奥因诺斯基,《俄国经济地理概要》105页至109页;A·约各夫,《苏联国民经济及其问题》102页。地主的地产中还包括出租土地在内。在俄国欧洲部分四十五个州中,1907年贵族地产计达五千二百二十万公顷;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五十个州中,1905年商人、企业家和小资产阶级的地产计达二千二百三十万公顷。

于国家、王室或教会所有。^① 这部分地产的极大部分早已归并国家，^② 而大地主拥有的地产则主要分给农民终身使用。因为革命后个体农民耕种着二亿六千五百万公顷的土地，^③ 真正转交给他们的可耕地只有五千万公顷（百分之二十三点二）。^④

对于从城市大量移居农村的八百万人口来说，这种增加是不足以满足他们对土地的渴望的。^⑤ 每个农民平均增加的土地不到半俄亩（一俄亩等于一点零九公顷或二点七英亩）。^⑥ 农业革命的第二阶段在1918年夏秋季进行，当时布尔什维克政权没收了富农拥有的五千万公顷土地，将其分配给农民。^⑦ 同时旧时村社的土地也被没收，土地被重新分配。

① 这个数字包括军队和自治机关（城市等）的地产在内，这类地产在1903年俄国欧洲部分五十个州中总计有六百六十万公顷；大概也包括哥萨克的地产在内（1905年为一千五百八十万公顷）。1905年，俄国欧洲部分五十个州里属于教堂、修道院和神职领导人员的地产总计有三百二十万公顷。国家和王室的地产大部分是森林土地，只包括有限数量的农业可用地。

② 哥萨克土地不包括在这个数字内。

③ 这个数字来源于苏科洛夫：《苏维埃政府的农业政策》（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德文版）69页。

④ 见O·席勒：《苏联的农业制度》（1960年杜宾根德文版）14页。他虽然不是从这些统计资料着手，但他也承认这个数字。他的估计是以苏联的报告为依据的，即1920年11月1日俄国欧洲部分三十六个州增加的数量达到二千三百万公顷（百分之二二点六）。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参阅H·劳帕赫：《苏联经济史》38页和A·约各夫：前引书103页。其中讲到俄国欧洲部分二十九个州经过苏维埃变革后，结果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

⑤ 见S·N·普罗科波维奇：《苏维埃制度下的俄国国民经济》（1944年苏黎世—纽约德文版）63页。

⑥ 见约各夫，前引书103页；B·布鲁茨库斯：《俄国的农业发展和土地革命》（1925年柏林德文版）151页。在俄国欧洲部分二十九个州，革命前每人平均的可用土地为一点八七俄亩，革命后为二点二六俄亩。这个〇点三九俄亩的差额，相当于百分之二十一的增长率。在乌克兰，增加百分之四十左右。

⑦ 见梁士琴科：前引书第3卷43页。

村社地产的重新分配扩大了小型农户数，从百分之五十七点六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点一，现在每一农户拥有约四俄亩的土地和一匹马，而拥有十六俄亩以上土地和四匹或更多马的大型农业企业实际没有了。^①

农民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政策——强迫征收农产品以及通过组织生产合作社或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努力。^② 由于农民反对这些改革，农业产量大大下降了，结果造成1921年的实实在在的大粮荒。^③ 从1917年到1920年，人口从一亿四千三百五十万下降到一亿三千四百二十万；城市人口从二千五百八十万直线下降到二千另八十万，而农村人口则从一亿一千七百七十万下降到一亿一千三百四十万。^④ 但是相对于城市人口来说，农村人口占这个国家居民的百分比实际已从百分之八十二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五。俄国作为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占压倒优势国家的这个显著特征，现在比革命前更加突出了。农业方面的社会结构虽然经受了影响深远和激烈的变革，但是农村生活许多旧日常见的特点依然如故。布尔什维克只是在国内工业部门才采取严厉而有力的措施，用完全新型的社会组织去

① 见1922年苏联中央统计局出版的(俄文)《1917和1919年农民的经济分化》。又见约各夫，前引书103页及以下。

② 见布鲁茨岸斯，前引书160页及以下；普罗科波维奇，前引书68页及以下；塔尔海姆，前引书26页及以下；劳帕赫，前引书40页及以下。

③ 根据苏联官方统计，五百万人死于饥饿。著名的农业统计学家A·N·塞林舍夫教授则估计为九百万人。见布鲁茨岸斯，前引书166页及以下。

④ 见苏联中央统计局，《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7页。

取代旧有的社会结构。当时由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所宣布的原则，以后仅仅在有限的实施范围内加以修订而已。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社会结构上的变革，一方面受内在原因所制约，另一方面则受所应用的意识形态的制约，这种意识形态虽然确实含有典型的俄国革命思想要素在内，却来源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可是，随着苏联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军事共产主义失败的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和俄国的民族要素有关的。这种变化的最初迹象，随着意识形态作用的变化，在1920年俄波战争时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①

2. 新经济政策(1921年—1928年)

感到有必要维护革命所取得的社会成就，促使大部分居民在面临某种复辟势力时拥护布尔什维克。^② 布尔什维克把他们在内战中取得的胜利说成是民众对一党制国家的拥护。但1921年3月的喀朗施塔得叛乱，叛变者喊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连同迅速高涨的农民叛乱，就使这种说法成了疑问。^③ 这一连串事件引起的危机，迫使列宁在政策上作出深刻的改变，以求更加现实地来对付社会变革中的迫切问题。列宁把小自耕农看作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威胁，他说明这种农民小资产阶级是一种动摇的力

① 见W·马克特：《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中的俄国继承人》，载《共产主义制度中的人》（1957年杜宾根德文版）63页。

② 阿瑟·罗森贝：《布尔什维主义史》（1932年柏林德文版）116页及以下。

③ 见劳奇：前引书173页及以下；И·И·特里丰诺夫：《新经济政策初期苏联的阶级和阶级斗争》（1964年列宁格勒俄文版）。

量。^① 在这一斗争阶段，布尔什维克巩固他们权力的唯一办法，是对中农的某些经济要求让步。1921年3月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的新经济政策(耐普)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②，它主要着眼于农业部门，谋求恢复以个人积极性为基础的有限制的市场经济来安抚农民。所有其他主要经济部门，诸如已经组织成托拉斯的重工业，仍然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绝对控制之下。

列宁自己把根据耐普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农民群众具有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特性会危及对这个政权的信念，这就加强他决心去抵制“工人反对派”企图使经济服从于职工会的政策和规章的计划。^③ 列宁把这种计划看做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因素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偏向。要使新经济政策成功，至关重要的当然是制止通货膨胀；1924年的币制改革在这方面是有帮助的。1927年，革命后十年，工业生产已达到1913年的水平，虽然各个不同工业部门的产量相差很大。最后，由于粮食供应情况改善，群众方面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反抗似乎减弱了。

1921年春俄国开始经济建设时，布尔什维克党被迫从最初按照社会主义路线完全拉平社会的尝试后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没有生气的平均主义，很快转变成以社会差别为特点

① 见1921年3月27日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491页）。

② 见塔利海姆，前引书29页及以下；劳帕赫，前引书47页及以下。

③ 见B·迈斯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工具的苏联工会》，载《外国研究》第2期（1953年达姆施塔特德文版）22页。

的社会了。^①

起初，获准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剩余农产品的农民获利甚丰。国家工作人员和普通工人之间工资的差距扩大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为了进一步复兴经济，在小商业、手工业和小工厂一级恢复私营企业。结果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情况得到了改善，同时属于旧社会的中、上层分子则利用市场经济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党的资产阶级倾向事实上已非常显著，成为马雅柯夫斯基著名的讽刺剧《臭虫》的主题。

革命后十年，当新经济政策临近结束，开始推行计划经济时，至少从表面上看，人口的社会结构和战前时代相比似乎没有什么大变化。^② 1928年城市工人和职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三，而1913年占百分之十六点七；这期间农民和无组织的家庭劳动者的总人数从1913年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一跃升到1928年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九。只有“资本家”阶级成员大大减少，从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九下降到百分之四点五。其中较少数的人由于内战、革命和移居国外而消失了。但到了1928年，大量城市“资本家”都变成了职员。^③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子女得到新经济政策时期提供的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要比劳动人民的子女大得多。^④

在日益增长着的工程技术干部队伍中，可以找到越来越多的老资本家的后代，他们实际上都被算作“工人”。更有甚

① 见阿瑟·罗森贝，前引书，157页。

② 下列数字的来源可以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找到。

③ 见R·费尔德密瑟，《苏俄坚持身分地位的利益》，载《美国社会学杂志》59期（1953年7月）21页及以下。

④ 见本书所收O·安韦勒的文章。

者,新的一代的工人阶级主要来自农民,而不是来自城市无产阶级。^①

但是,社会结构的变革实际上比这些材料所显示的更为深刻。革命前,那些被布尔什维克划为“资本家”的人,在社会上占有领导地位。工人和职员大都依靠他们生活。到了1928年,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两类人(工人和职员)现在主要受雇于政府机关或国营企业,这些机关、企业,归根到底都受党的控制。党的领导不但在工业、银行、金融和运输部门占支配地位,并且垄断了对外贸易方面这类职位。党还在下列三方面加强控制:(1)取消一切独立的社会团体组织,(2)通过群众组织扩大“无产阶级专政”,(3)设法防止党内派别的发展。

这些政策无异意味着创立一个“极权国家”,并背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逐渐消亡的教导。^② 苏维埃政权本来被视作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现在越来越具有了永久性专政的特征。

新经济政策时期,耕种自己土地的个体农民在农业中占着主导地位。1928年,这些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九,大大高于1913年。仅农户的数目,就从1916年的一千六百万个增加到1927年的二千五百三十万个。^③ 由于从事工业经营的规模显著扩大,农村中开始出现社会阶层分化。

① 这方面见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

② 见B·迈斯纳,《苏联共产党党纲,1903至1953年》(1952年科隆德文版)98页及以下。

③ 这些数字来源于约各夫,前引书143页及以下。



1928年农村人口(一亿一千九百四十万)由下列成分组成:^①

农村无产者	三百四十万
小农	三千四百万
中农	五千二百万
富裕农民	一千一百万
富农	五百万
其他	一千四百万

富裕农民拥有六至十俄亩的耕地,他们除了自己的土地还租进土地,雇工,出租多余的牲口和设备,并从事农产品贸易。1927年到1929年间,百分之六的农村人口拥有全部农业机械的百分之三十。

这些材料表明,中、小农民还是和过去一样在数量上占优势。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富农”(也就是富有的和非常富裕的农民)和农民无产者的百分比都大大地增加了。

农村无产者和小农无力独立耕种他们的土地。有些中农也处于同样的困境;结果,为了要克服困难,势必要求助于富农。党把广大农民群众依赖富农这一点看做是对党在农村中的领导权的威胁。^②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人口从1920年的一亿三千六百八十万增加到1929年的一亿五千三百四十万,而城市人口的增长比农村地区快;城市人口从二千零九十万(百分之十五)

^① 数字来源于约各夫,前引书150页及以下。又见A·葛约斯脱,《苏联农村的阶层》(1928年德文版)。

^② 见席勒,前引书18页。

增加到二千八百七十万(百分之十九),农村人口则从一亿一千五百九十万(百分之八十五)增加到一亿二千四百七十万(百分之八十一)。^①这种人口方面的急剧增长,加剧了城市的供应问题,农村人口的压力也增大了。

党对私营经济部门逐步施加的种种限制,加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扩大^②,使城乡之间的紧张状态激化。农民宁愿满足他们自己的个人需要,而对旨在增加农业生产的措施置之不理,因为他们认为,对经济产值的任何增加只会招来政府方面的抑制措施。^③农民的抵制造成上市粮食的数量锐减。^④正在谋求加快工业化过程的布尔什维克人员,便利用农民的这种行为作为加速农业集体化的借口。

列宁死后,斯大林提出的“总路线”得到了承认,这条“总路线”规定用建立在完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把苏联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⑤从1926年开始,原来对私营经济部门作出的让步逐渐废除了。下列第一表说明这种发展情况。^⑥

1928年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结束。^⑦恢复旧俄社会结构成分(特别是在农村中)的主导

① <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 7页。

② 见A·V·戈里科夫,《苏联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重要阶段,1921—1929》(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

③ 见约各夫,前引书130页。

④ 见梁士琴科,前引书第8卷270页及以下;劳帕奇,前引书48页。

⑤ 劳奇,前引书235页及以下;梁士琴科,前引书第8卷219—220页。

⑥ 据普罗科波维奇,前引书191页。

⑦ 见梁士琴科,前引书第8卷277页。

表一 私营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和商业营业额中所占的百分比

	工 业			商 业			农 业
	大工业	小工业	整个工业	批 发	零 售	整个商业	
1922—23	—	—	—	—	75.3	55.9	—
1923—24	4.4	87.3	33.3	18.1	66.5	44.9	—
1924—25	3.9	84.4	28.0	8.5	48.5	27.8	—
1925—26	4.0	81.9	27.1	7.9	44.4	24.8	98.6
1926—27	2.3	82.1	20.8	4.8	37.0	18.5	98.8
1927—28	1.4	70.6	14.7	1.9	25.4	10.2	98.6
1928—29	0.9	43.8	12.7	0.9	14.3	5.1	98.3

经济，由一种完全有计划的经济代替了。这种计划经济原来假定是要影响社会生活的所有一切领域的。

3. 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

(1928—29年到1938—39年)

苏联社会的本质和特征，由1928—29年到1938—39年这段时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而决定性地勾划出来了。变革的创始者本人把它叫做“自上而下的革命”^①。在这决定命运的十年中由斯大林发动的革命变革，虽然是由统治者而不是由被统治者进行的，却具有伟大社会革命的规模和深远影响。斯大林看出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质的区别，在1926年就已论证了在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条件下进行这种革命的必要性：

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这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②

斯大林讲的这些话，象是把马克思的观点颠倒过来了。^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新的国家和新的社会秩序是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冲突中出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的

^① 见B·迈斯纳，《转折中的俄国，苏联统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革》（1951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16页及以下。

^②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版127页。

^③ 见R·列文塔尔，《极权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革命》，载德文《月刊》，1960年11月号36页及以下。

核心是国家)必须与正出现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按照斯大林的观点,一小群掌权的上层人物的合法性是建筑在他们掌握正确原则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根据这些原则,借助于国家,使新社会得以产生。事实上,这意味着统治集团把一种社会基础变成另一种社会基础。这一历时约十年的不断革命过程是分成两阶段实现的,而以1934年作为两个阶段的分界线。^①“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计划经济是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而以“大清洗”为特征的第二阶段,则是一场关于争夺绝对的政治控制权的斗争。

在“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第一阶段中,斯大林主要出于权力政治的考虑,赞成采取革命行动超过赞成改革。从1929年开始,“苏维埃爱国主义”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为他的政策辩护。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对苏维埃经济工作人员的纲领性演说中曾经透露过他这样做的动机,这种动机是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分歧的基础。他说:

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末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说:“或是灭亡,或是赶上并且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

^① 见B·迈斯纳,《日月诺夫》,载德文《东欧》杂志第2卷(1952年)15页。

们被人打倒。^①

当时担任斯大林的私人秘书的马林科夫,在许多年之后,在1947年9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时讲到,如果没有几个五年经济计划的支持,进行长期“积极”的国防准备,苏联就不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②正因为这样,他把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称为伟大革命的一年。

这次革命的直接副产物,主要是重新试图在社会经济方面消灭社会的差别。各阶级之间的差距缩短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化现象大部分被消除了。^③

新政权强调重工业的绝对优先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强制工业化的政策,这是同苏联要使经济全盘社会主义化的努力连结在一起的;在农村方面它采取了集体化的形式。^④后来,从1927年起,无情地实施了农业集体化,并在1930年1月初下令消灭富农阶级。^⑤这个第二次土地革命的社会影响,比起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没收农业土地来要猛烈得多,造成的破坏也大得多。

① 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载《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版400页。

② 见格·马林科夫,《联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工作情形》,载《凡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8年中文版130页。

③ 见K·米纳特,《俄国人民社会结构的改变》,载德文《东欧》杂志第8卷(1932—1933年)451页及以下。

④ 见塔尔海姆,前引书32页及以下;劳帕奇,前引书75页及以下;席勒,前引书18页;梁士琴科,前引书275页及以下。

⑤ 见B·布魯茨庫斯,《五年计划及其完成》(1932年莱比锡德文版)46页及以下。

数以百万计的富农(估计有两百万到三百万)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和苏联的远东地区,很多人在那里丧生。^① 那些留下来的大都被剥夺了他们的房屋和财产。其中大部分流入城市,扩大了职工的人数,或者被新建工业所吸收。此外,还有好几百万人由于继这些匆匆实行的镇压措施而来的大饥荒而丧失了生命。^② 应对这一不人道政策负责的斯大林后来对邱吉尔说过,消灭富农是他一生中所作出的最困难的决定。^③

几乎所有小规模 and 中等规模的农户都并入了集体企业。^④ 集体农庄的百分比从1929年10月的百分之四点一上升到1930年1月的百分之二十一,随后在1930年3月猛增到百分之五十八,在1937年达到百分之九十三。到1939年,独立的农民和没有组织起来的家庭劳动者,在总人口中只占百分之二点六。

随着私营工商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有过某些恢复)的消灭,那些刚从小资产阶级中生长起来的中产阶级也被连根带枝都铲除了。1923—24年,零售商业中私营销售额还占到百分之五十七点七;1926—27年,约为百分之三十九点九;到1930年,下降到百分之五点六,而到1931年就全部被消灭

① O·奥哈根,《苏联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照表》(1933年布勒斯劳德文版)43页及以下。

② 据普罗科波维奇,前引书34页。1933年和1934年的饥荒使九百万人丧生。

③ 时在1942年8月邱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第一次会晤时。见文·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命运的关键》(1950年波士顿版)498页。当时斯大林曾讲到涉及一千万人的无情的战斗。

④ 下面的百分数系据普罗科波维奇,前引书121页;《苏联国民经济》99页。

了。^① 在工业中也是这样。1924—25年，私营部门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八点七，1926—27年下降为百分之十四点一，后来再下降到1929年的百分之零点六和1938年的百分之零点零三。^②

合作化家庭工业是唯一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开放的从事独立经营活动的可能范围。在1924—25年的工业总产值中，工业生产合作社占百分之九点一，1930年下降为百分之八点八，以后稳定在百分之七上下。虽然生产合作社的产值在1930年的工业总产值中只占百分之八点八，但在工业企业总数中却占到百分之四十三点五。^③ 因此，合作化工业依然是小型工商企业的最大的组成部分。

虽然小资产阶级在合作化的家庭工业中享有一定程度的经营自由，所有其他工人和职员却全被吸收到社会主义体系中去了。当时还流行着把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都包括在“无产阶级”的总概念之内，因为按照苏联的观点，小资产阶级已逐步无产阶级化了。1927年，城市人口约为二千九百七十万，非无产阶级及其家属构成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五，而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人口则占百分之六十八·五。1931年的比率则为百分之十二·六对百分之八十七·四。^④

布尔什维克政权泰然自若地无视这样的事实：体力劳动

① 数字系据普罗科波维奇，前引书 313 页。

② 这些数字系据朴洛克，前引书 174 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百科全书）第 1 卷（1950 年东柏林德文版 834 页及以下）所收 E·洛克斯饮写的《工业》条。

③ 数字系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结果》（1935 年莫斯科版）25 页。

④ 数字系据米纳特，前引书 455 页。

者只占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而职员就他们原来不是旧的中上社会阶层的成员而论，在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方面同小资产阶级并没有多大差别。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只有在他成为体力劳动者的时候，才能无产阶级化。但是，要使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事实上比农民的无产阶级化需要更长的时间。首先，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成为职员或进入工程技术界而被迫放弃他原来的私人职位，那末他还没有无产阶级化。同样，在政府部门或生产合作社得到一个新岗位，对某些小资产阶级人们来说是向上爬，就是对那些其职责在于应用所谓“实际知识”的工人来说，也是如此。

人们拥向城市和工业中心，加上住房、食物、消费品以及公共福利的极端缺乏所造成的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这对拉平苏联社会的差别，较之为使小资产阶级和那些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在职业上很活跃的过去上层的成员无产阶级化所作的正式努力和所采取的折衷的措施，起着更大的作用。这一危险局势由于强制工业化和集体化而产生的急剧的城市化，变得更为严重了。1929年的苏联人口是一亿五千三百四十万；到1939年增加到一亿七千零六十万。在此期间，城市人口从二千八百七十万(百分之十九)增加到五千六百一十万(百分之三十三)，而农村人口则从一亿二千四百七十万(百分之八十一)下降到一亿一千四百五十万(百分之六十七)。① 根据

① 见《1963年的苏联国民经济》7页及以下。苏联中央统计局所引用的关于苏联的数字系截至1939年9月17日为止。在《苏联大百科全书》《苏联》专册(第1版第1卷46页)中，1927年和1939年的城市人口分别列为二千六百三十万(百分之十七点九)和五千五百九十万(百分之三十二点八)，共增加二千九百六十万，相当于增长百分之一百十二点五。

1926年和1939年的人口普查，在这十三年中，城市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五，即增加了约二千九百六十万。美国化了三十年(从1900年到1930年)，英国化了六十年(从1871年到1931年)，才达到同样的增长率。城市总数从1926年的七百零九个上升到1939年的九百二十二个，而城市住宅区的建设更是扶摇直上，从一百二十五个增加到一千四百四十八个。^①除苏联欧洲部分的非黑土区外，城市的生长主要发生在西伯利亚西部、哈萨克和西伯利亚东部。城市化的过程主要是以城市的发展来衡量的。从1926年到1939年，超过十万居民的大城市的数目从三十一一个增加到八十二个。大城市的居民在1939年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六点一，而在1926年只占百分之六点五。从1926年到1939年，莫斯科的人口从二百万增加到四百一十万，列宁格勒的人口从一百七十万增加到三百二十万，乌拉尔的工业中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从十四万增加到四十二万六千。大城市是从村庄中产生的，而其他一些城市如黑龙江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或共青城，则是从荒地上建设起来的。城市人口的这种惊人增长主要是由于农村地区的移民，其次是由于通过行政措施把村庄转变为城市。因为生活条件困苦，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是很小的。从1926年到1939年增加的二千九百六十万城市人口中，一千八百五十万(百分之六十二点五)是来自农村的移民，五百八十万(百分之十九点六)是原来的农村居民，只有五百三十万(百分之十七点九)是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②

① 数字系据《苏联》(百科全书)第1卷46页起E·达维多夫写的《人口》条。

② 同上。

在这些拥挤不堪的城市中，住房条件特别恶劣。在苏联，居住面积每人九平方米被认为是最低限度，而每人六平方米则被认为是严重不足。^①但在1927—28年，每个城市居民的居住面积仅仅达到严重不足的水平，而在1932年到1937年之间，每人居住面积实际上从五点二平方米减少到四点二平方米，到1939年更下降到四平方米的低水平。^②

革命前，只有百分之三的工人住在莫斯科市的第二道环形地区内，而在1931—32年，却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工人住在那里居住。^③由于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造成牲畜损失，因此尽管谷物生产有所增长，城市居民中的食品缺乏现象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随着急剧的社会主义化，工人和低级职员的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使这一情况加剧了。直到1926—27年工资才达到战前时期的水平。到1929—30年，工资水平超过战前时期百分之十五，但在1935年又一次下降到只有战前时期的百分之五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低点。

一个莫斯科工人在1913年每月收入二十四点三卢布，生活费为六点五七卢布，可以买到三点七篮食物。1928年，每月工资七十点二卢布，生活费为十一点九五卢布，却只能买到五点六篮食物。如果同1935年比较，那时生活费为九十六点四二卢布，工资为一百八十五点三卢布，仅能买到一点九篮

① 见收于多柏特，前引书191页的H·施密斯写的《建筑和住房问题》。

② 数字系据普罗科波维奇，前引书309页；《苏联的私人房屋，来自铁幕后面的新闻》第2卷93号（1948年）。

③ 施密特，前引书190页。

食物。因此，在苏联经济全盘社会主义化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战前时期的一般水平。^①

从1935年起，实际工资开始上升，在1938年和1939年达到最高峰。工资平均每月为二百七十到二百八十七卢布，相当于二点六篮食物。尽管这样，它只达到1913年生活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五和1929—30年的百分之五十。1940年，实际工资骤然下降，平均每月工资虽约有三百二十三卢布，实际价值却降低到1935年的水平。^② 这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情况，那时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之间的差距已经很大，而且还在有计划地进一步扩大。这种情况不能不使绝大多数工人和低级职员无产阶级化步伐加快。1930年实行一种按不同商品征收的营业税，这种间接消费税的负担主要落在他们头上。^③ 由商业国有化引起的消费品的匮乏，加重了这一措施的严重性。这样就使城市工人群众同仍然处于被压迫社会地位的集体农庄农民一样，承担了为建立在完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新的强制经济提供财源的重担。

这些情况的直接后果是城市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如工人阶级家庭人口日益减少所显示的。1927年，每个家庭平均有四点一人，其中一点二八人是有工作的，而二点八二人是没有

① 这些数字系据普罗科波维奇，前引书306页及以下。

② 普罗科波维奇，前引书304页及以下。

③ 固定价格与销售成本之间的差额是布尔什维克政权最重要的财政来源。斯大林时期，在苏联的统一预算中，营业税几乎占到国家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见克斯查格尔，《美国和苏联的赋税制度》，载《西摩勒耳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69卷第3号（1949年）97页及以下；塔尔海姆，《苏联经济和政治状况考察》（1961年汉诺威德文版）30页。

工作的；1935年，每个家庭平均有^①三点八人，其中一点四七人是有工作的，二点三三人是没有工作的。换句话说，家庭中每一个有工作的成员，在1927年同时有二点二个没有工作的成员，而在1935年则有一点五九没有工作的成员。^①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农村移民的结果。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入城市，农村的影响不能不波及城市。富农分子实际上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从1926年到1939年大约有二千四百四十万农民迁移到城市。同一时期内，农户的数目从二千五百五十万减少到二千零三十万，即约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点四。同一时期内，农村人口也从一亿二千二百四十万下降到七千八百六十万，即约减少了四千三百八十万，或百分之三十五点八。^②在这些农民中，一半以上直接迁到城市。另一半则在城市附近定居，他们或者终于加入集体农庄，或者受雇于国营农场或机器拖拉机站。这一般意味着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不但在城市中而且也在农村中进行着。农村中的职员大量地从村庄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得到补充，因此在这里同样可以看到一种相反的趋势。

由于这些发展，结果使农村人口的构成起了实质性的变化。根据普罗科波维奇^③，1929年有一亿二千二百四十万农民。此外还有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村人口四百三十万。两者合

① 数字系据普罗科波维奇，前引书 310 页。

② 数字系据普罗科波维奇，前引书 148 页；又见他著的《苏联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1948年亦黎世—维也纳德文版）70页。

③ 普罗科波维奇，《苏联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70页。

计共有一亿二千六百七十万农村人口。到1938年，在一亿一千四百六十万农村人口中，农业人口只占七千八百六十万，而其余职业界却拥有三千六百万人。后者包括二千八百四十万工人和职员，以及五百三十万家庭劳动者和手工业者。强制集体化尽管有许多消极作用，但是在一点上是有益的，这就是通过减少农户的数目减轻了村庄的人口压力。

虽然有国家收购制度的沉重负担，同时劳动生产率只有微不足道的增长，集体农庄组织毕竟开垦了大量的可耕地，并增加了按人口计算的谷物产量。农民的平均福利较之革命前也有了改善，尽管对一般工人和职员并不能这样说。但是人们应当记住，后者的工资并不是衡量生活水平的唯一尺度，因为国家的社会开支主要是使工人和职员得到好处，而不是农民。这些好处特别被认为是工会会员应得的果实。

通过使各种社会集团掺杂起来和使劳苦大众贫困化，进一步促进了苏联社会的平均化，但很快就被一种相反的趋势所抵销，这就是在职员中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分化，以及在工人内部出现了程度较小的分化。这种分化部分地是由工业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部分地也是政治上“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结果。

布尔什维克政权只有通过完全夺取和控制一切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训练出合格的专家去管理生产和行政的技术过程，才能实现它的远大经济目标。但这就需要提高一般的教育水平，特别需要普及普通中学和高等教育。^①

这些方面的改进使国家工作人员和工程技术领导人员的数目大量增加。在二十年代，人们把国家工作人员称为机关

工作人员，其中大部分人不久就享有体力劳动者所享受不到的许多利益。这个社会集团实际上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产生的，那时国家工作人员的人数猛增至二百四十万，几乎等于沙皇时代文职人员人数的一倍。^③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机关工作人员的数目又增加了一倍，在生产过程中担任管理职务的约有四百六十万人，他们成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主要来自旧知识分子与过去的上层和中层社会阶层，以及党组织中的无产阶级成员。越来越多的大学和高等技术院校的毕业生（其中大部分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同小资产阶级分子一起，使职员的人数在最初两个五年计划过程中上升到九百六十万。^④ 在1926年到1937年之间，这一集团比普通工人的增加快得多。在1931年后，这些职员被冠以种种称号，如“新知识分子”，“劳动知识分子”，或“社会主义人民知识分子”。^⑤ 这一发展是同比较重视“旧知识分子”成员连结在一起的，这些“旧知识分子”的成员被一视同仁地吸收到新的集团中来。斯大林在1931年6月23日对苏联经济工作人员所作的第二次纲领性演说是这一发展的转折点。^⑥ 斯大林宣称，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长久维持其

① 见N·德·惠特，《苏联的专业人力》（1955年华盛顿英文版），O·安韦勒和K·梅耶，《1917年以来的苏联教育政策》（1961年海德堡德文版），以及安韦勒收于本书中的文章。

② 见D·达林，《真正的苏俄》（1948年汉堡德文版）139页注1；H·约格尔，《苏联的国家权力和官僚主义》（1952年达姆施塔特德文版）42页。

③ 资料来源可从本文第二部分中找到。

④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605、708页。

⑤ 《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载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问题》403页（文中所提到的几处见414页及418页。——译者）。

统治的。因此，工人阶级“应当为本身造就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同时要照顾旧知识分子。斯大林在同一演说中要求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和平均主义。因为现在工资是以工作成就为依据的。在生产组织中的个人责任应当加强。这些指示对推行“统一的指挥权”（即一长制），是很重要的，1929年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就已实行一长制了。^① 计划经济产生了一个领导阶层，它构成了在“新知识分子”中发展起来的社会阶层分化的基础。

大量职员从而大量知识分子的向上流动，根源在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以及社会的阶层分化，后者是在计划经济影响下从迅速工业化的社会中产生的。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1935年所鼓励的，那时他们废除了1928年规定的大学和高等技术院校招生应包括“工人骨干”（最初是百分之六十五，后来是百分之七十）的政策。^②

大学生中工人和工人子女的比重，在1928年到1932年间从百分之二十四点四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八，到1938年就下降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九。来自非无产阶级阶层（现在他们全都在变成职员或“知识分子”的成员）的大学生人数，在1928年到1932年间从百分之五十点七降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九，但在1938年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四点五。^③ 在普通技术学校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④ 此后苏联就没有再发表过大学生的

① 见B·迈斯纳，《俄国各个部的发展》，载德文《欧洲文库》第8卷（1948年）1204页。

② 见安韦勒—梅耶，前引书165、171页。

③ 数字系据德·惠特，前引书577页。在这方面，又见安韦勒，前引书。

④ 见B·迈斯纳，《苏联社会结构的改变》，载德文《欧洲文库》第5卷（1950年）12页及以下。

社会出身的统计数字，因为这会一目了然地显示出“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比例太不相称。开头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新知识分子是有一定保留的。只是在第二代登上了舞台和斯大林于1935年6月4日对军事学院毕业生发表了演说以后，这一态度才有了改变。在这一演说中有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这就是“干部决定一切”^①。但是他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并不打算承认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斯大林在1936年11月25日关于新的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②中指出，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并把“劳动知识分子”说成是一个独立的中间社会阶层。虽然他们执行着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十分重要的任务，他们并不比工人或集体农庄农民享有更多的权利。但斯大林并不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阶级：

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从前，知识分子是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一部分是农民出身，而工人出身的是极少数。而在我们苏维埃时代，知识分子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可是，不管它的出身如何，不管它的性质怎样，它还是一个阶层而不是阶级。^③

斯大林的论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在1937年这个集团加上家庭成员已占到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十四，几乎和1913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581页及以下。

② 同上书599页。

③ 同上书619页。1894年考茨基在他的论文《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中也拒绝把知识分子看做一个阶级。见A·N·魏斯，《1871至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1965年维斯巴登德文版）107页。

年的“资本家”阶级(后来已被“消灭”)相当。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把新知识分子和大部分来自小资产阶级的职员等同起来。其实无论是他们的社会职能或者他们的社会意识都不能同旧知识分子相提并论,后者显然具有较深的知识分子特性,并把自己看作是献身于革命与改革的一个阶层。①

斯大林本人可能是注意到这些区别的,但是要把知识分子在国家宪法中明确规定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时机还不成熟。1936年到1938年的“大清洗”,使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成分发生了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根本变化。②

由于列宁时代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党员被清洗,以及对整个党内无产阶级分子的大规模镇压,结果使三百五十万党员减少到二百万,虽然在1940年党员人数曾回升到三百四十万。1939年,在二百三十万党员中,知识分子占到百分之二十。战后,知识分子党员人数接近百分之五十,而工人在1930年占党员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三,在同一时期却下降了一半以上。在出席1939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就他们所受的教育来衡量,将近百分之五十四属于知识分子。③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执行机关的社会成分,也起了类似的变化。斯大林考虑到了这一事实,他把知识分子置于与其他

① 见N·贝尔迪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意义及命运》(1937年卢塞恩德文版)23页及以下;R·派蒂斯编的《俄国知识分子》(1961年纽约英文版)所收M·玛利亚、L·沙比罗和B·爱尔金所写的几篇文章;费希尔,《知识分子和俄国》(载勃拉克,前引书253页及以下),及《俄国的自由主义:从缙绅到知识分子》(1958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英文版);S·R·汤普金斯,《俄国知识分子》(1957年诺曼英文版);K·冯·贝姆,《沙皇俄国的政治社会学》(1965年维斯巴登德文版)。

② 见劳奇,前引书320页及以下。

③ 这个数字系据迈斯纳,《转折中的俄国》10页及以下。

两个阶级平等的地位，并取消了以前一切有关党员条件的限制。第十八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采纳了这些措施。^①这样，事实上就使知识分子（这时仍然等同于职员）凌驾于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之上的社会领导地位得到党章承认。现在“工人阶级”这个词被用来代替“无产阶级”，同时党宣告它代表的是“全体苏联人民”而不单是“工人群众”。在苏联，除了这三个阶级外还存在着第四个集团，它在党章中没有被提到，居于社会等级的最底层。这就是关在集中营——1930年改名为“劳改营”——里的劳改犯，斯大林为了讨好知识分子，把这些人称为“中间阶级”。^②在1930年之前，只有北方的集中营是归苏联秘密警察，即当时所谓苏联国家联合政治保卫局管辖的。那时的囚犯总数大概不到一百万人。^③但由于强制集体化和“大清洗”，使集中营囚犯的人数有了大量的增加。1934年10月27日发布的一项命令（苏联G S 1934年56号第481款），把整个监狱系统以及一切强迫劳动集中营都置于新设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之下。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管理下，强迫劳动集中营成为斯大林体制的一个特征。这些集中营主要是为了开发极北地区以及军事和经济上的目的而组织的。根据俄国

^① 见G·布鲁纳：《苏联共产党党章，1903—1961》（1965年科隆德文版）35页及以下。

^② 见B·雅各武莱夫：《苏联的集中营》（1955年慕尼黑德文版）；D·达林和B·尼古拉耶夫斯基：《工人还是被剥削者：苏联的劳动营制度》（1948年慕尼黑版）；美国工联：《俄国的奴隶劳动》，无出版日期；H·S·：《关于苏联集中营的报告，根据国际反对集中营制度委员会正式记录编纂》，载德文《东方问题》第3卷（1951年）1102页及以下；M·米哈依洛夫：《1964年莫斯科的夏天》（1965年伯尔尼德文版）40页指出，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第一个集中营是建立在1921年。

^③ 根据国家政治保安局官员吉谢列夫-葛罗莫夫的叙述，这个数字在1930年5月1日达到662,257。见达林-尼古拉耶夫斯基：前引书11页。

问题专家的估计，这些集中营有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①

1941年的国家经济计划透露，单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企业中就有约二百三十万人被迫服役，他们几乎全是囚犯。劳改犯的总数实际上可能比这些估计要高。强制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强制集体化，社会一切重要部门的全盘社会主义化，以及“大清洗”所造成的俄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比十月革命本身更为深刻。这些事件的最重要后果之一是社会地位的变动急剧激化，其他后果是官僚政治的广泛发展和农村人口过剩的结束，这是一个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感到头痛的问题。“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成了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苏联城市和工业部门的社会改造。在国民经济的农村和农业部门，集体农庄代替了传统的农业组织形式。

但所有这些后果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上升。新知识分子的上层越来越多地融合到党的官僚机构的领导层之中，后者在“大清洗”的过程中取得了作为一个独裁统治集团的独立地位。在这个由国家而不是由社会进行的社会内部变动中，一个新的阶级社会从一个独裁统治制度的结构里面产生出来了。在我们的时代里，这个制度的极权主

^① 萨洛蒙·施瓦茨：《统计学和奴隶制》，载德文《东方问题》第8卷（1950年）1562页及以下；一位俄国工人阶级史的公认权威计算1939年有一亿人；玛姆·约斯南：《关于强制劳动的可靠材料》，载德文《东方问题》（1951年）132页，根据1941年的粗略估计至少有三百五十万人；达林-尼古拉耶夫斯基：前引书17页同意一千五百万的数字。米哈依洛夫斯基：前引书37页及49页估计1956—1957年总数约为八百万至一千二百万。据作者的计算，1939年劳改犯的数目约计五百万人。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下令放逐的结果，这个数字甚至可能更高。见R·康奎斯特：《苏联放逐各族人民》（1960年伦敦英文版）。因为所有各权威都同意斯大林时代关在集中营的人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男人，这个时期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不能完全归因于战争。

义的方法是越来越显著了。

4. 战争与后期斯大林主义 (1939年—1953年)

布尔什维克俄国社会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1939年开始的,它从苏联对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干涉起一直到斯大林逝世时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年代可以看作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段落。这两个段落构成了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时期,也就是所谓后期斯大林时代。这个转变时期的特征是新的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新知识分子内部的不断分化。新的制度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而幸存下来了,但这应更多地归因于俄国民族主义和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号召力,以及“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民对这些号召的自觉拥护,而不是由于什么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① 我们还必须记住,德国人入侵苏联不是作为解放者而是作为压迫者出现的。因此,初期分裂苏联社会的宽阔裂缝如今弥合了。民族主义是通向革命前俄国的桥梁;又是开辟新的社会结构的基石。^② 这个新的社会集团带有传统的形态,它因袭了大部分持续到今天的旧时的生活方式和小资产阶级的外表。^③ 战后,斯大林的专制统治变为一种以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为标志的恶性的独裁极权主义统治。它表现为极度的恐怖和一种使社会急剧分裂成集团的明显倾向。虽然在苏维埃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没有发生过热月

^① 见劳奇,前引书439页及以下;K·米纳特:《通过世界史来看世界革命》(1950年基青根—美茵德文版)。

^② 见迈斯纳:《转折中的俄国》42页。

^③ 见K·米纳特:《苏联人》(1958年斯图嘉特德文版)184页;G·P·,《莫斯科夜话》,载《基督和世界》1957年4月4日。

政变式的阶段，^①但是正如从经济意义上说布尔什维主义实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代替品一样，斯大林主义表明是一种波拿巴主义的代替品。^②由于极权主义政权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使个人和集团很容易与新的社会秩序相适应，并使苏联所发生的事情看起来象是历史延续的产物。

布尔什维克政权所推行的一整套措施，助长了社会的阶层化。在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根据个人成就确定工资和薪金的政策（这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准则）、斯达汉诺夫运动、奖金制度和对所得税法的修订。^③

在这方面，重新施行对银行储蓄付给利息也值得一提。^④

① 热月是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1793 年颁布的共和历第十一月的名称，相当于公历 7 月 19 日至 8 月 17 日。雅各宾党人执政后，被大资产阶级在 1794 年 7 月 27 日（热月 9 日）发动的政变所推翻。这次政变被称为热月政变。——译者

② 布尔什维主义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代替品这一论点，由阿奇米诺夫在他的《权力的背景》（1950 年乌耳姆德文版，第 2 版名《共产主义的掘墓人》1964 年新图嘉特德文版）一书中曾加以发挥。除了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前俄国在其经济发展方面，比阿奇米诺夫所同意的走得更远这一事实之外，他的论点太过狭隘，因为它不能考虑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的代替品”的全部影响。而且，它过高地估计了“技术知识分子”的作用，从而，也过高地估计了经济管理人员作为社会变革因素的作用。伊赛亚·柏林的文章《俄国文化中的沉默》，载英文《外交》季刊第 36 期（1957 年）1 页及以下，提到了“波拿巴主义的代替品”这一论点。

③ 见霍夫曼，前引书 382 页及以下；A·英克尔斯，《苏联的社会阶层与变动性（1940 年—1950 年）》，载《美国社会问题评论》第 15 期（1950 年）470 页及以下；H·莱奥恩，《苏联的社会分化》，载德文《国会》周刊 1955 年 8 月 17 日增刊 494 页及以下；米纳特，《苏联人》57 页及以下，114 页及以下。1943 年的税制改革是对较高的月薪实行累进税的一个有效手段。对月薪为五百卢布的有两个孩子的夫妇征收直接所得税百分之五点七，对月薪为一千卢布的人征税百分之七点七，二千卢布的征税百分之十一点一，收入更高的征税百分之十三左右。

④ 自从 1934 年的财政改革以后，苏联的银行和储蓄所都支付利息，正如国家对投资盈利给予税务特惠一样。见莱奥恩，前引书 495 页。

这些在工资政策和金融政策上的改变增加了知识分子上层以及工人阶级内部领导集团的收入,它的后果是使比如工长、管理员之流变成“工人贵族”。

与这一发展相联系的工人中间阶级意识的削弱,据认为是使苏联新的阶级社会稳定下来的基本因素。

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收入最高工人的所得,差不多为收入最低工人的所得的两倍(2.8:1)。1940年,职员的最大工资为一万零六百卢布,而正式的每月平均工资只有三百三十九卢布。这样,当时工人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相差的标准为31.3:1。^①

关于1948年苏联生活水平,一个挪威工会代表团报告说:整个工资制度……建立在个人能力原则的基础上,到了把个人能力同劳动过程和工厂的生产能力一致起来的地步。此外,还有奖金制度。例如,工人如果超额完成定额达百分之一百,他的基本工资就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奖金制度搞得很完善,造成了工资的巨大差别。在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为八百卢布的工厂里,可以找到每月工资从二千卢布到三千卢布不等的工人,有的工资甚至达一万到一万四千卢布。^②

① 数字系据莱奥恩,前引书496页。

② 引自西德的经济管制机构代表团所发表的报告,15页。例如,1937年一名工程师由于很快地装配好两台钻机而得到八千三百二十卢布和八千卢布两笔奖金(俄文《工业》杂志,1937年12月31日)。1939年,一位经理由于提前完成计划和降低生产成本得到了一万二千卢布奖金(俄文《企业》杂志,1939年8月29日)。1942年,若干主要工业企业的经理领到高达五万到十五万卢布的新大林奖金(1942年4月11日《真理报》)。见G·宾斯托克、S·M·施瓦茨和A·约各夫著的《俄国工农业的管理》(1944年伦敦英文版)95页。其他的例子,见米纳特,《苏联人》114页及以下。

达林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占全部就业人口约百分之十二到十四的知识分子家庭,得到了扣除积累资金部分后的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而分别占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百分之五十三和百分之八到十一的工人、农民和劳改犯,各得到全部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百分之二十九和百分之二到三。^①

苏联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特别富裕。除了高收入外,他们还得到许多其他的享受,例如:免费的公家住宅、由国家支付薪金的助理人员、免付租金的乡村别墅、第一流医院医生的免费医疗服务、豪华的黑海海滨别墅和在特种商店购物的特权,等等。^②

给予最高层官僚、著名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以高薪、特权和奖金的目的^③是为了使他们在苏联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生活得舒适,但不容许他们作比较大量的投资和为他们的后代获得同样的好处,这种说法即使在战前时期也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是真实的。

① 见达林,前引书98页及以下。达林过高估计专业人口中劳改犯的百分比。因此国民收入中工人所占的份额与知识分子比较可能高一些。

② 见米纳特,《苏联人》52页。关于这些特权,有意思的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给予上层官僚有功劳的成员的寡妇和孩子以特殊的抚恤金。实例,可见英克尔斯,前引书470页。又见M·德热拉斯,《新阶级》(1958年慕尼黑德文版)86页。

③ 据苏联资料(1937年6月27日《真理报》),1937年住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艺术家的收入如下:超过一万卢布的十四人,六千到一万卢布的十一人,二千到三千卢布的三十九人,一千到两千卢布的一百十四人,不到五百卢布的四百人。在这方面,又见A·伯格森,《关于苏联收入的不平等》,载英文《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1951年4月)95页及以下。

另一个重大的政策改变是1945年在继承权^①方面的改革和1948年8月26日颁布的法律,后者保证每个苏联公民有权通过购买或自建的方式在市内或市外拥有一幢住宅。^②诚然,这只能是一层或两层楼的房屋,不得超过五间房。国家将不规定限期,把能建造这种住宅的地产让与房屋所有人,一般在市内是三百到六百平方米,在乡间是七百到一千二百平方米。根据这项法律,苏联公民只能购置或建造一幢房屋。可是,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任何人继承一幢以上的房屋。正因为这样,所以继承法的改革十分重要,它大大扩大了法定的继承权利,同时由于恢复了立遗嘱继承,实际上撤销了以前对继承权的所有限制。立遗嘱的人可以把他的财产留给任何人,即使受益人同他没有亲属关系。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国库才能从这项政策改革中得到好处。回顾1918年,如所周知,国家是所有财产的唯一继承者。

在1943年废除遗产税之前所进行的继承法改革^③,使个人有获得住宅的可能性,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只有最高层官僚机构的成员和上层知识分子才买得起产业。对他们来说,拥有个人的可以继承的财产是一项巨大的突破。

他们还可以获得象汽车这类供应稀少的奢侈品,并把他

^① 1945年6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修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的命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公报,1945年第8期)。

^② 1948年8月26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公民购置和建造私人住宅权利的命令(1948年8月31日《消息报》)。

^③ 是在1943年税务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见英克尔斯,前引书471页。用收取较低的登记费来代替遗产税。

们的储蓄换成其他珍贵物品。总之，由于这些特权，使上层阶级、中上层阶级和“工人贵族”的上层为一方和群众为另一方之间的社会差别扩大和固定化了。收入和财产方面的差别在促使社会分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其意义并不亚于在教育领域采取的种种措施。^① 一个社会集团具有独立地位的明显标志，是那个集团持续生存下去的能力。我们看到在战前年代里上层社会阶级早就已经在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1932年以来知识分子中出身于工人的和工人子女的人数有了下降。1940年以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发展。1940年，取消了1936年宪法保证的普通中学最后三年以及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免费教育，同时严格限制了奖学金的授与。这样，有产阶级的子女受到教育和从事某项专业的机会，要比广大群众的子女多得多。他们在大学和高等技术院校受到的特殊训练，使他们得到高级的社会地位，以及与这种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超过平均的收入和许多特权。

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发展已有这种性质，即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地来自大学生和中等技校毕业生。军官团也不例外，因为高级司令官要求从相应的军事学院来补充人员。在苏联，每一个有资格进入大学的学生都自然而然地成为预备役军官。但就军官团而论，优先录用的是大学毕业生和军官的儿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立了苏沃洛夫和纳希莫夫军官学

^① 见安韦勒所写一文。

院，专门训练有培养前途的军官。还设立了类似的学院来培养党机关和国家官僚机构的候补行政人员。1946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设立的社会科学院和高级党校，就是为了培养高级党政官员。高级外交学校和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则训练新的高级外交官员。还有一所专门的国内安全学院培养准备担任公安工作的人员。

这些职业上和教育上的特权，大大促进了苏联阶级社会的发展。在斯大林时期，向等级社会发展的明白无误的趋势已经表现出来。1938年到1940年采取的使国家对劳动力分配实行全面垄断的残酷的劳动措施^①，引起了这个趋势。在战争的刺激下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劳动力组织，又使这个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这一切所产生的社会等级划分，直到今天仍然盛行于许多领域。这种等级制度所带来的纵的阶层划分，特别是当它同苏联社会自然的横的阶层划分结合起来时，加深了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差别，势必巩固它们之间主要在职业关系上的壁垒。这样，各个阶级之间的差距扩大了，造成社会和政治领导人的进一步脱离群众。这种等级制度或社会等级，实际上是恢复了作为沙皇俄国特征的许多等级划分。^②当然，这些等级并不采取象彼得大帝采用的那么精心和彻底的形式。但是，采用十月革命已经废除的军衔，以及相应的勋章、制服和特权，确是引人注目地回复到革命前时代的形

^① 见B·但尼维茨和B·迈斯纳：《现代国家的宪法》（1947年汉堡德文版）第1卷144页及以下。

^② 见K·H·罗夫曼写的《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社会变革》一文。（原收入本文集，本书未译出。——译者）

式和风尚。^①

按照 1935 年 9 月 22 日、1935 年 10 月 16 日和 1936 年 4 月 26 日分别颁布的条例，早已在红军、秘密警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农民兵中采用了军衔和相应的徽章。1940 年以来又陆续通过了采用军衔、等级徽章和相应的制服的各种法令。下列日期清楚地标明了恢复旧习惯的步骤：^②

1940 年 5 月 7 日：颁布红军陆军和海军的将军、元帅和海军上将的军衔和徽章。

1941 年 5 月 9 日：颁布驻外外交代表的职衔。

1942 年 5 月 21 日：颁布国家警卫部队的军衔和徽章。

1943 年 1 月 6 日：颁布红军陆军全体官兵的军衔和徽章（军官佩带金黄色肩章）。

1943 年 2 月 9 日：颁布公安部队（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员的军衔和徽章。

1943 年 2 月 15 日：颁布红军海军全体官兵的军衔和徽章。

1943 年 5 月 28 日：颁布全体外交官的职衔和徽章。

1943 年 9 月 4 日：颁布铁路员工的等级和徽章。

1943 年 9 月 16 日：颁布检察官员的职衔和徽章（国家检察官员和地方检察官员）。

① 作者早就注意 1950—1951 年这一值得注意的发展了。见《转折中的俄国》4 页。

② 有*号的法令已为 1954 年 7 月 12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撤销；有**号的法令则为 1956 年 10 月 11 日的命令废除。见《苏联法令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汇编（1938—1961）》（1961 年莫斯科俄文版）556 页及以下。从事铁路交通、内河航行、民航运输的人员，只废除肩章。

1945年6月26日：颁布苏联大元帅最高军衔。

1945年7月6日：颁布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高级警官(包括预备役部队)的军衔和徽章。

1947年9月1日：颁布内河航运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1947年9月10日：*颁布煤矿和矿井建筑业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1947年10月14日：*颁布地质工作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1947年12月10日：*颁布黑色冶金工业的采矿业和矿山建筑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1948年3月20日：*颁布有色冶金工业的采矿业和矿山建筑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职衔和徽章(有色冶金工业部和内务部)。

1948年7月3日：颁布商船运输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1948年7月10日：*颁布财政和银行管理人员及其他负责官员的职衔和徽章。

1948年11月8日：*颁布化学工业的采矿业和矿山建筑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1948年12月13日：颁布邮电工作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1949年1月28日：颁布国家采矿检查总局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1949年4月6日：颁布北方海运总局行政官员的职衔和徽章。

1949年5月18日：*颁布国家检验工作行政官员及其他

负责官员的职衔和徽章。

1949年6月10日；**颁布内务部测量绘图总局行政官员与技术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1949年6月17日；**颁布征购部门行政官员与负责官员的职衔和徽章。

1949年6月25日；颁布交通运输部警卫人员的军衔和徽章。

1949年7月3日；颁布捕渔船队行政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1950年1月11日；*颁布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1950年2月25日；颁布民用航空领导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1950年12月28日；颁布水力技术和船舶修理站行政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1951年5月24日；*颁布电力工业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1953年10月13日；*颁布木材和造纸工业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职衔和徽章。

举例来说，根据1948年3月20日颁布的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1948年第12号），有色冶金工业采用了下列职衔和称号：

（一）最高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地位：

总矿长	一级
总矿长	二级
总矿长	三级

(二)高级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地位:

矿长 (特级)	
矿长 (或矿山管理处处长)	一级
矿长 (或矿山管理处处长)	二级
矿长 (或矿山管理处处长)	三级

(三)中级技术人员的地位:

采矿工程师 (或采矿技术员)	一级
采矿工程师 (或采矿技术员)	二级
采矿工程师 (或采矿技术员)	三级

(四)低级技术人员的地位:

初级采矿技术员	
高级采矿总工长	
采矿工长	一级
采矿工长	二级
组长 (井下生产组)	

如果把生产组长一级撇开,共有十四级,同彼得大帝时代存在的等级如出一辙。它仿照苏联军事编制的模式。根据1943年7月24日颁布的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1943年第28号),红军陆军的普通士兵、军士、军官和将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线,而少校以上的参谋军官则享有特别突出的地位。这样,在采矿工业中,从生产组长到初级采矿技术员相当于军士的级别;从三级采矿工程师到矿长相当于军官;从三级总矿长到一级总矿长相当于将军的级别。而矿长则相当于参谋军官。

1943年9月16日颁布的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

1943年第39号),在国家检察机关中设置的职衔也有同军衔相当的级别;①

级别	职 衔	相当的军衔
较高级人员的地位		
1	国家首席检察长	大将
2	一级国家检察长	上将
3	二级国家检察长	中将
4	三级国家检察长	少将
高级人员的地位		
5	高级检察长	上校
6	检察长	中校
7	初级检察长	少校
中级人员的地位		
8	一级检察员	大尉
9	二级检察员	上尉
10	三级检察员	中尉
11	初级检察员	少尉

检察机关中的侦查员相当于军士的职衔。最高级别是苏联总检察长,这标志着回复到沙俄时代的检察大臣。苏联外交官现行的等级制度表明,即使在通常存在着等级的那些行政部门里,苏联的制度也比其他国家更为复杂。

苏联外交官的等级:

特命全权大使

① 这种级别已于1954年7月12日的命令取消。

一级公使
二级公使
一级参赞
二级参赞
一级一等秘书
二级一等秘书
一级二等秘书
二级二等秘书
三等秘书
随员

1946年3月15日颁布的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 1946年第10号), 把各人民委员部更名为各部, 人民委员会议更名为部长会议, 这也是回复到革命前传统的名称。^① 这些职衔还在有关专业部门中被部分地采用, 即使它们并不属于同一中央机构的管辖下^②。斯大林逝世后, 这种职衔制度甚至有了进一步的扩大。日用品工业部在1953年11月为女帽和妇女头饰制造业采用了这样一些奇怪的称号: 配色师, 设计师和女帽及妇女头饰师, 并都分为一级、二级、三级。^③

在三十年代, 开始授给“功勋教师”、“功勋医生”和“功勋科学家”等荣誉称号。以后, 又授给“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38年)、“苏联人民艺术家”(1943年)和“母亲英雄”(1944

^① 教育界恢复传统形式就是重新施行表扬优秀的中学毕业生, 在1943年是授与金质和银质奖章, 1945年则授与国立大学毕业生纪念奖章。

^② 比如根据1950年8月4日命令(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 1950年第22号), 把地质部管理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的职衔和徽章颁给内务部地质局成员。

^③ 见1953年11月11日《真理报》。

年)等称号。战后,创立了以下各种称号:“斯大林奖金获得者”(1945年)、“功勋动物学家”和“功勋兽医”(1949年)、“功勋农学家”和“狩猎能手”(1953年)、“功勋试飞员和驾驶员”(1958年)和“功勋宇航员”(1961年)。

就授予其公民勋章、称号和职衔来说,目前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与布尔什维克俄国相比。由此也可以看出,授给光荣称号和徽章是同相应的特权联系在一起的。

即使人们假设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刺激人们作出更大的成就(在斯大林时期确实是这样的),但终于出现的等级制度已养成了一种官僚主义的精神状态,使得公众生活有些死气沉沉了。^①

除了独裁统治者的善意之外,这种模仿沙俄的职衔,被吹捧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这些旧式的特权象征,有助于巩固官僚集团,特别是它的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中的技术专家的社会地位。可是,知识分子中那些专事创作活动的成员——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却在战后时期有理由感到不满。

对于这种制度的所有改革,都受到上层官僚(首长)的阻挠,他们担心即使有限的自由化也会危及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为了这个原因,他们反对象赫鲁晓夫所鼓吹的那种在农业领域的革命试验。^②

在大战时期,集体农庄制度的严格程度多少有所放松。集体农庄农民抓住这个机会,不经批准就扩大了他们的自留

① 见莱奥恩,《苏联的社会分化》496页。

② 见劳奇,《布尔什维克俄国史》530页及以下;劳帕赫,《苏联经济史》103页及以下;席勒,《苏联的农业制度》51页及以下。

地。根据1935年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的规定，自留地限制在零点二五公顷到零点五公顷之间，在特殊情况下允许达到一公顷。

战后，再度加强了控制，尽管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列耶夫赞同的农业政策是大力推广独立劳动小组制度，以便更易照顾到集体农庄农民的家庭关系。1949年末，赫鲁晓夫接管了农业政策的领导工作，他想要把三、五个集体农庄合并成一个大集体农庄，这样就能有一百人到一百五十人的生产队。1950年后，二十五万二千个集体农庄被合并为十二万五千个大集体农庄，^① 因为赫鲁晓夫坚持把小村庄和单块农田合并成称为“农业城市”的大集体农庄。这个“第三次土地革命”计划将把束缚在土地上的集体农庄农民变成农业工人，但斯大林和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成员认为过于冒险，因而赫鲁晓夫在1951年3月不得不加以放弃。

战后，工人和小职员以及集体农庄农民的状况不断恶化。尽管1947年实施了币制改革，而且随之降低了物价，但1948年的实际工资下降到1938年的比率，大致相当于1940年的水平。而名义上的平均工资却比1938年高出一倍。^② 当1950年后第三次降低物价时，由于实行了卢布的金本位制，实际工资接近于但尚未达到1938年的水平。1951年后，形势甚至更加恶化了，特别在农村，斯大林对于应当执行什么样的

^① 到1952年，这样的大集体农庄有九万七千个，每个平均约为一千七百公顷（休耕地包括在内）。见劳帕赫，《苏联经济史》104页。

^② 见美国学者圆桌会议讨论《苏俄有多强大？》，载英文《新共和》杂志1949年5月。《卢布和降价》，载德文《东方问题》第2卷（1950年）310页及以下；《卢布的购买力》，载德文《东方问题》杂志第2卷（1950年）414页及以下。

农业政策摇摆不定。^① 据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曾经考虑过解散国营农场，把它们并入集体农庄。^② 从1951年秋季到1952年春季赫鲁晓夫受到暂时挫折之后，随着独裁者的逝世，贝利亚（看来他和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的最重要的顾问）赞成扩大集体农庄农民的自留地。^③

苏联国家公安部门的特殊地位（它在斯大林时期是一个“国中之国”），^④ 是同它在经济方面统治权的扩大以及它在多次流放中所起的作用相联系的：结果是在战后强迫参加劳动的劳改犯数字有了显著增加。这些劳动者对于开发苏联东部地区十分重要，这项开发工作在1930年就已迅速进行，并在战前建立了乌拉尔—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于1941年8月16日通过了战时经济计划，规定把与军事有关的工业大规模向东部地区迁移。这次战争大大加速了经济的大规模东移。^⑤ 仅在1941年就拆迁了一千一百个工厂；从1942到1944年，有二千二百五十家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工厂迁往新的地点进行生产。向东部地区迁去了一千五百万人，以充实劳动力供应，其中很大一部分在那里留了

① 见R·列文塔尔：《斯大林的遗嘱》，载德文《月刊》第5卷55期（1953年）20页及以下。

② 见B·迈斯纳：《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5卷（1965年）8页。

③ 在贝利亚垮台以后曾谴责过他动摇集体农庄制度。见B·迈斯纳：《斯大林逝世以后》，载德文《东欧》杂志第3卷（1953年）284页。苏联报刊中曾提到过他企图扩大自留地的事。

④ 见迈斯纳：《转折中的俄国》28页及以下。

⑤ 见A·西吉尔：《苏联国防工业的三个地区》，载德文《欧洲文库》第4卷（1949年）2399页及以下。

来。这样，随着这个地区的工业化，西伯利亚、土耳其斯坦和东部边远地区的人口稳步增加起来。从1939年到1944年，这些地区的城市人口由一千五百六十万人上升到二千万人，^①使整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1939年和1940年期间，斯大林的征服政策把苏联的领土从二千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扩大到二千二百一十万平方米。苏联的人口，从1939年1月17日的一亿七千零六十万，上升到（以1939年的计算为基础）一亿九千零七十万。^②

从农村和城市人口的比例来看，农村人口约有百分之一的增加（从67:33到68:32）。所有这些地区，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实际上比俄国中部先进，它们的社会结构已与苏维埃的模式一致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推行征服政策，使苏联领土得到进一步的扩大（现在包括东北普鲁士在内），从二千二百一十万平方米扩大到二千二百四十万平方米。新占据的地区需要一个苏维埃化的过程。由于战争和劳改营制度所造成的苦难，苏联人口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尽管领土扩大了，苏联的总人口1940年1月1日估计约有一亿九千四百一十万人，到1950年1月1日却下降为一亿七千八百五十万人。到1953年1月1日，又增加到约一亿八千八百万人，仍然低于1940年数字的水平。在1940年到1953年间，城市人口由六千三百一十万人（百分之三十三）上升到八千零二十万人（百分之

^① 这些数字系据西吉尔，前引书2402页。

^② 数字系据《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8页。

四十三),农村人口则由一亿三千一百万人(百分之六十七)下降到一亿零七百八十万(百分之五十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在国家人口中所占的优势。在城市中,这一事实同劳动人口中妇女的数目日益增加有关。1936年,妇女在工人和职员中占百分之三十四,而1940年到1942年之间,这个数字从百分之三十七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五。在工人中的比重甚至更大,1936年为百分之三十六,1940年为百分之四十,而由于战争的关系,1942年为百分之七十,战后为百分之四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七。在西欧的相应数字为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在美国为百分之十五。^①当苏联在1939年至1953年之间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军事大国的同时,它发现自己处在被一个教养和文化更为先进的世界的包围之中。斯大林对外国影响的担心,促使他在1946年采取一项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政策,并从内部加强社会控制。^②这个政策进一步巩固了以现有集团形式表现出来的苏联阶级社会,并加强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但是,与此同时,这个政策却妨碍了为扩大十分狭窄的保持苏联作为世界大国的社会经济基础而采取的措施。

5. “新方针”与赫鲁晓夫主义(1953年—1964年)

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在重工业、技术训练和自然科学方

^① J·陶华斯特,《苏联的政治权力,1917—1947》(1948年纽约英文版)330页及以下。

^② 关于“日丹诺夫主义”,见劳奇,《布尔什维克俄国史》532页;迈斯纳,《日丹诺夫》20页及以下。

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被苏联理论家欢呼为进步的光辉榜样。但为这个进步所付的代价是很高的。它不但以数以百万计的人类生命和广大群众的低生活水平作为代价，并且由于国家拥有无限权力以及文化和知识方面的停滞不前，而牺牲了个人的自由。在斯大林晚年，这种瘫痪情况扩大到经济方面，从而增加了社会的紧张状态并加深了广大群众的困苦。

走向一个以社会等级为基础的国家的这种倾向，越来越使苏联人民的创造力受到压抑。而且，由于国家的组织化所造成的社会地位的可变性和个人首创精神的丧失，并没有为领导人试图建立的社会等级制度和阶级制度所抵消。

看来斯大林在他的晚年已越来越意识到这些国内问题。^① 无论如何，在他逝世前夕，他赞同对个别的革命斗争采取不同的改革政策。在1950年的语言学问题讨论之后，出现了即将在苏联生活的若干领域中发生“非斯大林化”的最初迹象。^② 斯大林逝世后，从冠以他的名字的社会制度后退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是马林科夫采取的“新方针”，以适应普遍要求有更多的消费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文化知识方面更多的自由。^③ 在这方面，大部分劳改营的解散，同更加深切地关心城乡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以及文学艺术方面的“解冻”，是同样重要的。

① 见E·鲍特契尔，《十字路口的苏联经济政策》（1959年杜宾根德文版）245页及以下。

② 见鲍特契尔-李别尔-迈斯纳，《赫鲁晓夫时代的结算表》（1966年斯图加特德文版）。

③ 见W·列昂哈特，《没有斯大林的克里姆林》（1959年科隆德文版）122页及以下；塔尔海姆，《苏联经济制度基本特征》41页及以下。

第一次“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巨大浪潮，是由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2月）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掀起的。^① 第二次不太成功的反斯大林高潮由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1961年10月）发动，这次大会通过了一个新党纲。^②

俄国的社会发展深受这些行动的影响。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赫鲁晓夫在推行这种冒险政策时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有以下几种考虑：（一）通过放松极权主义独裁统治制度和使其现代化，并更多地考虑个别社会阶层的利益，以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政权；（二）通过经济计划工作的合理化和现代化，并同时取得社会的自发支持，以提高苏联经济的生产率。

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政策，经过多次修改，体现在名目繁多的改革措施之中，特别是有关党、国家和经济管理的政策，以及有关教育、法律和军事问题的政策^③；同时也体现在七年计划（1959—1965年）和二十年计划（1961—1980年）之中。^④ 这一“非斯大林化”政策是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① 原文见迈斯纳著的《斯大林神话的结束》（1956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175页及以下。

② 见B·迈斯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结果》，载德文《欧洲文库》第19卷（1962年）73页及以下；及同一作者著的《苏联共产党党纲，1903—1961》（1962年科隆德文版）。

③ 见B·迈斯纳，《赫鲁晓夫统治下的俄国》（1960年慕尼黑德文版）。又见他著的《赫鲁晓夫的对内政策》，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1卷（1961）81页及以下；《赫鲁晓夫的行政大改革》，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3卷（1963年）81页及以下；《苏联共产党的两条战线斗争》，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3卷（1963年）577页及以下；《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5卷（1965年）1页及以下。

④ 关于七年计划的分析及原文，见B·迈斯纳，《赫鲁晓夫统治下的俄国》203页及以下，472页及以下；关于二十年计划，见B·迈斯纳，《苏联共产党党纲》72页及以下，189页及以下。

的修正联系在一起，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在斯大林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个修正主要表现在诸如“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等思想。^①同样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将在后面加以讨论。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只是局部地适应现实，根本不能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相提并论。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垮台表明，单靠宣传运动和组织上的改变是不足以克服苏联的社会紧张和经济困难的。^②

赫鲁晓夫主义的社会意义主要在于，苏联领导人在受到责难的情况下抛弃了斯大林的孤立主义政策，并再次容忍社会多元化的措施，以走向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

1954年7月在非军事部门中取消了大部分等级差别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956年2月设立寄宿学校，1956年7月恢复普通中学高年级学生免费教育，以及1958年12月根据工艺教育思想而进行的教育改革，^③同样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些改革不仅指望增加合格的熟练工人和工长的人数，还指望结束在大学教育方面迎合知识分子的做法，并消除他们的子女轻视劳动的态度。^④与此同时，党指望在新涌现的“从事创

^① 见F·C·施罗德，〈根据苏联共产党新党纲来看国家和法的内容及发展〉，载德文《东方法年鉴》第3卷第1期（1962年）45页及以下，第3卷第2期（1962年）49页及以下。又见迈斯纳，〈苏联共产党党纲〉98页及以下。

^② 见B·迈斯纳，〈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5卷（1965年）1页及以下，138页及以下，217页及以下。

^③ 见安韦勒-梅耶，〈1917年以来的苏联教育政策〉44页及以下，迈斯纳，〈赫鲁晓夫统治下的俄国〉115页及以下，226页及以下。

^④ 见R·A·费尔德密瑟，〈赫鲁晓夫统治下的平等和不平等〉，载英文《共产主义问题》第9卷第2期（1960年）35页及以下。又见收于后书中的安韦勒的文章。

造性活动的知识分子”中扩大影响，并为他们设置专门学校。

还有，1957年经济委员会的行政改革，1958年机器拖拉机站的解散，以及1962年把党分为两个部分，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增加工农业生产，而且是为了提高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的社会地位。^① 1956年以来，^② 通过加速对党的经济工作人员的技术训练，党还指望对工农业进行直接的领导，从而使党的工作人员较少依赖“技术知识分子”。

斯大林在知识分子中把党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提高到与其余高层官僚同等的地位。比起其他统治集团来，赫鲁晓夫同样偏袒党，并在制度内部给它以特殊的地位。^③ 不过，他采取措施来支持主要的党机构中的无产阶级分子，以削弱党的工作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集团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是由于他们都共为社会的知识分子成员而产生的。他还采用了一种轮换制度，以抵制给予党的工作人员某些终身特权的做法。^④

赫鲁晓夫采取的用放松控制来减少恐怖统治以及用提供

^① 关于行政改革，见B·迈斯纳，《赫鲁晓夫统治下的俄国》20—85页及《行政大改革》89页及以下。又见《苏联统治制度及宪法权利的改变》，收于鲍特契尔-李别尔-迈斯纳，《赫鲁晓夫时代的结算表》148页及以下。1963年3月13日部分改革的结果，赫鲁晓夫的大行政改革向着较大的中央集权的方向改变，而且是一种他所并不期望的方法；党的行政机关分为城市工业部和农村农业部的办法，在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取消了。见迈斯纳，《苏联共产党的两条战线斗争》578页及以下。又见他著的《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148页及以下。

^② 见W·列昂哈德，《斯大林以后的党的训练》，载英文《调查》杂志第20期（1957年10月）10页及以下；《内部发展，一张平衡表》，载英文《共产主义问题》第12卷第2期（1963年）4页。

^③ 见S·培勒，《但有些人较另一些人为平等》，载英文《共产主义问题》第9卷第2期（1960年）48页。

^④ 见培勒：前引书45页及以下。关于轮换制度见迈斯纳，《苏联共产党党纲》107页。

更多物品来满足人民需要的政策，不但使他为广大群众所喜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欢迎。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他偏袒党机关，忽视其他工作人员的“正当权利”，并谋求制度的重新无产阶级化，使得技术专家和从事创造性活动的知识分子中反对他的人成倍地增长起来。他试图把最高工资降低到一千二百卢布并取消个人奖金，这就威胁到所有高层工作人员的收入。

赫鲁晓夫的行政改革触怒了各部的官僚以及工厂和机器拖拉机站的管理人员。欢迎行政管理分散和工厂有较多的自治的经济工作人员，对赫鲁晓夫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控制和赋予工会以更多权利深为不满。计划专家对赫鲁晓夫缺乏现实主义的态度感到沮丧。工人和小职员一般被认为是“赫鲁晓夫主义”的受益者。1956年7月增加养老金对他们特别有利。1959年初以后，赫鲁晓夫努力把最低月薪由二百七十卢布增加到三百五十卢布，后来又从五百卢布增加到六百卢布，并削减高薪使高低薪彼此接近，同样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利益。^①他还想通过币制改革以及他在1960年5月宣布的逐步取消所得税和大大缩短工作日的计划，来达到这个目的。^②但由于国防开支增长所引起的越来越大的经济困难，使赫鲁晓夫无法实现这些计划。1962年夏天，他被迫提高黄油和肉类的价格约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规定工资的最高限额，并放弃进一步减税的计划。1963年的歉收，更增加了向人民提供必需

^① 见费尔德密瑟：《赫鲁晓夫统治下的平等和不平等》34页；培勒：《但有些人较另一些人为平等》43页。

^② 见K·塔尔海姆：《苏联经济和政治状况考察》30页及以下。

物品和服务问题的复杂性。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由于前此的工资增加而略有上升，现在又再一次开始下降了。^①

那么多人的失望情绪是不可能通过改进职员的法律地位^②，扩大工人管理工厂的权利，^③降低某些零售物价，或者增加一些社会福利而得到适当补偿的。^④

马林科夫大幅度降低了集体农庄农民的税款，赫鲁晓夫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事。^⑤除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并将拖拉机停车场并入集体农庄之外，赫鲁晓夫设想的农业改革将规定向国家交售产品的统一价格，^⑥大量增加集体农庄的收入，^⑦并实行集体农庄农民的养老金制度。^⑧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打算把集体农庄合并为大型的集体企业，或者把它们转变为国

① 见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经济部主任阿干皮强教授起草的大纲，载英文《社会主义评论》（1965年10月）。E·奈什的估计（《苏联工人的购买力》，载英文《每月劳动评论》1960年第4期）表明，典型的苏联工人为了要满足他家庭的基本需要，1959年比1928年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百分之八。

② 见W·米德尔：《苏联劳工法的自由化倾向》，载德文《东方法年鉴》第1卷第2期（1960年）85页及以下。

③ 见迈斯纳：《赫鲁晓夫统治下的俄国》83页及以下，107页及以下；K·塔尔海姆：《斯大林以后时期苏联经济制度的改变》，载鲍特契尔-李别尔-迈斯纳：《赫鲁晓夫时代的结算表》123页及以下。

④ 见A·诺维：《苏联的社会福利》，载英文《共产主义问题》第1期（1960年）1页及以下。

⑤ 见席勒：《苏联的农业制度》55页及以下。

⑥ 见席勒：前引书70页及以下；塔尔海姆：《苏联经济和政治状况考察》25页及以下。

⑦ 见费尔德密瑟：前引书34页；培勒：前引书41页及以下。集体农民每月平均收入（货币和产品），尽管1958年有所增加，还是低于农业工人和职员的最低工资270卢布。

⑧ 见迈斯纳：《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10页。

营农场，建立集体农庄联合组织，提高公积金，废除草田轮作制以及限制自留地等，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对。^①

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立即采取了削减劳改犯大军的决定性措施。根据苏联的报导，1953年3月以来，在全部劳改犯中有百分之八十五已被释放。^② 1956年10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条例，把大部分劳改营改为“劳动区”。劳改营制度显然并未全部撤销，而是继续为政治犯保留着。^③

1953到1959年之间，苏联人口从一亿八千八百万增加到二亿零八百八十万，而且根据苏联的估计，到1964年1月1日很可能达到二亿二千六百三十万人。^④ 1953至1959年期间，城市人口从八千零二十万(百分之四十三)增加到一亿(百分之四十八)，同时农村人口则从一亿零七百八十万(百分之五十七)增加到一亿零八百八十万(百分之五十二)。在进入六十年代时(1960—1961年)，城市人口在绝对数字上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百分比是五十对五十)。1964年1月1日，城市人口估计约为一亿一千八百六十万(百分之五十二)；农村人口则为一亿零七百七十万(百分之四十八)。

1939年女性人口为八千八百九十万(男性为八千一百七十万)，1959年女性人口总数为一亿一千四百八十万(男性为九千四百万)，1964年女性为一亿二千三百一十万(男性为一

① 见席勒，《在过渡到共产主义标志下的苏联农业》，载德文《东欧-经济》杂志第7卷(1962年)162页及以下。集体农庄的数目1954和1959年间从八万九千减至五万四千六百。

② 见迈斯纳，《赫鲁晓夫统治下的俄国》225页及以下。

③ 见迈斯纳，《行政重建》，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0卷(1954年)285页。

④ 这些数字系据《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8页。

亿零三百二十万)。1939年女性的百分比达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一,1959到1964年期间从百分之五十五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四点五。^①因此,妇女的人数大大超过了男子,这一事实在农村地区尤为显著。战后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958年达到了高峰,那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十八点一,1963年下降到千分之十四。

在赫鲁晓夫统治下,东部领土的开发主要是由于在西伯利亚东部建设了“第三冶金基地”(依七年计划的规定)以及在哈萨克和西伯利亚西部开辟了新的居民区。^②结果是这些地区的人口增加要比全苏联的平均增加数字稍高一些。

在这里有必要对苏联的社会结构作比较仔细的研究。在1937到1959年期间,职员的人数从九百六十万增加到一千七百三十万(净总数);在同一期间,工人(包括农业工人)的人数从一千七百三十万上升到三千九百六十万(净总数)。^③但是,城市劳动力的增长远低于农业工人的增长。1959年,全部生产工人中有百分之四十四到五十五在苏联工业中只是当作辅助工使用。在全部苏联产业工人中,有百分之四十七的工人实际上并不从事机器或其他机械设备的操作,而是在干着体力劳动。^④根据达林的估计,1940年集体农庄农民的

① 数字系据《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9页。

② 见迈斯纳,《赫鲁晓夫统治下的俄国》219页。

③ 资料来源可在后文第二部分中找到。

④ 见俄文《计划经济》1960年第8期45页及以下;俄文《经济问题》1960年第1期36页及以下。1948至1958年间机器工人和维修设备的工人的数目从百分之四十四点三增加到百分之五十,而同一时期手工工人的数目从百分之五十五点七下降到百分之五十。见《苏联的劳动资源》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58页。

人数接近四千万，1959年下降到三千三百万。再加上六百万农业工人，主要从事农业的人口合计约为三千九百万人。到1959年，苏联全部就业的劳动者中仍有百分之三十九点三从事农业，这在美国是百分之十到十二，在西德是百分之十五到十六。^①然而苏联农业的生产率却大大落后于这两个国家。苏联一直有些担心，实施自动化特别是农业的全盘机械化可能导致劳动力的过剩。

在1941年到1964年期间，受大学教育或高等技术院校训练的专家人数从二百四十万增加到一千零六十万，这对知识分子即大多数职员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事情。^②

日益重要的大学毕业生队伍，加强了那些策划有限度地脱离斯大林主义的力量。但他们在政治上还太软弱，不能造成较大的变革。不过在党的独裁控制开始有所放松的时候，他们在苏联社会上的力量却在增长。苏联公民越来越意识到被这个政权所否定的个人的固有尊严。而且，一种“舆论”已经开始在苏联形成。当然，这和我们所理解的西方世界的“舆论”是几乎不能比拟的，不过，它正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出现。第一，一万个高层成员也就是俄国人所说的“上层”的意见，是斯大林的继任者很难置之不理的。在这一万人中，大都是主要党机构的上层决策人，即党的头目，但是其中也包括属于苏联上层知识界的人物。第二，苏联社会上广大群众没有说出来而主要由文人为他们表达的意见，这些文人只有一部分

^① 这些数字的来源可以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找到。

^② 数字系据《1963年苏联统计数字》（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至1963年底共有一千零六十万名专家。

属于苏联的上层社会。^① 苏联作家组成苏联进步力量上层的大多数。我们所说的“进步人士”，是指所有那些谋求放松这个政权的极权主义和加快社会变革步伐的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集团。苏联进步文人没有受到党制止的对社会的批评，是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的表现，也是对在苏联阶级社会中实在太明显的社会不公正和缺乏自由的抗议。

这些进步人士在斗争中得到许多人的赞助，其中有老一代的代表人物如鲍斯托夫斯基、爱伦堡等，他们在二十年代的青年时期曾倾向世界主义；也有青年一代已被确认的先锋派叶甫图申柯、阿克谢诺夫等；中年一代的某些人如特瓦尔多夫斯基、西蒙诺夫等也支持进步人士。

在党的赞同下，社会上某些反动势力发动了一次反击。这部分人大都是在斯大林时期得势和有影响的中年一代的年龄较长人士。由于这种不同年代人之间的冲突涉及文化领域各个方面，它是头等重大的政治事件。

这场论战甚至泛滥到整个文学艺术界；在这里，主张强硬路线的人在史学界和哲学界的影响最为强大，^② 虽然他们在

^① 见H·冯·萨契诺，《人的起义》（1965年柏林德文版）；L·弗罗森，《俄国新文学中的人》（1962年腊廷根德文版）；K·米纳特，《新近苏联文学中的人道主义》（1963年维斯巴登德文版）；米哈依洛夫，《1964年莫斯科的夏天》6页及以下；派潘斯所编《俄国知识分子》（101页及以下，111页及以下）一书所收海姆逊和海华德的文章；海华德，《没有生气的苏联文学》，载英文《共产主义问题》第8卷第4期（1959年）11页及以下；A·Zr.，《一代的良心》，载英文《共产主义问题》第10卷第8期（1961年）7页及以下；D·布尔格，《文学战线上的“冷战”》，载英文《共产主义问题》第11卷第4期（1962年）1页及以下，第3期33页及以下，第12卷第1期（1963年）44页及以下；R·亨格莱，《文化场景》，载英文《共产主义问题》第12卷第2期（1963年）41页；V·法兰克，《文艺气候》，载英文《调查》杂志1965年7月46页及以下。又见德文《东欧》杂志上巴尔巴拉·波德的报告。

法学界和经济学界控制有所放松。^③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坚持要有一门独立的“政治科学”^④。

赫鲁晓夫在下台前不久极力试图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他在1963年3月8日的演说中非常清楚地说明党不会容忍这些领域中的不同意见，他要求所有作家和艺术家严格坚守党的路线。^⑤按照赫鲁晓夫的意见，文化领域中不同意识形态的并存，如同认为艺术家的努力可以是非政治性的，都同样是不容许的。赫鲁晓夫尖锐地斥责那些坚持把探索真理的性质和自由问题作为他们创作活动的本质的作家。

真理问题主要是探索如何清除丑恶的往事。自由问题则指向未来。这两个问题在批判社会弊端方面事实上是有联系的，结果就要求变革不符合真理和自由这两个概念所固有的伦理标准的现状。因此，最近苏联关于自由概念的辩论把对真理的探索同眼前的政治现实结合起来。

^② 见H·达恒，《苏联哲学转变中的辩证法》（1963年科隆德文版）及K·马尔科，《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苏联历史学家》（1964年科隆德文版）。

^③ 见K·惠斯丹，《斯大林逝世后的法律改革》，收于鲍特契尔-李别尔-迈斯纳；《赫鲁晓夫时代的结算表》189页及以下，H·劳帕赫，《1953年以来经济学理论的重新活跃》132页及以下。

^④ 见A·布劳德生，《苏联社会理论的新趋势》，载《美国斯拉夫人和东欧评论》第17卷（1958年）282页及以下；G·费希尔，《科学和政治学：苏联的新社会学》（1964伊锡加英文版），R·阿尔柏格，《苏联经验主义社会研究的发展》（1964年柏林德文版）及《苏联社会科学和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的发展》，收于鲍特契尔-李别尔-迈斯纳前引书278页及以下。苏联这类现代社会学研究的最重要发现，可以在两卷本的集体著作《社会学在苏联》（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中找到。关于苏联与西方社会学争论的论据，见G·V·奥西波夫著的《现代资产阶级经验主义社会学》（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

^⑤ 见P·约翰逊，《政府与知识分子》，载英文《共产主义问题》第12卷（1963年）。

塔西斯在《蓝苍蝇的故事》^①中指出，唯心论者指导的革命会把革命变成监狱般的社会主义，从而变成一种比“东方专制政治”更坏的既定权力。所以，唯一结果必然是“在一党统治和其他党都被禁止的地方，专制是不可避免的。”塔西斯认为，只能期望没有被过去所玷污的青年一代来消除一党专政的极权主义国家。

因此，人们可以预期从现在起大致十五年后，即在1975年左右，会出现一个新的开端，那时过去的幽灵终于被驱除，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人们将真正开始考虑未来，而不是信赖学究式的教条和摇摇欲坠的权威。

自由的意义首先应该理解为自由选举，叶绥宁-沃尔平说得很清楚，

对我们来说，自由含有举行选举的可能性的意思，不只是因为我们要举行一次选举（举行一次选举的必要性有时是可怕的，并且几乎总是不愉快的），而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不在胁迫下投票。^②

^① 见V·塔西斯，《蓝苍蝇的故事》（1963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俄文版）35页及37页以下。

^② 转引自K·亚历山大洛夫著的《自由的骚动》（1961年《自由评论》）18页。苏联作家由于他们要求较大的自由而使他们自己易受责难。如叶绥宁-沃尔平、塔西斯和纳里扎被赫鲁晓夫当作“精神错乱”而幽禁在精神病院里。在赫鲁晓夫垮台以后这三个人都被释放了。苏联作家安德莱·西涅夫斯基和卢里依·但尼尔被捕以后不久，塔西斯在莫斯科同外国新闻记者谈了自己的体验（载1965年10月28日德文《科隆市报》）。他也象阿勃拉姆·铁尔茨和尼古莱·阿尔扎克一样，曾在巴黎出版的波兰月刊《文化》杂志上发表小说。1965年9月初，叶绥宁-沃尔平在莫斯科参加了反对逮捕西涅夫斯基和但尼尔的学生游行示威。他举着写有“尊重宪法！”的标语牌。见1965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西涅夫斯基和但尼尔都同时各被判处七年和五年徒刑。见1966年2月16日和26日德文《新苏黎世报》。在塔西斯赴英国时，他被取消了苏联的国籍。见1966年2月22日《科隆市报》。

这种意见连同地下文学刊物如莫斯科青年杂志《凤凰》和列宁格勒学生杂志《钟声》，都是骚动的征兆，今天的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一代正处在这种骚动之中。^① 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现象曾经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发生过。

除了布尔什维克一党制的正式组织外，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等级已经在苏联发展起来。象冰山一样，只有它的露在外面的部分，即从事创造性活动的那一部分苏联知识分子，是可以看得见的。大部分人民群众仍对政治不感兴趣，对那些当权的人（首长）卑躬屈膝，面对国家则多少有点疏远。一个集团已经逐渐形成，它的成员具有广泛的各种各样的背景，不但在正式的国家机构中自由自在，而且也在开始发展一种政治上共同感的这个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内自由自在。因为这些人生活和行动在两个交叉的领域里，他们已经发展了分裂的人格，叶甫图申柯就是明显的例子。因而今天正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俄国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苏联从事创造性活动

^① 关于世代的问题和苏联青年及学生的情况，见L·海姆逊，《苏联知识分子的三代》，英文《外文》季刊第37卷（1959年）235页及以下；《东欧的世代问题》，德文《东欧评论》第11卷第9期（1965年）2及3页；《苏联青年》（1959年慕尼黑俄文版）；《骚动中的青年》（1962年慕尼黑英文版）；《苏联青年问题》（专刊），德文《苏联研究》1963年第14期；A·柯索夫，《青年对抗政府：准则的冲突》，载英文《共产主义问题》第6卷第8期（1957年）15页；S·V·波将金：《不一致的类型》，同上刊物23页及以下；A·Z·，《一代的良心》，载英文《共产主义问题》第10卷第3期（1961年）7页及以下；《赫鲁晓夫统治下的俄国》7页及以下，116页及以下；D·布尔格，《对于苏联大学生的观察》，收于派浦斯所编的《俄国知识分子》80页及以下。朱丽·邦达列夫·铁希娜的小说《忘记了你是谁》（1962年慕尼黑德文版），描写了斯大林时代的学生。关于1917年以前俄国的学生运动，见G·开司的《革命前俄国学生运动的社会政治作用》（1963年慕尼黑德文版）。

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正在反抗这个国家。不过老的和新的知识分子存在着显著的差别。第一，当前一代的苏联知识分子还不象老的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强烈地倾向欧洲。其次，他们的批判能力还没有达到他们前辈那样的尖锐程度。最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完全不同；他们处在一个阶层分化更为严重的社会，但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又是一个组织更严密的社会，他们比沙皇俄国的知识分子更倾向于社会一致。^①

二、苏联的社会结构

1. 形式上的苏联社会阶级结构

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说法，一个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制度必然会导致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但是在苏联，已发展出来了一个较之资本主义国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新的阶级社会，它同国家的结合甚至比沙皇统治下更为密切。^② 布尔什维克政权尽了一切可能，在统计报告中掩盖思想体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只要选取几个社会集团，并把它们包括在一个大的社会集团之内，就可轻而易举地达到这个目的。人

^① 关于缺少批判的思想以及存在一种一致的小资产阶级的“半知识”，见米哈依洛夫：《1964年莫斯科的夏天》94及98页。关于苏联已建立的秩序的一致性问题的讨论，又见H·J·李别尔著的《苏联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收于鲍特契尔-李别尔-迈斯纳：《赫鲁晓夫时代的结算表》241页及以下。

^② 见D·西林(R·列文塔尔)：《资本主义的彼方》(1947年纽伦堡德文版)147页及以下。

们越来越通过这种大的社会集团看到苏联的外貌。从表二和表三可以看到一些集团在苏联人口的官方阶级结构中逐渐消失。十月革命前组成上层阶层和中间阶层的各个集团，被简单地称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同富农和富裕农民相提并论。同时，工人和职员都在“无产阶级”一个共同标题下被归并成一个更大的集团。甚至在表示特性的“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停止使用以及职员群众已经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之后，还一直坚持用这种分类法。这两个集团（和家属一道）的人数只有在1939年和1959年发表过。而且，1959年又把有组织的家庭劳动者（家庭手工业工人），包括组织合作社后剩下的小工业生产者和小手工业工人，作为工人和职员总数的一部分。一直到1959年为止，这些家庭劳动者一直包括在集体农民之内。剩下的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以及无组织的私人雇用的家庭劳动者，都是较不重要的。这样，在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消灭之后，苏联社会就只剩下两个主要集团，即：（1）工人和职员，以及（2）集体农庄农民。

要理解这种分类的意识形态根据，我们应当提一下苏联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以及城乡之间的冲突。工人和职员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他们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在把工人和农民归并为一个“阶级”的时候，通常的意义是他们都参加物质生产过程；职员方面就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中间有属于知识分子的。

表二 1917—1939年俄国人口的社会成分

(在1939年9月17日以前的俄国边界内)

阶 级	1913		1924		1928		1934		1937		1939	
	万人	百分比	万人	百分比	万人	百分比	万人	百分比	万人	百分比	万人	百分比
1.工人和职员; 工人 职员	2,330	16.7	2,116.4	14.8	2,634.3	17.3	4,711.8	28.1	5,683.9	34.7	8,430.4	49.73
2.集体农庄农民和加入合作 社的家庭劳动者; 集体农庄农民 家庭劳动者	—	—	185.9	1.3	440.6	2.9	7,703.7	45.9	9,090.9	55.5	7,900.5	45.90
3.个体农民和个体的家庭劳 动者; 个体农民 家庭劳动者	9,070	65.1	10,782.2	75.4	11,113.1	72.9	3,790.2	22.5	917.2	5.6	441.4	2.60
4.资本家; 富农	2,210	15.9	1,215.5	8.5	680.1	4.5	17.4	0.10			139.6	0.82
5.其他 (学生、军人、养老金者) 差额	1,710	12.3			561.8	3.7	14.9	0.09			301.8	1.78
人口总数	13,930	100.0	14,330.0	100.0	15,235.2	100.0	16,800.0	100.0	16,380.0	100.0	17,055.7	100.0

资料来源:《苏联》1935年77页;《真理报》1935年1月29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1933年—1938年》(1939年莫斯科俄文版)138页;1938年的数字(不包括极北纬度的地区)见《苏联大百科全书》《苏联》专册50页。1924年的数字是根据1926年人口总数的百分比(《1963年苏联统计数字》21页)计算出来的。(估计在此两年内人口增加四百万)

表三 1939—1964年俄国人口的社会成分

(在1941年边界内)

阶 级	1939		1955		1956		1959	
	万 人	百分比	万 人	百分比	万 人	百分比	万 人	百分比
工人和职员:	9,573.2	50.2	11,333.5	58.3	11,775.0	59.5	14,270.0	68.3
工人							10,080.0	46.2
职员							4,190.0	20.1
集体农庄农民:	9,001.0	47.2	8,009.3	41.2	7,916.0	40.0	6,500.0	31.4
个体农民和个体家庭劳动者:	495.8	2.6	97.2	0.5	99.0	0.5	60.0	0.3
人口总数	19,070.0	100.0	19,440.0	100.0	19,790.0	100.0	20,880.0	100.0

(续上表)

阶 级	1961		1962		1963		1964	
	万 人	百分比	万 人	百分比	万 人	百分比	万 人	百分比
工人和职员:	15,516.0	71.8	16,169.9	73.6	16,576.3	74.3	16,995.1	75.1
工人								
职员								
集体农庄农民:	6,050.8	28.0	5,778.1	26.3	5,711.4	25.6	5,613.8	24.8
个体农民和个体家庭劳动者:	43.2	0.2	22.0	0.1	22.3	0.1	22.6	0.1
人口总数	21,610.0	100.0	21,970.0	100.0	22,310.0	100.0	22,631.5	100.0

资料来源,《1956年苏联国民经济》(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19页;《1961年苏联国民经济》(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27页;
《1962年苏联国民经济》(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14页;《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28页;
《1966年党的积极分子札记》(1966年莫斯科俄文版)8—9页;《1959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载《苏联》(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90—92页;《列宁党的历史性大会》(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43页。只有1939年(在1939年9月17日以前的边界内)和1959年有绝对数字。1939(在1941年边界内)、1955、1956、1961、1962、1963和1964年的数字是根据人口总数计算出来的。

仔细考察列宁的阶级定义，不承认职员象其他两个集团工人和农民一样，是一个独立阶级，似乎很难认为是有道理的（稍后我们将讨论列宁的“阶级”概念）。当考虑到新修订的1961年民法中承认社会团体的财产是第三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时，刚才提到的两种形式的所有制的差别就没有多大意义了。^①

把职员或者广义的知识分子看作同工人和农民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可以从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在1962年以来就在考虑的苏联新宪法中，把职员放在仅次于工农的特殊地位的意图上看出来。^②“全民国家”的想法，主要是为了给予这三个社会集团以同等地位；但是在实际上，它意味着把知识分子放在其他两个阶级之上。

苏联的分类使我们只能描绘苏联社会结构的大致轮廓。但是以上提到的关于三个主要社会阶级——工人、职员和农民——的意见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不但揭示俄国社会变革的总的过程，也包含有苏联社会阶层分化程度的某些重要情况。

表二和表三显示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苏联社会发展各阶段的情况。由于这些革命的变革，工人和职员的百分比有了大幅度的上升（从1928年的百分之十七点三到1937年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和1964年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一），而农民的百分比则有显著的下降（从1926年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一到1937

^① 见 D. 普法夫：《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1965年科隆德文版）140页。

^② 见 B. 迈斯纳：《苏联统治制度和宪法权利的改变》，收于鲍特契尔-李别尔-迈斯纳：《赫鲁晓夫时代的结算表》161页。

年的百分之五十五和1964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八)。人数众多的工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这表明布尔什维克政权推进了实际上在沙皇统治时代就已开始的建立一个工业社会过程的程度。撇开个别社会集团的特殊地位和发展情况,其结果和“资本主义”方式的工业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发展速度可能放慢些,是否需要作出这样大的牺牲是颇可怀疑的。^①我们已经看到劳改营对苏联人口增长的影响是多么剧烈。表二的数字特别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由于斯大林主义工业化方法的影响,苏联人口在1934年至1937年期间仅仅增加二百万左右。与此同时,在农民人数减少不多的情况下,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却不时有所增加。从1937年到1939年,工人和职员的总数(包括家属在内)增加足有一千七百五十万(百分之十五),虽然受雇的职员和工人从1937年到1940年仅仅增加四百五十万。1934年到1937年的人口增长情况(见表二)清楚地表明了斯大林主义工业化方法的影响。

假定1939年刚好和1940年一样,每一个就业的工人或职员平均有两个家属,那末上列数字中就有五百五十万的差额。我们只能用那些劳改犯被并入工人和职员的人数中这一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而按照劳改犯的职业和出身,他们本来是属于其他社会范畴的。苏联的统计事实上证实了这个假设,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劳改犯在五百万左右。在战后年代,苏联仍然坚持用这种方式把劳改犯列入统计。

^① 见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研究》(1960年格廷根德文版)117页及以下。

这样，应当注意到，我们就不能在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包括家属）中准确地确定其中所包括的劳改犯的数字。^①

表四 1959年按阶级构成的人口分布情况

阶 级	万 人	百 分 比		
		全部人口	城 市	农 村
工人和职员：	14,270	68.3	46.2	22.1
工人	10,080	48.2	31.6	16.6
职员	4,190	20.1	14.6	5.5
集体农庄农民	6,550	31.4	1.6	29.8
个体农民和个体家庭劳动者	60	0.3	0.1	0.2
总 计	20,880	100.0	47.9	52.1

资料来源：S·A·库格尔，《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结构变革的规律性》（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34页。

我们已经提到强制工业化和集体化所带来的城市人口增长情况。城市和农村人口中的各“阶级”，见表四。从表中可以看出，职员和“知识分子”对城市的依赖比工人更甚。

关于这些大社会集团的人数和组成情况的补充资料，可从苏联人口的职业构成和教育程度方面的统计中得到。

国民经济中包括的劳动力总数（一亿零九百万）和按严格

① 波兰流亡者最近提出的材料证明苏联有五十六个劳改营。见1965年4月23日《新苏黎世报》；《真实的东方报》1965年5月15日第20期7页及以下。关于劳改营的问题，又见P·巴顿，《苏联集中营制度的改变》，载法文《土星》杂志，1956年1月—2月。苏联作家A·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1963年纽约英文版），对斯大林时代集中营中的生活，作了现实主义的描写。又见刊载于俄文《新世界》杂志1964年第3—5期的A·V·戈尔巴托夫将军的回忆录；米哈依洛夫，《1964年莫斯科的夏天》37页及以下。

意义的就业人数(九千九百十万),见表五。^①应该着重指出的是,1959年所列就业人数中约有六百四十万尚未达到劳动年龄。表六显示女工人数较男工人数多四百二十万。

表五 1959年苏联人口的就业情况

就 业 类 别	1959		1939 (百分比)
	万 人	百分比	
1.有收入的就业人员, 符合劳动年龄的 服军役的	9,910 9,270 360	47.5 44.4 1.7	46.2
2.从事私人经济活动的农民和集体农庄农民、工人的亲属	990	4.7	4.9
国民经济中的就业人员	10,900	52.2	51.1
3.从事家务的家属	8,540	40.9	45.9
4.领养老金的	1,240	6.0	1.3
5.领定期生活津贴的	170	0.8	1.0
6.其他	30	0.1	0.7
总 计	20,880	100.0	100.0

资料来源:《1959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96—99页;《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25页;库格尔:前引书37页;P·G·波佳契赫:《苏联的人口》(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129页。

关于苏联潜在的劳动力(表五)的进一步分类,见表七,这是对苏联人口中从事国民经济活动的职业构成的更准确的说明。从表七可以看出,在1959年中,职员和工人约占苏联潜

^①早在1959年,苏联就能指出全部人口的就业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七点五,这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就业率在1964年达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六。其他欧洲共同市场国家的数字要低得多,法国为百分之四十二点六;意大利和卢森堡为百分之四十三点三;比利时为百分之三十九点六;荷兰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四。见西德《世界报》,1965年11月19日。

在劳动力的一半左右，而集体农民则占四分之一。这里也应该着重指出，人数众多的大学和技术学校学生都包括在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的分类总数和全部总数中。^①

表六 1959年男子和妇女的就业情况

就 业 类 别	人 数 (万人)			百分比
	男 子	妇 女	总 计	
1. 在国民经济中就业的	5,240	5,660	10,900	52.2
2. 受个人雇用的	3,500	5,040	8,540	40.9
3. 在机关团体中就业的 (领养老金的, 领定期生活津贴的)	650	760	1,410	6.8
4. 其他	10	20	30	0.1

资料来源：波佳契赫：《苏联的人口》128页。

表七 1959年苏联人口中的劳动集团

职 业 类 别	万 人	百分比
工人和职员以及其他有收入的就业人员，	6,660	52.1
工人和职员	6,300	49.3
参加生产过程的大学生和专科学生	440	
集体农庄农民	3,230	25.3
个体农民和个体家庭劳动者	30	0.2
有收入的就业人员	9,920	77.6
从事私人经济活动的农民和集体农庄农民、工人的家属	990	7.7
在国民经济中就业的人员	10,910	85.3
不从事生产的大学生和专科学生	580	4.6
从事儿童教育和家务劳动的家属	1,280	10.0
其他	10	0.1
总计	12,780	100.0

资料来源：《1959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96—99页；《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25页；波佳契赫，前引书132页。

表八和表九把在国民经济中就业的九千九百一十万人 (包括大学生和未达劳动年龄的人，但不包括帮助职工的家

属),按工业、社会集团和性别作了进一步的分类。

表十更清楚地显示了社会结构的轮廓,尽管苏联资料仅仅公布了百分比数字。它为我们提供那些在国民经济中就业的适龄劳动者集团(包括帮助职工的家属,但不包括大学生和武装部队人员)的全貌。

表十记录了九千四百六十万就业人员按职业和经济部门分类的百分比。^②表八和表十揭示了1959年在职的工人和职员总数。年终五千六百九十万数字中包括三千九百六十万工人和一千七百三十万职员。表八所列的工人总数四千六百一十万人似乎多算了约六十万人,不过一千九百八十万的职员总数和二零五十万的“脑力劳动者”相较,似乎少算了约八十万。^③

① 在不从事生产的五百八十万学生和高级专业学生中,二百二十万为大学生,二百七十万为专门技术学校的学生,七十万为经许可从事独立研究的人员,二十万为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员。在参加生产的四百四十万学生和高级专业学生中,一百万为大学生,一百四十万为专门技术学校的学生,四十万为经许可从事独立研究的人员,一百六十万为从事其他活动的具有一般专业知识的学生。关于这些学生的数字见《1963年苏联统计数字》158、160页。四百四十万的数字是作者计算出来的,参加生产的普通中学生不包括在内。

② 这个数目包括那些身强力壮的职员(九千二百七十万)和从事私人职业的家属(九百九十万),小部分军人(三百六十万)和参加生产过程的大学生或专科学生(四百四十万)。

③ 四千六百一十万人总数中,包括三千一百八十万直接生产领域的工人(包括农业工人),二百五十万商业和供应人员,五百三十万生产领域以外的人员,一百二十万加入合作社的家庭劳动者,一百八十万军事人员,二百十九万参加生产过程的大学生和专科学生,以及正文中提到的差额六十万人。至于一千九百八十万职员中,七百四十万为工程技术和商业人员,九百九十万在生产过程之外,一百万在军事部门,一百五十万是同生产过程有联系的大学生和专科学生。在这两个社会集团中,同生产有联系的四百四十万大学生和专科学生,人数是根据作者的估计。

表八 按社会集团划分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就业情况

职业和就业类别	人数 (万人)					百分比			
	总计	工人	职员	集体农庄 农民	个体农民和 家庭劳动者	工人	职员	集体农庄 农民	个体农民和 家庭劳动者
就业人员:	9,913.0	4,614.6	1,967.0	3,304.7	26.6	100.0	100.0	100.0	100.0
从事物质生产的:	8,017.2	3,891.2	951.4	3,218.1	25.5	84.3	48.4	97.4	95.8
工业、建筑、运输、交通	3,657.5	2,998.8	599.0	43.9	15.8	65.0	30.5	1.3	59.3
农业	3,842.6	591.8	69.3	3,172.3	9.2	12.8	3.5	96.0	34.4
商业、供应	517.1	253.4	262.6	1.1	—	5.5	13.3	0.1	0.1
从事非物质生产的(教育、科学、 卫生、住房、福利、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信贷和保险):	1,445.3	532.8	901.8	9.7	1.0	11.5	45.9	0.3	3.6
教育、科学、艺术、卫生	979.3	328.9	641.8	8.5	—	7.1	32.6	0.3	0.1
武装部队	362.3	182.3	103.3	76.7	—	4.0	5.2	2.3	0.1
其他	19.1	8.3	10.5	0.2	0.1	0.2	0.5	0.0	0.5

资料来源:《1959年全苏人口普查总结》104页及以下。

表九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就业的男子和妇女

(1959年1月15日)

职业和就业类别	万人	%	男子%	妇女%
总人口	20,882.7	—	45	55
就业人员	9,913.0	100.0	62	48
从事物质生产的:	8,086.3	81.6	53	47
工业、建筑、运输、交通	3,657.5	36.9	61	39
农业	3,842.6	38.8	46	54
集体农庄农民	3,172.3	32.0	43	37
国营农场的工人和职员	661.1	6.7	59	41
个体农民	9.2	0.1	35	65
商业、供应	517.1	5.2	39	61
从事非物质生产的:				
(教育、科学、卫生、住房、福利、国家机关、信贷、保险和社会团体)	1,445.3	14.6	36	64
教育、科学、艺术、卫生	979.3	9.8	29	71
武装部队	362.3	3.6	100	0
其他	19.1	0.2	70	30

资料来源: <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 26页。

表十 苏联人口的职业构成

职业和就业类别	百分比										
	1959年 人数(万人)	1959	1940	1950	1955	1955	1957	1958	1961	1962	1963
从事物质生产的(包括商品的生产、 运输、交通和商业); 工人	7,940	83.9	87.9	86.2	85.2	85.2	84.9	84.2	82.1	81.4	80.8
工程技术人员、职员、低级服务人员、 商业人员	3,178	33.6	19.4	25.6	31.6	32.2	33.3	33.6			
合作商业成员(联合起来的家庭劳 动者)	993	10.5	9.1	9.9	10.2	10.2	10.4	10.4			
从事社会经济和私人经济活动的 集体农庄农民	117	1.2	2.2	1.5	1.8	1.1	1.2	1.3			
个体农民和个体家庭劳动者	3,283	34.7	45.2	44.0	37.5	37.7	36.0	34.9			
从事私人经济活动的职工家属	28	0.3	9.5	2.0	0.4	0.4	0.3	0.3			
从事非物质生产的; 教育、卫生	341	3.6	2.5	3.2	3.7	3.6	3.7	3.7			
住房福利、公共运输、交通、 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信贷和保险	1,523	16.1	12.1	13.8	14.8	14.8	15.1	15.8	17.9	18.6	19.2
	984	10.4	6.0	7.7	9.1		9.5	10.1	11.9	12.6	13.1
合计	539	5.7	6.1	6.1	5.7		5.6	5.7	6.0	6.0	6.1
	9,46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百分比根据：《1956年苏联国民经济》202页；《1958年苏联国民经济》655页；《1959年苏联国民经济》584页；
《1961年苏联国民经济》565页；《1962年苏联国民经济》451页；《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473页。

表十一 城乡就业人口的阶级基础

阶 级	万 人	百 分 比		
		总人口	城 市	乡 村
工 人	4,610	46.6	31.4	15.2
其中从事工业、建筑、运输、交通的	3,000	30.3	23.8	6.5
农 业	590	5.9	0.8	6.1
职 员	1,970	19.8	14.5	5.3
集体农庄农民	3,300	33.3	1.2	32.1
个体农民	30	0.3	0.1	0.2
合 计	9,910	100.0	47.2	52.8

资料来源：库格尔前引书 38 页。

表十二 苏联人口的教育程度 (单位:万人)

	合 计	1959		1963
		男	女	
大学毕业	380	190	190	500
大学肄业	170	80	90	200
受过高等技校训练	790	340	450	960
普通中学	990	440	550	1,140
受过完全教育的	2,330	1,050	1,280	2,800
受过不完全中学教育的(至少在校7年)	3,540	1,710	1,830	4,060
合 计	5,870	2,760	3,110	6,860

资料来源：《1959年苏联国民经济》21页；《1962年苏联国民经济》15页；
《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29页。

表十三 按阶级分类的苏联人口的教育程度
(1959年1月15日)

	工 人		集体农庄农民		职 员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各阶级连同家属总数	10,080	48.2	6,560	31.4	4,190	20.1
大学或高等院校 (包括大学毕业在内)	140	1.4	50	0.7	1,160	27.6
普通中学(在校10年)	390	3.9	120	1.9	480	11.4
受过完全教育的	530	5.3	170	2.6	1,640	39.0
受过不完全中学教育的(至少在校7年)	1,910	19.0	820	12.7	780	18.6
合 计	2,440	24.3	990	15.3	2,420	57.6

资料来源：范德金根据《1959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90页材料计算出来的，见范德金前引书323页。

表十四 按工作类型分类的就业人口

就 业 分 类	1959		1963	
	万 人	%	万 人	%
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 工 人	7,860	80.3	8,190	77.8
“集体农庄农民	4,560	47.1		
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	3,300	33.2		
	2,050	19.7	2,330	22.2
合 计	9,910	100.0	10,520	100.0

资料来源：《1959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161、162页；《1963年苏联统计数字》20页。

表十显示加入合作社的家庭劳动者人数(一百二十万)及帮助职工的家属人数(三百四十万)。集体农庄农民家属中的辅助工人数在六百五十万左右。三千三百万集体农庄农民中只有八十万人在军事机构中工作;这个数字同工人和职员比较起来是小的,工人和职员各有一百八十万人和一百万人在武装部队中工作。城乡就业人口在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分类是参考前面能够确定的总人口的分类为依据的。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显示,职员中有三分之二,工人中只有一半是在城市里工作(见表11)。

看看苏联人口的教育程度,可以发现一幅更精确的社会结构的图画。^① 表十二和十三特别详细地勾划出职员和知识分子的教育特点与职业特点。1959年列为受过完全教育的共二千三百三十万人,同列作“脑力劳动者”的二千零五十万人相吻合;前者之中,妇女一千二百八十万,男子一千零五十万。受完普通中学和技校训练的妇女比男子为多。然而,大学毕业的男子和妇女人数相等。在受完大学和高等技术训练的人员中(包括大学未毕业者在内),职员对工人的比例是八比一(一千一百六十万对一百四十万);如果把参加革命前应届中学毕业生考试的人数包括在内,这一比例则是三比一(一千六百四十万对五百三十万)。

^① 见收于本书中的安韦勒的文章。

表十五 按性别分的就业情况(%)

	男		女		合 计	
	1939	1959	1939	1959	1939	1959
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	79.4	81.7	86.4	76.8	82.5	80.3
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	20.6	18.3	13.6	23.2	17.5	19.7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波佳契赫前引书 150 页。波佳契赫关于 1959 年的百分比是错误的，已予改正。

为了更正确地估计职员和知识分子的数字(这两个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重迭的),考虑一下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九千九百一十万人的教育程度是很重要的。表十五显示 1939 和 1959 年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男女人数。从事脑力劳动的妇女人数显然有了大量的增加。确实,在苏联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这是甚至在战前已经实际上消除文盲的结果)的情况下,妇女的参与是不同于寻常的。自 1939 年以来,不论是有收入的就业人口中还是总人口中受到充分教育的公民人数增加了两倍半(见表十六)。

从结果来看,有收入的就业人口和总人口在教育程度上的差距稍为扩大了。在这方面,苏联职员、工人和农民这三个社会大集团的发展情况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工人的一般教育程度比职员提高更多,而集体农庄农民甚至比工人还要提高得多。

表十六 按工作类型和社会类型分的就业人口的教育程度

(单位:每千人中的人数)

	大学和中等教育程度 (包括不完全中等教育)		1959	
	1939	1959	大学和高等技技 程度 (包括大学毕业)	普通中学程度 (包括不完全 中等教育)
总人口	83	281	64	217
就业人口	123	433	109	324
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	43	316	14	302
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	498	884	476	408
工人	82	386	20	366
集体农庄农民	18	226	9	217
职员	519	893	490	403

资料来源:《1959年全苏人口普查总结》111、115、116、176页;波佳契赫,前引书149页。

表十七 工人和职员总数

(单位:万人)

	年平均 人 数	年底数字	工 人	产业工人	农业工人	职 员
1913(当时的边界内)			860			
(1939年9月17日以前 的边界内)	1,120	1,140	720	350	300	400
(目前存在的边界内)	1,290	1,290		430		
1917				300		
1918				250		
1919				250		
1920/21				150		
1921/22				120		
1922/23	660		420	200	100	240
1923/24	740			180		
1924/25	850			220		
1925/26	1,020			270		
1926/27	1,090			280		
1928	1,080	1,160	690	310	200	390
1929		1,220		340		
1930		1,450	950	430		500
1931				550		
1932	2,260	2,290		600		
1933	2,180	2,230	1,380	630		800
1934		2,350		650		
1935		2,450		710		
1936				770		
1937	2,670	2,700	1,730	790	240	960
1938						
1939						
1940	3,120	3,150	1,710	830	230	1,140
1941	3,100					
1942(计划数)	3,270			920		
1943	1,930					
1945	2,730	2,830				

(续上表)

	年平均 人 数	年底数字	工 人	产业工人	农业工人	职 员
1946						
1947		3,140				
1948		3,340				
1949		3,520				
1950	3,890	3,980	约2,630	1,130	约 300	约1,350
1951	4,070	4,140			310	
1952	4,220	4,250				
1953	4,370	4,460		1,320	380	
1954	4,730	4,680		1,380		
1955	4,840	4,790		1,430	590	
1956	5,050	5,000		1,520	580	
1957	5,310	5,270			660	
1958	5,460	5,430		1,630	690	
1959	5,660	5,690	3,960	1,680	600	1,730
1960	6,200			1,860	670	
1961	6,590			1,960	740	
1962	6,830			2,020	770	
1963	7,050		约5,550	2,070	790	约2,500
1964	7,320					
1965(计划数)	7,800					

资料来源：S·M·施瓦茨：《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劳动政策》（1953年汉堡德文版）42页及以下。彼得罗夫：《苏联经济发展》69页。约各夫：《苏联国民经济及其问题》286页。贝特尔海姆：《苏联经济》（1950年巴黎法文版）193页。《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结果》（193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结果》（1939年莫斯科俄文版）。《1956年苏联国民经济》50,203页；《1958年苏联国民经济》654页及以下；《1959年苏联国民经济》585页及以下；《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633页及以下；《1961年苏联国民经济》181,461,566页及以下；《1962年苏联国民经济》368,452页及以下；《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363,474页及以下。《农业》（1960年莫斯科俄文版）450页及以下。德文《东方问题》第17卷（1965年）515页。

在获得较高级的“专家”训练方面，职员的机会要比工人或农民优越得多。表十六清楚地反映了职员和“脑力劳动者”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而得到的好处。在每一千个有收入、就业的受过大学或高等技校训练的人中，职员占四百九十人，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占四百七十六人。^① 工人以及其他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相应数字是二十人和十四人。

受过充分训练的工人，他们的情况要好很多，然而这里同样明白无误地显示：就业工人的教育程度要比整个劳动阶级，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的教育程度低得多。另一方面，劳动职员的教育程度要比整个“阶级”（包括他们的家属）的教育程度高得多。

这些有关职业构成和教育状况的数字有助于确定苏联形式上的阶级结构，这些数字清楚地显示了相对于据认为是苏联社会基本阶级的两大社会集团来说，职员是居于优势地位的。当然，这种看法并没有说明这些不同集团在形式上的阶级结构内的实际重要性和势力。因此，我们要对社会各“阶级”的组成情况进行更加具体的分析。

2. 新的工人阶级

近年来迅速积累起来的有关苏联人口社会构成的统计材料，使我们能够更正确地不仅确定各阶级的人数，而且确定它们的组成情况。即使如此，我们在这里只能对这些“阶级”中

^① 原文如此。根据表十六，应该是：在每一千个职员中，受过大学或高等技校训练的有四百九十人；在每一千个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受过大学或高等技校训练的有四百七十六人。——译者

的每一阶级进行有限的讨论。更详细的分析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我们从工人阶级开始。直到最近，这个阶级一直被吹嘘为苏联的唯一的统治集团(“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今天工人阶级对“全民国家”的其他社会集团似乎只有有限的影响。由于工人阶级同那些或者被称为“职员”或者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提供两个集团的数字或许能更正确地确定工人阶级在一段时期中的总的增长情况。表十七关于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分为年平均数和年底总数。但是必须注意，苏联的数字，特别是有关前两个发展阶段的数字，是矛盾百出的。

表十七有几年的数字付之阙如。但是，产业工人部分的数字是比较完整的；农业工人的数字稍差一点。后者将在集体农庄农民一节中予以更广泛的探讨。

自强制工业化以来，俄国工人的总数有了巨大的增长。1928年的总数是六百九十万人，接近1913年工人队伍的数目(即1939年9月17日以前的边界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一千七百一十万人。战后，工人数字从1949年的约一千九百四十万上升到1959年的三千九百六十万，然后上升到1963年的五千五百五十万左右。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是把生产以外行使职员特殊职能的工人包括在内的。另一方面，工长和受过高级训练的技术工人则被列为职员。^①1963年的总数，除工程师和农学家外，还包括参加合作社的家庭劳动者，从前他们被列为一个同集体农庄农民相联系的自给自足

^① 见《1959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第10页的说明。武装力量人数以及大学生和专业学生人数都不包括在上述数字中(见表十)。

集团。1956年一些工业合作社并入国营工业，其余的在1950—1960年并入。自此以后，参加合作社的家庭劳动者成为“工人阶级”的基本组成部分。

苏联工人阶级从量的方面，甚至从质的方面都可以同老的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相匹敌。对于产业工人来说尤其如此。1928年，产业工人三百一十万人，这个数字低于战前达到的三百六十万的指标（在1939年9月17日以前的边界内）。到了1939年，产业工人总数为八百三十万人；战后时期1950年上升到一千一百三十万人，1959年一千六百八十万，1963年二千零七十万。

同革命前的工人比较，苏联工人组成一个新的独特的阶级。^①这个从强制的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工人阶级”，只有比较小的一部分是在革命前实际受雇用的，或者其出身可以追溯到当时的工人的。金属制造工人实际上是产业工人的核心，只有在他们之中，革命前的工人及其子女的比例比较大。金属制造工人目前的人数达九百三十万人，他们在苏联工人中具有最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最坚定地保持着革命的传统和工会的传统。但是，绝大多数新工人是出身于农民的。

斯大林用赤裸裸的残暴手段，把俄国农民从村庄转移到

^① 见萨洛蒙·施瓦茨，《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劳动政策》（1953年汉堡德文版）及《工人阶级的发展》（载《东方问题》1963年第15期776页）；M·Ia·索宁，《苏联劳动力再生产和劳动平衡表》（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C·斯特鲁米林编，《苏联工人阶级人数和构成方面的变化》（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R·P·达第金编，《1917—1961年苏联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关于在各苏维埃共和国不同地区的发展，见Z·A·阿斯坦诺维契和K·V·古塞夫，《苏联各共和国中工人阶级的发展》（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

工厂中去。这些农业工人一般都不会阅读或书写，对现代机器一无所知，对劳动习惯非常漫不经心，要把他们改造成为城市工人是一项特别困难的工作。^① 紧紧拴在土地上的俄国农民主要是通过强制集体化被赶离家园的。但是这些新工人的作风和观点受到他们对土地的天然热爱的深刻影响。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还有这样的事实：这些新工人并没有得到唯心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和鼓励，后者从前对于俄国的劳工运动曾经作出极大的贡献。

新的工人阶级的极大部分是由妇女和年轻人组成，因而它的力量过于单薄，不能有效地抵制国家的官僚机构。1940年，在全部产业工人中约有百分之四十是妇女，百分之三十是年轻人（二十三岁以下），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年纪较大的男子（同1914年的工人队伍比较，年纪较大的男子、妇女和年轻人各占百分之六十二、二十七和十一）。可能这一点，以及阶级觉悟低和极权主义机构的残暴统治，是造成工人阶级虽然遭到三十年代悲惨的不幸，也没有产生强烈革命情绪的原因。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工人阶级本身发生的内部阶层分化，这一点在前面讨论培养包括工长和高级技术工人的“工人贵族”时已经提到过。1937年单单在冶金工业就采用了二千种以上的职业称号和技术专长，^② 随之而来的高度专业化也使劳动结构大大分化，更进一步地削弱了阶级意识的发展。

^① 见M·辛达斯：《没有屋顶的房子：革命四十五年后的俄国》（1962年维斯巴登德文版）200页及以下。

^② 见S·金克纳：《劳动分工、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技术教育》（1965年格廷根德文版）134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及其家庭同工厂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工厂以及他所属的社会集团成为他那个小天地的组成部分。^①某些工业得到政权的青睐并放在优先地位；当这种情况出现时，这些工业的工人可能得到好处，并提高他们对最重要的管理中心和工业中心的实际影响。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附近的大企业尤其如此。中年工人强烈地同制度保持一致，而在未曾经历过去的恐怖的青年一代工人中就要差一些。

辛达斯绘声绘影地刻划了一个普通中年工人的情况：

这是来自村庄、出身于农村的劳动人民，他对西方关于劳动权利的概念一无所知。今天他仍然知道得很少。他受过体力上和心理上的训练，这种训练是任何西方的工会都不会容忍的。他是一个受国家和党严密监视的人。他生活在这样一个团体中，这个团体虽然不象莫斯科汽车厂封闭得那个严实，却是主要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这个团体同党、共青团或工会一起，一旦需要，随时准备根据克里姆林宫的观点和看法来改变自己的意见，使其同前者保持一致。^②

辛达斯的分析使他得出结论说：这个政权用不着害怕工人的政治反抗。但他也认为，青年一代工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以致他们不会让自己成为苏联官僚政治的牺牲品。在这一点上青年一代比他们的父母更为自由化些，因为他们并没有这

① 见H·C·伯林纳斯：《苏维埃——它们怎样思维、感觉和行动》（1963年新图嘉特德文版）41页。

② 辛达斯：前引书203页。关于当前苏联工人阶级状况，见P·巴顿：《苏联工人现状》，载《共产主义问题》第9卷第4期（1960年）18页，以及随后E·C·布朗、M·狄沃尔和S·M·施瓦茨参加的讨论，载《共产主义问题》第9卷第6期（1960年）38页及以下；又见J·B·索伦逊：《苏联工人：现状——问题和前景》，载《共产主义问题》第13卷（1964年）25页。

样的耐心去忍受滥用权力的现象。这一代似乎准备用毫不含糊和大胆的语言提出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在制造业工厂里朗诵诗歌取得成功，说明许多青年工人已经比较透彻地吸取了进步作家的思想。不仅如此，从发生罢工行动的报道中^①能够看到工人同这个政权之间的关系要比辛达斯所认为的更成问题。近来苏联社会学家进行的调查透露了青年工人对他们的工作，并且常常对他们的职业非常不满意。^②工业地区工人流动性的增强可以从这一点得到说明。另一方面，这表明今天的工人比在斯大林领导下享有更大的流动自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工人实际上被那些控制着他们生活的残酷的法律措施束缚在某一工业内。列宁格勒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于1963年发表），发现

^① 见A·勃埃特：《当壶水沸腾的时候》，载《共产主义问题》第13卷（1964年）33页及以下。

^② 关于这项研究的和对所用方法的批判性评价的详细说明，见G·华根勒纳：《苏联的经验主义的社会调查》，载《现代世界》第6卷（1965年）。在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工厂中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是特别使人感到兴趣的。见V·A·查德拉沃穆斯洛夫：《对待劳动和可贵品德的态度》，载《苏联社会学》第2卷189—208页；G·I·波波夫：《思想工作实践中的具体社会调查》，载《苏联社会学》第1卷74—84页；《具体社会学研究的经验和方法》（1965年莫斯科德文版）144—196页；N·V·高鲁毕娃和E·S·库兹敏：《关于生产人员的研究经验》，载《苏联社会学》第2卷388—408页；L·I·科干：《消除工人就业局限性的问题》，载《苏联社会学》第2卷57—75页。关于工厂中正式体制和非正式规章之间的关系，见N·G·瓦林廷诺娃：《生产人员的相互关系对提高劳动指标的影响》，载《苏联社会学》第2卷442—457页。关于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及其对业余时间的利用，见S·T·古里安诺夫：《苏联工人的精神上的需要》，载《苏联社会学》第2卷153—188页；M·T·约夫楚克：《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的社会意义》，载《苏联社会学》第2卷28—56页；B·T·科尔拉科夫和G·A·普鲁丹斯基：《对工人利用业余时间的研究经验》，载《苏联社会学》第2卷209—224页；G·V·奥西普夫和S·F·弗罗洛夫：《业余时间及其利用》，载《苏联社会学》第2卷225—242页。

很高比例的列宁格勒工人(百分之五十九)对他们自己的工作漠不关心或牢骚满腹。有几乎同样高比例的工人(百分之五十七)对他们的职业兴趣索然或感到不满意。^① 同年进行的另一项研究透露,有百分之三十六点四的回答调查的人所以调换工作是因为工作条件恶劣,而百分之三十的人这样做是因为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不能令人满意。另有百分之二十三的回答调查的人希望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得到较高的报酬。^②

就工人的社会阶层分化来说,熟练工人和人数相对较少的工长与资历深的工人,具有特别的重要地位。工人群众基本上只是受过部分训练或者甚至没有受过训练。可是另外存在着一个受过训练者的集团,它的确切人数视享有职员身份的“工人贵族”的人数而定。1959年,工长人数共达七十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一人,而资历深的工人达八十八万一千七百八十六人。

^① 见兹德拉沃穆斯洛夫和埃多夫的文章,载《苏联社会学》第2卷196页及以下;《具体社会学研究的经验和方法》144页及以下;华根勒纳,前引书416页。这一分析是根据在年龄、性别、教育、收入和党籍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列宁格勒二十五家工厂三十岁以下的二千六百六十五名工人作出的。另外,可参考高鲁毕娃和库兹敏的两次考察(载《苏联社会学》第2卷392页),那是以不同规模也在列宁格勒一些工厂中进行的;在这里,被调查的工作班组系分成三级。但是最高一级有百分之十三的答案是不相干的或敷衍了事的;中间一级有百分之五十和最低一级有百分之八十六也是如此。第二次考察的相应百分数为二十六、三十和三十八。

^② 见M·波波夫的文章,载《苏联社会学》第1卷75页;《具体社会学研究的经验和方法》177页和202页及以下。1963年1月,二十五家大工业企业的一万零七百九十二名工人曾被征询是否想调换工作。高鲁毕娃和库兹敏报道,根据上注中提到的那两次考察,最高一级有百分之八、中间一级有百分之四十八、最低一级有百分之八十一曾表示希望掉换他们的工作地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有四百万居民),每年约有三十五万名工人改换他们的工作。见科干的文章,载《苏联社会学》第2卷66页及以下;华根勒纳,前引书416页。

前面我们看到在 1958—1959 年前后,苏联工业全部生产工人中约有一半,即三千一百八十万生产工人中的一千五百九十万是半熟练工人。在其余的百分之五十中,熟练工人的人数要比部分熟练工人的人数少一些。在特别象冶金和机器制造这些高度发达的工业部门中,以及在商业、登记和供应部门中,熟练工人的比例可能要高得多。1930 年在机器工业中核查了十万名以上的工人,其中已经有百分之十九点七是熟练工人。

赫鲁晓夫推行 1958 年的教育改革,主要目的是想克服工长和熟练工人的短缺问题;①他企图通过彻底修订职业训练制度来做到这一点。赫鲁晓夫在实现他的目的方面取得多大的成功,这仍然是很难说的。

苏联工人阶级的性质决定于:第一、它的历史演变;第二,苏联经济的特殊性质。苏联工人是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生活和劳动的,这种经济制度完全建立在国家占有工业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苏联工人完全依附于国家即他的唯一雇主,而国家的统治机构则决定着他的社会地位。因此,苏联的“国家的工

① 见迈斯纳:《赫鲁晓夫统治下的俄国》226 页及以下;金克纳:前引书 172 页及以下。赫鲁晓夫的教育政策的社会学观点,金克纳未予以充分说明。在苏联关于阐述更好的工人技术训练和合格证明的社会学意义的新著中,可参看 M·Ia·索宁:《苏联劳动力再生产和劳动平衡表》(1959 年莫斯科俄文版)265 页及以下;S·L·辛尼亚夫斯基:《1953—1961 年苏联工业工人的培训和提高》,载 R·P·达第金:《1917—1961 年苏联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187 页及以下;G·L·斯米尔诺夫:《工人阶级的成长及其职业构成的变化》,载《苏联社会学》第 1 卷 344 页及以下;A·P·奥希波夫:《技术进步和工人阶级职业结构的变化》,载《苏联社会学》第 2 卷 10 页及以下。

人”处于他们统治者的掌握下，并且遭受比“资本主义世界”发达地区参加工会的工人远为严重的剥削。

3. 集体农庄农民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了由于农业的强制集体化在土地上实行的社会革命。自由的农民，根据列宁的观点是“最后一个资本家阶级”，几乎被全部消灭了。代替它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所谓集体农庄农民“阶级”。此外，还有国营农场的付给工资的工人，他们连同从前被机器拖拉机站、现在被技术修理站雇用的工人一起，被看作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表十八提供了对这些集团（不包括在附属企业中工作的家属）发展情况的一般考察。表中关于集体农庄工作人员的数字同从事社会生产的集体农庄农民（包括家属）的年份数字有一些出入；后者是根据月平均数字计算出来的。^① 例如，1959年的数字是二千四百一十万，而不是二千四百五十万。以这种更为正确的年份数字作为基础，集体农庄农民的总人数（包括另外九百九十万从事私人经济活动的家属）是三千三百万。1959年有相同人数的专职劳动者在农业部门工作。^② 1960年1月1日，一个典型的苏联“农民”（集体农庄农民和农场工人）能够在拥有二亿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国家中，满足包括自己在内的六点四三人的需要，而在1959年7月，一个美国

① 见《苏联农业：统计汇编》（1960年莫斯科俄文版）459页。

② 同上书450页。这个数字是根据一千三百万从事私人企业活动的集体农庄农民、工人和职员的家属所完成的工作量而得出的。在这些家属中，有九百九十万是集体农庄农民，三百七十万是工人和职员。

表十八 农业劳动者的总人数 (年平均数) (单位,万人)

	在农业部 专门工作 的总人数	集体农庄	国营农场 和其他农 业组织	其中国营 农场	机器拖拉机 站、技术 修理站	在农业中 就业的、 有收入的 总人数	集体农庄、 其他农 业组织	国营农场 和其他农 业组织	其中国营 农场	机器拖拉 机站、技 术修理站
1913 (1939年9月17日以 前的边界内)			300							
1922/23			100							
1928			200						150	
1934			240 ^①							
1937			180	130	50	2,780	2,580	160	120	40
1940	3,130	2,900								
1945			240	170	70	2,790 ^②	2,510 ^②	220	150	60
1950	3,070	2,760		180					160	
1952			260	180	120	2,620	2,290	230	170	100
1953	2,940	2,560		190					180	
1954			280	210	310	2,750	2,210	260	200	280
1955	3,070	2,480		220	290	2,850	2,290	270	200	260
1956	3,150	2,570	290	320	260	2,750	2,150	370	300	230
1957	3,090	2,430	400	380	130	2,730	2,200	430	360	100
1958	3,080	2,490	460		50	2,690 ^②	2,210 ^②	460 ^②		20
1959	3,000 ^②	2,450	500 ^②		40	2,610	2,010	580		20
1960	2,900	2,230	630			2,550	1,870	680		
1961	2,810	2,070	740			2,520	1,810	710		
1962	2,770	2,000	770			2,490	1,760	730		
1963	2,730	1,940	790							

注: ① 包括机器拖拉机站在内的人数。 ② 是根据最新发表的数字作了修订的数字。
资料来源:《苏联农业》(1960年莫斯科俄文版) 450、451页,《1961年苏联国民经济》 461页,《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 363页。

农民(农民和农场工人)生产的粮食足以满足自己和二十三点六九人的需要。^①

集体农庄庄员,作为强制性联合组织的成员,当然同在地上劳动的有工资收入的工人一样依附于国家。斯大林采用的集体农庄制度被恰当地称为“封建—军事结构”。集体农庄土地被指定给特定的农业劳动组合使用,只是为了得到由此带来的收入,因为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然而把集体农庄农民同农业工人相提并论则是错误的。

归功于集体农庄农民的自留地和他们对自然的紧密联系,农业技艺、农村的美德和农村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在青年一代中被保存下来。^② 在直接从事国营农场农业的农业工人中也可以找到这些品质,农业工人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从事他自己的私人经济活动。由于工作的缘故,他在对集体农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关系中同前者也是更为接近得多。

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1959年的农业社会共有约四千一百万人,而不仅仅是三千三百万集体农庄农民。^③ 剔除参加武装部队的人数,在工业中工作的学生和有组织的家庭劳动者,这意味着从数量上说,农民的总数同工人和职员的人数相等。自留地可以特别看作农民社会的经济基础。自从

① 数字来自辛达斯,前引书214页。

② 见O·席勒,《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联农业》,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5卷(1965年)379页,伯林纳斯,前引书49页。

③ 在三千三百万集体农庄农民(包括九百九十万从事自己的农业活动的家属)之外,应加上四百七十万国营农场和技术修理站的农业工人以及约三百三十万(总数为三百七十万)从事私人农业活动的工人和职员的家属。

强制集体化结束以来，自留地的数字(约二千万)一直令人惊讶地保持稳定，虽然近年来这一数字从1959年的二千零五十五万下降到1963年的一千六百一十万。^①由赫鲁晓夫策划的这一变化是同把集体农庄转变为国营农场分不开的。因为苏联统计不把农场工人的私有经济单独列开，这并不意味着自留地的实际减少。

在这一点上有必要指出：苏联的农业生产很大一部分依靠这些自留地。虽然自留地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三，在1962年这些小规模的经济单位却生产了苏联全部肉类产品的百分之四十四，全部牛奶的百分之四十五，全部蛋类的百分之七十六，全部土豆的百分之七十，全部蔬菜的百分之四十二，全部羊毛的百分之二十八。^②这些产品的绝大部分由农民自己消费掉了。但是他们出售了他们生产的百分之二十三的肉类，百分之十的牛奶，百分之四十八的蛋类，百分之五十六的土豆，百分之十四的蔬菜，百分之十六的羊毛。^③城市的食物供应主要依靠这些自留地的剩余生产。虽然从未完全放弃他的“农业城”计划的赫鲁晓夫垮台了，我们仍应记住：自留地将继续作为苏联农业的重要因素，而且在缩小国营农场业务规模的过程中，恢复单独的小组制度和把某些国营农场改变为集体农庄将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④这种发展已经在进行中，而且完全可以相信这些自留地将得到扩大，并保证给予

① 《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226页。

② 数字来自《1962年苏联国民经济》238页。1963年数字未包括在1963年的统计汇编内。

③ 数字来自《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230页。

④ 见席勒，《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联农业》383页。

集体农庄以更大的自治。不断强调合作社的自治管理和扩大私营经济部分，无论如何将加强农业这一因素在苏联社会结构中的相对重要性。实际上，中年一代的集体农庄农民似乎比青年一代作出更大的努力以争取保留和扩大私人农业用地。^①但这更多地是为了避免同城市比较起来农村存在的不利之处并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一目的只能通过消除集体农庄的强制性质才能达到。然而决不能低估青年一代集体农庄农民作为社会变革一个因素的作用。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主要依靠集体农庄制度而得到解放的农民妇女，她们的作用大大地被忽视了。因为年轻的男人宁可离乡背井，而年轻的妇女则特别关心农村的条件能够发生变化。^②

集体农庄农民和农业工人也可以按阶级来区分。^③第一类包括农村的知识分子，其中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主席、农业技术管理人员、资历深的农业技术助理人员和特殊类别的职员。1959年有十万零二千七百六十八名集体农庄主席（和官员），二十七万八千五百四十四名农学家和技师，还有三万名兽医，七万名兽医技术人员和在农业部门工作的助理医务人员。第二类包括十四万三千零九十七名牲畜和家禽饲养农场的场长，十二万零八百零四名拖拉机生产组组长，七万四

① 见辛达斯：前引书 244 页；席勒：《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联农业》381 页，R·A·鲍尔、A·英凯里斯和 C·考克宏：《苏维埃制度怎样工作》（1951 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英文版）。

② 见伯林纳斯：前引书 51 页。关于那些要把集体农庄变为名副其实的合作社和反对党来管辖的人们的行动，见 B·列乌茨基：《等待着一个新的列宁》，德文《国会》周刊增刊，1965 年 11 月 3 日。当前集体农庄制度的各种过错在 F·阿伯拉莫夫写的小说《“新生活”中的一天》（1963 年慕尼黑-苏黎世德文版）里有所揭露。

③ 数字来自《1959 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164 页及以下。

千四百八十七名农场生产组组长和十四万二千零八十四名其他农业生产组组长。第三类包括十五万六千五百零五名组长,二百零三万五千九百六十五名拖拉机手,三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七名联合收割机驾驶员。第四类包括二十一万二千七百十六名卡车司机、农业机器维修人员等等,还包括其他几个职业集团,其中奶牛饲养员单独被挑出受到赫鲁晓夫的特别赏识。^① 最底下一类包括那些未曾受过特殊职业训练的集体农庄农民和农场工人,他们的人数在一千九百三十万左右。

集体农庄农民显示了比工人和职员具有更大程度的职业集团的特征。但是,农民与集体农庄的正式关系同他从前对村社的依附有着很大的差别。如果集体农庄的一个成员自己在城市工业地区找到一项工作,他就违反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结果有可能通过社员大会的表决而被开除。然而,集体农庄并不能阻止一位集体农庄农民成为另一职业集团的成员。^②

4. 职员和知识分子

根据苏联的正式阶级结构,确认的阶级只有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这种看法只具有有限的价

^① 见辛达斯:前引书 211、228 页。

^② 见 F·I·库里洛夫:《关于集体农庄农民权利与义务的立法》(1956 年莫斯科俄文版) 61 页及以下。K·E·范德金(《苏维埃社会的分化》,载德文《东欧》杂志第 15 卷(1965 年) 322 页)和米哈依洛夫(前引书 96 页)的论点——集体农庄农民能变换他们的工作地点或居住地点——是不真实的。那完全靠他们能否通过钻营找到另一个工作地点。集体农庄农民改行去搞新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通常都缺乏通行证。米哈依洛夫的相反假设是一个错误。近来,拥护集体农庄农民应有权得到通行证以离开集体农庄的人数增加了。见阿克希波夫在 1965 年 7 月 21 日《真理报》和楚巴科夫在 1965 年 8 月 4 日《经济报》30 页发表的文章。

值。第三个社会大集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不把这个集团称为“阶级”)分为两类:职员和知识分子。把职员、知识分子从工人、农民区别开来的决定性标志并不是他们行使什么职能,而是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这可以从附于1959年人口普查结果的说明中看到:

工人的活动是指主要消耗体力劳动的工作;职员的活动是指本质上主要属于脑力的工作。①

苏联官方统计把职员列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同“脑力劳动者”的总人数二千零五十万相当。1959年的人口普查所统计的职员人数为一千九百七十万,余下的假定都是“工人”。关于职员一般如何分类的问题使俄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家都感到为难,《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1年和1962年所进行的讨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②在国际会议上,大多数苏联社会学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产阶级学说”的拥护者。③他们不能同意某些参加讨论者的论点,后者把职员列为工人阶级的成员。苏联研究职员问题的高级权威,弗·斯·谢苗诺夫甚至不愿意把工程技术人员列作工人,

① 见《1959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10页和范德金前引书321页。

② 见德文《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0年第5期43页及以下、第9期70页及以下、第12期65页及以下、1961年第4期439页及以下、第5期451页及以下、第6期543页及以下、第9期818页及以下所登载的有关“在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题目的文章。关于交换意见的情况,见R·阿尔柏格在柏林东方社会学第二届会议(1965年9月30日至10月2日)上作的详细报告。见《苏联关于职员的讨论》,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5卷(1965年)771页及以下。

③ 又见A·A·阿尔祖曼年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中等阶层》(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关于西方意义上的中间阶级的演变,见R·寇尼格,《今日的社会学》(1949年苏黎世德文版)53页及以下。

虽然他不得不补充说：工程技术人员直接参加生产过程，因而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参预生产“剩余价值”。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事实依据是：工程师、技师和其他技术人员处于这样的地位，他们帮助资本家为了取得最大利润而竭尽所能地去剥削工人阶级。谢苗诺夫说：

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机关办事员、商业部门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一起组成知识分子和职员。根据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他们大概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抗阶级之间，因而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中等和中间等级。^①

同外国同行举行的会议近来驱使苏联的社会学者加紧研究苏联职员和知识分子在社会学上具有的性质。^② 在这些文章中，职员前所未有地被称为“阶层”，虽然从前他们在分析苏联社会时从未使用过象社会阶层分化这样的概念。^③ 但是，苏联的社会学者还不敢贸然提出职员（连同家属在内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阶层分化的说法。“阶层”这个词是一个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期使用的概念，仍然被应用于知识分子。^④ 根据

① 德文《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1年第5期466页。

② 见A·L·卢琴科，《苏联的知识分子》（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G·E·格列泽曼编，《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期间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299页及以下；M·I·鲁特凯维奇，《阶级差别的消灭和知识分子在苏维埃社会构成中的地位》，载俄文《哲学科学》杂志1963年第5期22页及以下，和《苏维埃社会社会构成的变化和知识分子》，载俄文《苏联社会学》杂志第1卷393页及以下；V·S·谢苗诺夫，《知识分子和职员在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期间的变化》，载俄文《苏联社会学》杂志第1卷416页及以下。

③ 见G·M·安德烈娃，《现代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阶级理论批判》（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5页。

④ 见格列泽曼，前引书299页；鲁特凯维奇的文章，载俄文《苏联社会学》杂志第1卷314页。这种做法也曾为霍夫曼所采用，见他前引书495页。

官方统计，1959年这一“阶层”仍然包括有一千五百七十万人左右；如果把生产过程之外的学生包括进去，总数可能达二千一百五十万人左右。

苏联社会学者努力想把职员作为一个整体从知识分子中区分出来，但他们遇到特别大的困难。关于职员和知识分子的区别问题，鲁特凯维奇说：

所谓知识分子，通常是指那些在职业上从事脑力活动的人组成的一个比较广泛的社会阶层。今天，划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是这样的交叉重叠，以致难于列出把其中一个集团截然分开的统计数字。从事脑力工作的人甚至习惯地把自己称作“职员”。所谓“职员”，通常是指所有那些在国营工业部门和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员，以及在党、合作社、共青团、体育协会等社会团体机构中工作的人员，而不是指工人，即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

因此，从广义上说，知识分子由于它的社会地位的特点，使其成员同职员一起构成一个阶层。从狭义上说，知识分子是由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专家组成。^①

战前，知识分子被广泛地认作职员并同职员列入同一类别内，莫洛托夫于1939年3月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就是这么做的。然而，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如表十九所示，已把这两个集团分开。1959年只有一千五百七十万（百分之七十七）“脑力劳动者”（职员的总称）包括在知识分子中。其余四百八十万人（百分之二十三）分布在列为第三等的政府部门中工作的各种职业类别中。谢苗诺夫象鲁特凯维奇一样，通过另一途径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一个单独的阶

^① 俄文《苏联社会学》杂志第1卷394页；俄文《哲学科学》杂志1963年第6期23页。

级,他说:

知识分子已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上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中间阶层,发展成为同工人和农民享有同等权利与特权的一个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和职员已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具有统一的社会利害关系的中间阶层,发展成为同工人和农民具有共同社会利害关系的阶层。^①

如果这种说法被接受的话,很难理解为什么不把那些直接从事生产的知识分子和职员,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算作工人阶级的成员。或者在“社会主义”下他们作为“剥削的帮凶”的职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吗?谢苗诺夫完全知道他的论据的弱点,但由于政治原因不敢背离一直沿用到现在的区分标志。因此,他试图通过对“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的区分来证明他原来说法的正确性。在这种区分下,只有知识分子是在职业上从事纯粹的脑力劳动的。谢苗诺夫说:

知识分子和职员并不属于同一个范畴。“知识分子”和“职员”这两个概念是颇不相同的。他们由于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待他们的工作而不属于同一个集团。“知识分子的成员”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实际上对他们的劳动内容进行思考,从而基本上从事脑力活动。职员则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为国家或国家支持的社会团体进行某些服务性的工作,他们完成规定的任务、职能或职责而取得一定的薪金……在社会主义下,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是属于这种意义上的职员。但是并非所有的职员都和那些履行脑力工作的人归入同一类中,大部分职员列在这一集团之外。^②

① 俄文《苏联社会学》杂志第1卷416页。

② 同上杂志419页。

表十九 苏联知识分子和从事脑力活动的劳动者(职员)的组成 (单位:万人)

	1926		1937	1939	1956	1959
	莫洛托夫报 的数字	中央统计局 的数字				
1. 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员	38.46	36.50	175.10	(181.34)	224.00	(214.20)
A.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其行政单位的领导人员				44.52		39.21
B. 工厂厂长及其工作部门的负责人				75.70		95.52
C. 商业组织的经理人员				24.49		33.48
D. 供应部门的经理人员				36.63		45.99
2. 工程技术人员	(20.68)	22.50	(106.00)	165.65	257.00	420.59
A. 工程师、设计师等(除工厂厂长以外)	3.15		25.00	24.73		83.43
B. 中等技术人员	17.53		81.00	140.92		337.16
3. 农业技术人员	(3.13)	4.50	(17.60)	29.49	37.60	47.72
A. 农学家、兽医等	1.80		8.00	19.58		32.34
B. 中等农业技术人员	1.33		9.60	9.81		15.38
4. 医务人员				57.96	(137.60)	170.25
A. 医生(包括医疗机构负责人)	7.00	5.70	13.20	15.28	32.90	41.36
B. 中等医务人员	12.98	12.80	38.20	(52.76)	104.70	128.89
5. 教师 and 科学家				155.31		283.56
A. 科学家(包括科研机构负责人)	1.35	1.40	8.00	11.16	23.10	31.64
B. 教师(包括学校校长)、体育工作人员	34.76	38.10	96.90	144.15	208.00	251.92
6. 文学家和文化领导人员	(11.23)	9.00	(45.60)	(48.63)	57.20	(75.70)
A. 作家和新闻记者	5.85		29.70	5.80		10.40
B. 政治和成人教育讲师团人员				28.50		46.23
C. 艺术家	5.38		15.90	14.33		19.06
7. 计划人员和会计人员	60.74	65.00	(243.90)	310.20	216.10	350.19

(续上表)

	1926		1937	1939	1956	1959
	莫洛托夫报 告的数字	中央统计局 的数字				
A. 经济专家、审计员, 等等	25.00		82.20	103.73		127.15
B. 会计, 等等	37.54		161.70	206.47		223.04
8. 司法人员	2.71	2.70	4.60	6.24	6.70	7.87
9. 大学生	16.80	16.80	55.00		117.80	
10. 知识分子中的其他集团(包括部队的)		57.50	155.00		260.90	
“知识分子”总数	211.64	272.50	959.10	964.82	1,546.60	1,570.08
交通(邮电, 等等)				26.51		47.64
商业和供应部门(减去经理人员)				101.49		147.35
地方工业和服务行业				20.25		27.71
机关工作人员(包括科室负责人)				48.94		53.59
经销人员和测度员				17.64		14.60
其他				202.46		188.53
职员总数				1,382.14		2,049.50

资料来源: 本表根据以下资料汇编: 莫洛托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有 1926 和 1937 年的“知识分子”, 见莫洛托夫,《第三个五年计划》(1939 年莫斯科俄文版)44—45 页,《社会主义国土上的今天和明天》(1939 年莫斯科英文版)149 页,《1958 年苏联经济》(1959 年莫斯科俄文版)672 页,《1959 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164—166 页,《1960 年苏联国民经济》(1961 年莫斯科俄文版)33—35 页。中央统计局 1926 年的数字同莫洛托夫的数字有出入。

谢苗诺夫把那些主要从事“服务性工作”^①的人包括在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职员之中。但是他并没有走到把知识分子和这些职员称为不同集团那么远的地步。相反，他强调他们之间由于工作的非体力方面所产生的、并把他们连结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特征。他说：

服务职能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是以这两种类型的工作具有密切的联系为先决条件的。知识分子和提供服务的劳动者具有一个关键的共同特征使他们成为知识分子和职员这个统一的社会阶层的成员；他们不从事体力劳动。在这方面，他们根本不同于工人和农民，因为后者主要从事体力劳动。^②

谢苗诺夫根据 1959 年人口普查的材料，把知识分子分为以下几个集团：（1）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领导干部（二百四十万人）；（2）技术界和经济界的知识分子（五百万人）；（3）科学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五百三十万人）。^③

这些数字加在一起达一千二百七十万人，或者为全部职员的百分之六十。谢苗诺夫是这样得出这一数字的：他从总数达一千五百六十万的官方数字中减去二百九十万按官方统计包括在技术、经济界知识分子中的机关工作人员。二百九十万这个数字同表十九所列的政治、经济领导人员的数字大体上相符，这清楚地表明了职员和知识分子在 1926 到 1959 年期间的迅速增长。

下面把这些数字作了进一步的划分。这一分类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到现在一直把“技术界知识分子”同“从事创造性

① 谢苗诺夫强调指出这词并不限于服务部门。

② 俄文《苏联社会学》杂志第 1 卷 420 页。

③ 同上杂志 418 页。

活动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① 执行“服务性职能”的职员共有八百五十万人；根据谢苗诺夫，他们可以分为以下的类别：②

- | | |
|-----------------|--------|
| (1) 机关工作人员 | 二百九十万人 |
| (2) 运输业工作人员 | 三十万人 |
| (3) 交通业工作人员 | 五十万人 |
| (4) 商业和供应部门工作人员 | 二百五十万人 |
| (5) 市政和服务行业工作人员 | 二百三十万人 |

鲁特凯维奇把知识分子理解为只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或高等技校训练的人。因此，他比谢苗诺夫把知识分子的圈子划得更小。

表二十 苏联国民经济中受过大学和高等技校训练的专家人数（军队除外）（单位：万人）

年 份	合 计	受过大学教育的	受过高等技校训练的
1913	19.0	13.6	5.4
1928	52.1	23.3	28.8
1941(1月1日)	240.1	90.9	149.2
1953(7月1日)	427.9	184.8	243.1
1954			
1955(7月1日)	513.3	218.4	294.0
1956(12月1日)	625.7	263.3	362.4
1957(12月1日)	682.1	280.5	401.6
1958(年底)	747.6	302.7	444.9
1959(12月1日)	801.7	323.6	478.1
1960(12月1日)	878.4	354.5	523.9
1961(12月1日)	943.3	382.4	560.9
1962(12月1日)	995.6	405.0	590.6
1963(年底)	1,059.8	431.2	628.6

资料来源：《1958年苏联国民经济》673页；《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486页；《苏联统计数字》149页。

① 见L·拉贝兹：《苏联知识分子的构成》，载R·派浦斯：前引书63页及以下。关于苏联知识分子，又见鲍尔、英凯里斯和考克宏：前引书174页及以下。

② 俄文《苏联社会学》杂志第1卷418页。根据官方统计，1959年，不被看作知识分子组成部分的职员只有四百八十八万人。

表二十一 按职业分的受过大学和高等技校训练的专家人数（军队除外）

（单位：万人）

	1928	1941	1955	1956	1957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月 1日)	(7月 1日)	(12月 1日)	(12月 1日)	(12月 1日)	(12月 1日)	(12月 1日)	(12月 1日)	(12月 1日)
受过大学训练的专家总数：	23.30	90.90	218.40	263.31	280.55	323.57	354.52	382.40	404.97	428.26
工程师	4.70	28.99	58.59	72.10	81.61	98.66	113.50	123.60	132.51	142.05
农学家、动物学家、兽医和林业专家	2.80	6.96	15.87	17.95	19.31	22.24	22.23	24.38	25.52	26.71
经济专家、统计人员	1.30	5.70	11.38	13.02	14.52	17.76	19.77	21.83	23.58	25.27
商业人员	1.30	2.09	4.71	5.65	6.78	8.55	9.98	11.40	12.66	13.78
法学家	6.32	14.18	29.90	32.94	34.60	37.86	40.06	42.42	44.19	46.01
医生	5.90	30.04	90.64	111.67	114.49	127.89	137.61	147.38	154.80	162.91
教师、图书管理学专家和文学家	28.80	149.22	294.91	362.44	401.61	478.11	523.85	560.91	590.61	620.09
受过高等技校训练的专家总数：	5.10	32.01	80.49	104.98	125.73	167.05	195.58	215.69	229.27	244.64
技术员	3.10	9.28	25.44	29.54	31.00	36.07	35.63	38.94	40.96	41.06
农学家、动物学家、兽医和林业专家	0.60	3.09	8.61	20.50	23.74	29.96	33.75	37.91	41.49	45.16
计划工作专家、统计人员	0.20	0.62	2.32	2.30	2.04	1.81	1.72	1.65	1.62	1.52
商业人员	4.80	39.32	73.11	90.02	98.03	111.97	118.73	122.25	126.19	129.44
法学家	13.70	53.64	81.86	93.43	97.15	101.84	106.19	109.66	114.33	117.88
医生										
教师、图书管理学专家和文学家										

资料来源：《1956年苏联国民经济》209页；《1959年苏联国民经济》604页；《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650页；《1961年苏联国民经济》576页；《1962年苏联国民经济》465页；《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487页。

表二十二 按工业部门或行政机构分的受过大学和高等技术教育的就业专家人数
(单位:万人)

	1941年1月			1957年12月			1959年12月			1963年12月		
	全部专家人数	受过大学教育的	受过高等技术教育的	全部专家人数	受过大学教育的	受过高等技术教育的	全部专家人数	受过大学教育的	受过高等技术教育的	全部专家人数	受过大学教育的	受过高等技术教育的
	专家总数	240.00	90.80	149.20	682.10	280.50	401.60	801.70	323.60	478.10	1,048.35	428.26
工厂	31.10	15.30	15.80	110.20	35.40	74.80	146.80	44.30	102.50	211.86	61.22	150.64
建筑业	4.10	1.70	2.40	17.40	6.20	11.20	24.80	8.20	16.60	40.42	13.39	27.03
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	2.90	0.50	2.40	27.80	7.10	20.70	24.00	4.80	19.20	41.57	10.55	31.02
国营农场和农业机构	2.10	0.70	1.40	9.30	3.20	6.10	12.60	4.30	8.30			
交通、运输企业	6.20	1.70	4.50	21.50	5.60	15.90	28.00	6.80	21.20	40.45	9.01	31.44
商业和供应部门	1.30	0.20	1.10	15.10	3.20	11.90	28.10	5.70	22.40	42.04	7.37	34.67
卫生机构	46.50	11.40	35.10	126.20	30.70	95.50	143.10	34.10	109.00	165.74	41.87	123.87
干部训练学校、普通学校和 文化机构	94.40	34.40	60.00	213.20	113.80	99.40	228.40	124.00	104.40	283.03	159.41	123.82
科学、教学和研究机构	12.30	9.10	3.20	55.20	35.60	19.60	69.10	44.90	24.20	112.28	73.13	39.15
国家机关、经济管理机构、 社会团体、管理机构、 信贷和保险机构	28.10	13.50	14.60	53.90	25.50	28.40	59.90	29.50	30.40	75.04	38.15	36.89

资料来源:《1958年苏联国民经济》675页;《1959年苏联国民经济》605页;《1963年苏联国民经济》488页。以上数字不包括在服兵役的专家人数。

1928 到 1963 年之间，受过高级训练的专家总数（不包括武装部队的专家）从五十万增加到了—千零六十万（表二十）。1959 年的数字为八百万，因而比谢苗诺夫统计的知识分子人数少四百七十万。

表二十一和表二十二提供按职业和按其服务的工业部门或政府部门分类的专家数字。表中数字清楚地显示了苏联在工程、技术、医学和教育领域的实力。相形之下，经济专家人数很少，法学家人数更是少得可怜，这看来将会对一个正在争取更高发展速度的工业社会产生有害的影响。1963 年，经济专家仅占在经济界工作的专家总数的八分之一；法学家仅占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专家总数的七分之一。与此同时，苏联现领导似乎已觉察到经济专家的短缺，但却没有能在同样程度上觉察到法学家的短缺。大专院校毕业生在专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1928 到 1963 年之间，他们的人数从二十万增加到四百三十万。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他们是苏维埃制度培养出来的真正的样板）有一百四十万名，其中许多人属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上层人物。他们连同持有证书的农学家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比经济专家或法学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1959 年，除上述专家以外，尚有二百八十万人受过大学（包括未毕业者）或高等技术学校的训练。其中担任职员的一百七十万人，做工的一百一十万人。^① 在一百七十万名职员

^① 上述二百八十万人分成职员和工人的数字是根据表中受过高等训练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有关比例的材料计算出来的。在一百七十万职员中，估计一百万人在部队（四十万人在军事情报部门，六十万人在服役），七十万人作为非专家身分在活动。在一百一十万工人中，四十万人在部队（包括那些服役者在内），七十万人在民用部门工作。

中，约有四十万名大学毕业生在民间部门或部队中工作。1959年，有收入的在职大学毕业生总数约达三百六十万人（三百二十万加四十万）。^① 他们在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员（二百二十万或二百四十万）中占百分之二十，在技术、经济界知识分子（五百三十万或五百万，不包括机关办事员）中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在科学、文化界知识分子（五百二十万或五百三十万）中占百分之四十。^②

在科学和文化界知识分子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较高，这使该集团具有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影响。进步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构成“从事创造性活动的知识分子”的核心，他们是拥有声望的上层人物。官僚政治的领导干部主要出身于技术界和经济界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知识倾向同持有证书的工程师更为接近。结果，权贵上层人物同经济工作人员（他们的观点主要受经济合理化要求的支配）之间的利害冲突并没有完全消除。如果技术、经济界知识分子的学术核心是由

① 在1959年的三百八十万大学毕业生总数中，约有二十万可能是职员的未就业的家庭成员。

② 括弧中的数字是以表中的数字和谢苗诺夫计算的数字为根据的。据估计，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员中受过一些大学训练的人约占百分之十五；这是从苏联关于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百分之七点一的代表具有大学学位的声明中得出来的。在工厂厂长和总工程师中（一百万人），这一比例至少增加一倍。1959年的平均百分比是百分之二十，而1956年为百分之十五。关于党员的教育状况，见迈斯纳，《赫鲁晓夫统治下的俄国》193页。1965年1月1日，大学毕业的党员有一百八十万（百分之十五），受完中学教育的党员有五百六十万（百分之四十七点七）。1964年，职员中的党员有五百一十万人（百分之四十六点二），工人中的党员有四百一十万人（百分之三十七点三），集体农庄农民中的党员有一百八十万（百分之十六点五）。这些材料引自俄文《1966年札记》40—44页。

人数更多的具有一定资历的政治科学家和经济专家组成的话，直接从事经济领域工作的技术、经济界知识分子的影响，将会大大扩大。

辛达斯曾经描绘了苏联大学生今天占有的特殊地位，他说：

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大学毕业生独自形成一个集团，这是俄国全国排外性最强的社会阶层。他们经常在工厂俱乐部里举办讲座，但没有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当工会接管属于军队以外的疗养院和休养胜地时，他们却远离群众乐往的去处，在南方僻静、遥远的地方建造私人的夏季别墅。到了冬天，他们之中有些人飞往南方的住宅度周末。他们充当声名卓著的克里姆林宫智囊团，并且成为自觉争取在工业生产和科学领导地位方面超过美国的关键人物。由于他们对目标专心致志和群策群力，很短时间内就在超音速飞行和导弹、原子弹、氢弹、星际火箭的生产和宇宙飞船方面取得了激动人心的成就。在此期间，即使他们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落后了，也仍然应当说，他们在自然科学和工艺学方面正进入当代先进者的行列。^①

如果说上述写照仅适用于最高层的大学毕业生的话，那末这也是事实，即苏联的大学生往往把自己看成是专家中的一个杰出人物集团，而专家又明确地把自己作为一个集团，比其他职员高出几等以上。

政治领导人员和经济领导人员中也存在着同样的优越感，他们之中受过大专院校训练的人目前只是少数。苏联人

^① 辛达斯：前引书 367 页。还见 D. 卓拉夫斯基：《苏联科学家和大决裂》，载派浦斯前引书 12 页及以下；J. A. 阿姆斯特朗：《苏联学者》，载德文《苏联研究》杂志 1958 年第 6 期 56 页及以下。

习惯于把这些上层集团的职员称之为“领导干部”。在苏联共产党人的用语中，“干部”这个军事词汇是指那些受过训练的人，他们行使同政治、技术意义密切相关的职能。^①所有的专家，以及人数众多的其他职员，都包括在这个概念内。但干部这个概念也包括熟练工人和在集体农庄工作的具有一定资历的人员。官僚集团的核心是由知识分子和职员中的干部组成的。^②官僚集团除高级政治领导人和行政领导人外，还包括那些在与文化事务有关部门中担任行政职务的人以及较低级的机关工作人员。在斯大林时期的后期，官僚集团（机关工作人员）的总人数从五百五十万增加到了六百二十万。到1959年，又减到五百五十万，此后又再度上升了。这可能是苏联自1960年以来不再发表这些人员统计数字的原因。

1959年，官僚分子总数可能多达六百万，即占职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因为表二十三的数字没有把所有有关的行政部门都包括在内。在这六百万人中，有二百四十万是在政治、经济领域工作的受过训练的人员，有二百九十万是“机关工作人员”，其余则是文化管理部门和其他专业事务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

^① 关于干部的概念，见J·舒尔兹，《统一党的工作人员》（1956年斯图加特—杜塞道夫德文版）4页及以下。

^② 关于官僚集团，见F·莫斯科-马克斯，《官僚集团概述》（1959年纽威德德文版）33页。象W·W·库尔斯基在《苏联的阶级划分》（载《外交事务》1953年第1期145页）那样，不管知识分子完全依附于国家的实际情况，把俄国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说成是“官僚”，这是不公正的。同样，G·巴伦顿·摩尔的观点——应该把职员和知识分子跟官僚集团等同起来——也是微不足取的。见《苏联政治——权力的难关》（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英文版）280页及以下。

表二十三 苏联官僚集团

年 份	人 数 (万人)
1941(6月)	551.5
1952(4月1日)	623.2
1954(4月1日)	610.4(621.3)
1955(1月1日)	569.7(580.7)
1958(9月1日)	557.9(569.6)
1959(9月1日)	555.4(564.5)
1960(9月15日)	575.3

资料来源：《1959年苏联国民经济》595页；《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664页。括弧中供比较的数字引自1959年年鉴。

按照斯大林的等级制度，“领导干部”包括最高层官僚分子以及那些在高、中级职位任职的人员，他们有的作为国家的代表，有的具有特殊的职业资历。^① 官僚集团还包括在政府低级职位任职的具有类似资历的人员以及官僚分子的助理人员。

“领导干部”包括所有列入党干部部门以及国家人事部门和从属于它们的社会团体人事部门“花名册”上的官员。^②

^① 关于职员或公职人员的概念，见S·S·斯图丹尼金、V·A·乌拉索夫和I·I·叶甫季切夫编，《苏联行政法》（1950年莫斯科俄文版）126页及以下；Iu·M·科兹洛夫编，《苏联行政法》（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141页。办公室的固定性质和公务的持续进行，是使公职工作有别于非经常行使的官方职责的一个因素。职员一经任用，即取得公职身分。在公职人员中间，可区分为政权代表者和一般公务员。霍夫曼未能令人满意地作出这种区分（前引书494页及以下）。

^② 见B·列乌茨基，《花名册：苏联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1卷（1961年）409页及以下；舒尔兹；前引书226页及以下。我们应该把基本花名册和登记花名册区别开来。基本花名册是在党的控制之外的担任公职者的名单。登记花名册则包括未列入基本花名册的属于统治和领导地位的人的名单。赫鲁晓夫的后继者并未对“花名册制度”进行任何改变。见列乌茨基，《等待着一个新的列宁》13页及以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干部部门负责提出最高层官僚机构的“花名册”。^① 苏联存在着对立形式的官僚分子组织：一种依靠庇护，一种根据工作成就。^② 甚至目前仍然可以观察到斯大林时期后期正在形成一个官僚阶级的趋势。苏联官员在行使其社会职能方面陷入了相互冲突的境地。^③ 首先，对他所任官职相关的期望同对他的社会职能相关的期望，两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其次，在他对庇护者（党）的忠诚同他对社会的义务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后者要求他能更好地胜任尽责。个别官员常常用下述的办法来解决这种冲突：他们或多或少地一会儿作出有利于“极权国家”（即有利于执政党）的决定，一会儿作出有利于范围更广的社会的决定。

西方学者在社会学研究文献中应用“职能原理”来区分职员和工人。例如，弗里茨·克罗纳提出下述四种职能作为职员工作的特点：管理职能、阐释或分析职能、行政职能和商业职能。^④

克罗纳认为根据“授权原理”，所有这四方面的工作范围都是从一个广泛的管理职能发展起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⑤

① 关于苏共中央党机关部门的组织，见迈斯纳：《赫鲁晓夫统治下的俄国》189页。

② 关于官僚机构主要类型的论述，见莫斯坦—马克斯，前引书70页及以下。

③ 为了研讨社会职能以及职能的交叉与重叠之间的差别，见R·达伦道夫，《社会学的人》第4版（1964年科隆—奥波拉登拉丁文版）。

④ 见F·克罗纳：《现代社会中的职员》（1954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维也纳德文版）31页及以下，和《职员社会学》（1962年科隆—柏林德文版）112页及以下。又见H·霍夫鲍尔：《雇佣劳动者的社会构成》（1965年科隆—奥波拉登德文版）111页及以下。

⑤ 作为对克罗纳授权原理的一次批判，见G·哈特菲尔：《德国的职员和职工会》（1961年柏林德文版）87页及以下及霍夫鲍尔，前引书100页及以下。

再则,在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里,能否借助于“职能原理”在职员和工人之间划一条如此明确的界线,这也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在许多领域内,职员和工人的职责是相互交叉重迭的。^①然而我们可以说,尽管在某些特定领域内职员和工人的职责相互交叉重迭,但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职员和工人系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②因此,在一个不如苏联那样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里,用克罗纳的职能原理较之只用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的差别来区分职员和工人,看来无疑是一种更为合适的标志。根据这一原理划分的苏联职员人数很可能比苏联统计提供给我们的数字大得多。不管怎样,职能原理使我们能把大部分“领导干部”所进行的特殊活动——制定政策、制定社会计划和进行社会控制的职能——划分出来。

行使这些职能(这不是“工作职能”^③)总是指组织整个社会,而不是指仅仅组织某项工作,或者组织某一部分工作。因此,党的官僚机构及在政治思想上从属于它的国家和社会机构行使的这些职能,同工厂厂长和各科室管理人员行使的职

① 斯坦默便认为职员和工人的分界限同他们是否从事脑力劳动并无多大关系。见O·斯坦默编,《生产活动中的职员和工人》(1959年柏林德文版)42页;霍夫鲍尔,前引书111页及以下。关于根据工人在不同工业领域行使的职能所进行的再分类,见哈特菲尔,前引书111页及以下。

② 见霍夫鲍尔,前引书154页及以下。

③ 这点被霍夫曼(前引书192页)忽略了,他错误地认为应把苏联社会只看作是旨在获得成就的社会,因为它显示出“对工作职能的高度推崇”。有一些当代的苏联思想家,同赫鲁晓夫截然相反,他们强调政治优先于经济,反对把党的社会领导职能建立在具体的经济领导之上,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把属于经济主管人员范围内的工作领导职能包括进去。列乌茨基,《花名册制度》7页及以下,忽略了这一事实,即这乃是使得它们作为“政策制定职能”而不是作为“行政管理职能”归属于社会领导职能的一个主要理由。

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撇开经济制度的不同,后者同西方的经济工作人员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异。^①

行使这些政治职能的那一部分“领导干部”实际上属于官僚集团而不属于职员范畴。而且他们是全权国家的化身,这个国家作为唯一的业主和雇主,所有工人都依附于它。1959年,最高层官僚分子共约四十万人,如表十九所示。他们之中约半数是党的官僚分子。^② 同年还有经济工作领导人员约一百七十万人。其他官员(法学家、经济专家)约三十万人。^③ 在约二百四十万名上层统治人物中,1959年估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五十万人,其中属于最高层官僚分子的约有十万人。另外三百一十万名大学生,主要是在苏联各领域的高级文职岗位上任职。1959年,主要由最高层官僚分子和大学毕业生组成的整个上层阶层可能多达三百八十万人。^④

① 见D·格兰尼克,《红色行政官员》(1960年纽约英文版)。

② 培勒,前引书49页,也估计主要搞党务的官员——属于统治地位的——约达二十万名。鲍尔—英凯里斯—考克宏,前引书158页,估计有一百五十万人系属于“统治上层”,这恐怕有些夸大。

③ 表中所列的二百一十万人的数字只包括最高层官僚分子和经济工作人员。加上二十五万名其他政府官员,象谢苗诺夫指出的那样,这一数字达到二百四十万,见前引书418页。在这一数字中,除最高层官僚分子外,他把一百万生产部门的厂长和领导人员和一百万官方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内,但不包括八十万商业和供应部门的经理,他们无疑地是属于这些最高集团的。如果把他们包括进去,“领导干部”的总数便几乎达到三百二十万人。

④ 人们很难有权把全部“知识分子”(一千五百六十万人)或仅是全部“专家”(八百万人)都称为上层阶层。米纳特认为(《赤联人》47页)1958年苏联上层阶层(包括家属在内)的总人数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人,这是站不住脚的。范德金(前引书326、329页)计算的人数约为五百八十万(减去一百九十万家属)比较接近实际的指标。根据作者的计算,1959年上层阶层包括家属在内共有七百九十万。

其余的领导人员和只受过中等技校训练的其他工作人员约有六百五十万人，^①而在中级文职岗位任职的工作人员和官员共有二百四十万人。在八百四十万名行使“服务职能”（按照谢苗诺夫的说法）人员中，在低级文职岗位任职的官员和工作人员约占三分之一（二百八十万人）。其余三分之二（五百六十万人）是官僚集团的助理人员和低级职员。^②

八百四十万名职员中的大多数，其中包括百分之六十的官僚分子，受教育的程度并不比受过训练的工人好多少。

对此，一位研究苏联事务的有经验的学者曾经评论说：

苏联工人的劳动条件同西方工人不相上下，而职员则挤在通风恶劣、陈设简单和令人不适的办公室里工作。职员显然处于不利的地位。据说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连次要的领导角色也从未担任过。当然，对属于上层人物的较高级职员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他们同一般职员在外表和生活水平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然而在智力方面并不存在着差别。他们的文化程度使他们能够在同等的基础上同西方来访者讨论知识方面感兴趣的问题。^③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九五九年得到高等教育好处的职员占职员总数（包括他们的家属）的百分之三十九，而工人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五点三，集体农庄农民的比例只有百分之

① 二百四十万“领导干部”中有多达七十万人（百分之三十）可能没有受完他们的大学或高等技校的训练。“领导干部”减去最高层官僚分子和大学毕业生（一百七十万人），但包括受过高等技校训练的其余专家（四百一十万人）和其余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人员的一半（七十万人），总共约达六百五十万人。

② 官方数字显示机关办事员和小职员的人数只有四百二十万人，因为谢苗诺夫显然把他们算作执行职员职能的那一部分工人阶级。下面关于就业人口社会分类的数字是以官方数字为依据的。

③ 伯林纳斯：前引书 43 页。

二点六。正是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意识使职员中的各个不同集团越过他们之间的分歧,产生比苏联社会另外两个阶级(工人和农民)占有特殊社会地位的感觉。

5. 苏联的社会阶层分化

苏联人对于他们的国家存在着阶级这一点并不与人多费口舌,虽然生产资料私有制早已废除,并且正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但他们却断言:由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化,纵的阶层分化已经取代了原来横的阶级结构。^① 这是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同与他们密切联系的职员和知识分子和谐合作所带来的变化。

工人据说在“全民国家”结构内占据着意识形态上的明确的优先地位,“全民国家”最终将取代“无产阶级专政”,^② 而且这种国家不再会发生社会阶层分化或阶级对抗。随着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逐步缩小,社会分化也将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消失,并由依据“共同占有财产”原则建立起来的“无阶级社会”所代替。

的确,社会主义社会将仍然存在着社会矛盾。^③ 但是这些矛盾并不具有对抗的性质。因此,这将有可能通过渐进的

^① 见格列泽曼:前引书 150 页及以下;又见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及各阶级的融和》,载德文《共产党人》杂志 1956 年第 15 期;德文《东方问题》杂志第 9 卷(1957 年)158 页及以下。

^② F.C. 施罗德:《根据苏联共产党新党纲来看国家和法的内容及发展》,第 1 部分,载德文《东方法学年鉴》,Ⅱ/Ⅰ(1962 年)68 页。

^③ 见格列泽曼的文章,载德文《东方问题》杂志第 9 卷(1957 年)162 页及以下;C.A. 斯梯潘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及其消灭的途径》,载德文《苏联的出版物》杂志,1955 年 7 月 31 日,第 88 期。

方式,而不是社会冲突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矛盾。^①

同时,据说已经改变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苏联共产党,将继续作为“社会权力”的执掌者而存在,并将发挥它的特殊的政治和经济职能。^②至于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理想的社会一般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要到将来才能回答。代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人们只是断言苏联将不再有任何“社会阶层分化”。

我们在论述形式上的阶级结构时已经清楚地指出,按职业状况和教育状况区分的各别的社会大集团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差别。这些差别同权威、声望、收入、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的不同密切相关,同受这些因素制约的社会行为的不同密切相关。^③苏联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各别社会集团在道德准

^① P·Ch·卢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冲突论立场》,载《考尔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第13卷(1961年)673页及以下;又见他的《矛盾论和社会学》,载鲍特契尔—李别尔—迈斯纳,前引书307页及以下。波兰社会学家斯坦尼斯劳·奥斯托夫斯基,在他著的《社会意识的阶级结构》(1962年纽威德德文版)140页,正确地指出“非对抗性的阶级”对马克思和列宁来说,是有矛盾的形容词。

^② 见迈斯纳,《苏联共产党党纲》120页及以下。

^③ 关于决定社会分化准则和经验主义地解释社会阶层问题的讨论,见Th·盖格尔,《阶级分化》,载W·伯恩斯坦和F·布洛沃编《社会学词典》(1955年斯图加特德文版)432页及以下。又见K·V·穆勒,《高度工业化社会中的才能和分化》(1956年科隆—奥泼拉登德文版);又见R·梅因茨,《一个工业公社中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变革》(1958年斯图加特德文版);《关于经验主义地解释社会分化的观点和结论》,载R·寇尼格编《公社社会学》第2版(1962年科隆—奥泼拉登德文版);《对职能上的阶级分化论的评论》,载D·V·格拉斯和R·寇尼格编《社会分化和社会变动》(1961年科隆—奥泼拉登德文版)10页及以下;K·M·鲍尔特,《社会的兴衰:对职业的贵贱与变动的研究》(1959年斯图加特德文版);H·克卢特,《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1957年斯图加特德文版);E·什奥赫和H·达赫姆,《社会声望和社会分化》,载D·V·格拉斯和R·寇尼格编《社会分化和社会变动》第65页;霍夫鲍尔,前引书。

则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差别产生了明白无误的阶级分化。在工作职能和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制约着这种阶级分化的首要因素是权威和声望；这两者比收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权威更多地同一般领导地位所起的社会作用相联系，而更少地同在国家部门占据一定公职相联系。^①

只有明确区分国家同社会的差别，才能区别领导地位同统治地位的不同。^② 只有明确认识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和独立性，才能对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变革的性质这一困难

^① R·达伦道夫所发展的对冲突论的批判，在最后分析中是建立在他把制度化了的权力和社会领导权等同起来这一基础之上的。对国际关系方面的考察，清楚地表明霸权和最高权力即绝对统治制度是不相同的。见H·特里皮尔，《霸权，领导国家的经典》（1961年阿林德文新版）。从国家内部社会组织和事务的另一种意义上看，这同样是真实的。所以，附和达伦道夫并把基本上不属于政治性质的机构——如工厂——都视为权力机构，是很难说得过去的。见达伦道夫，《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年斯图嘉特德文版）215页及以下，和《社会冲突》，载德文《时代》1965年10月29日，第44期，43—45页。霍夫曼力图在他对苏联社会的探讨中消除制度化了的权力，并简单地依据一个为非制度化了的权力（理解成社会权力）所指挥的社会来进行，也是错误的。一党独裁意味着普遍的制度化了的权力。霍夫曼曾由于这个理由未能领会统治结构对苏联社会阶级性质的意义。

^② 国家和社会之间，从而社会准则和立法准则之间的性质上的差别，被社会学家处理得很不令人满意。国家并不仅仅是既定活动范围内的最广泛的社会结构。它同时也是拥有主权即基本统治权和推行其决定的能力的唯一巨大的社会组织，从而在它履行自己的各项公共职能时得以代表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拥有明确的权力结构的政党和别的利益集团，是可以使自己成为国家主权的最重要掌握者的。然而，它永远不能代替全体。见H·克鲁格，《国家学说概述》（1964年斯图嘉特德文版）185页及以下；U·邵纳尔，《近世国家学说中的国家本质和政治概念》，载《宪法和教堂秩序，给鲁道夫·斯蒙德的节日礼物》（1962年杜宾根德文版）22页及以下。H·埃姆克曾建议用“政治共同体”和“政府”来代替“国家”和“社会”，他的做法使国家不仅是一个权力组织而且是建立在人们团结一致的基础之上的共同体这一更为正确的观点模糊不清了。R·W·富斯雷在他著的《国家的不变基础，一个价值规律的国家学说的主要特点》一书中就指出这点。

问题提供答案。

正如赫伯特·克鲁格所指出的，^①领导地位这种关系同作为国家标志的“权力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后者同命令和服从相联系，而前者则同权威和自愿遵循相联系。领导地位通常意味着一种得到体制保证的权威地位，而统治地位总是同体制化了的权力相关。^②领导地位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来自同它的社会职能相关的权威性。不仅如此，领导地位还同声望相联系，也即同承认某一个人或某些集团的人们具有的优越性和创造性相联系，不管这个人或这些人是否占据着权力的一席之地。

在现代工业社会里，知识是构成权威和声望的基础。^③这对于苏联和世界其余的地方都是同样适用的，虽然苏联这个工业社会尚未完全冲破发展中社会的外壳从而仍然存在着许多原始的特征。根本的差别在于：苏联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而今天北半球的先进工业国家毫无例外都是民主国家。

这里我们首先限于分析以工作成就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然后再分析同苏联社会的权力结构相关的极权主义模式。汉斯·德赖采尔正确地强调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杰出人物社会

^① 见克鲁格，前引书 365 页及以下和 840 页及以下。有趣的是，米哈依洛夫（前引书 58 页）在区分“指挥”作用和“领导”作用时谈到苏联也存在有类似的差别。

^② 达伦道夫并不从制度化了的权力中区分出社会领导权，他把所有的“统治”地位都说成是“权威”地位。这里，为了避免混乱，在社会领导权和制度化了的权力之间，而不是在权威地位和指挥地位之间有分析地作出了一种界限。

^③ 见 H·P·德里采尔，《权贵概念和社会结构》（1962 年斯图加特德文版）75 页及以下。

结构。^① 在这种社会，几乎所有的生产领域都专业化了，而为各专业工作挑选杰出人物的方法已经事先由教育的淘汰制或官僚主义的组织审查所决定和控制。这是工业化社会吸收杰出人物的已成体制的挑选方法。德赖采尔把知识资历描绘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手段，^② 知识资历不仅作为挑选杰出人物的规定标准，而且也是作为挑选工作的实际依据。但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从事生产的能力，并非取得社会上层地位的唯一途径。这还同个人的钻营有关：除具有使人信服的本领外，还有适应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准则的本领，以及在社会这个权力机器内部有着个人关系。凡此种种，超越一切事业成就标准而成为被选中的重要手段。^③ 这种向上爬的方法，在苏联这个高度官僚主义化社会和极权主义一党制下，远比在民主的工业社会更为吃香。在苏联，除得到党的领导人的庇护（花名册制度）以外，具备一定意识形态的理论知识、弄权的技巧和组织的才能是至关重要的。

钻营比能力起着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填补社会高层职位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这决定了苏联社会带有明显的阶级性质和苏联上层阶层具有部分特权的性质。^④ 就这一点说，西方进步的工业社会尽管存在着结构上的弱点，却比苏联更

① 见 H·P·德里采尔：《权贵概念和社会结构》（1962 年斯图加特德文版）92 页及以下。

② 同上书 153 页。

③ 同上书 100 页及以下。

④ 当福夫曼（前引书 499 页）谈到作为“权贵人物”的苏联官员（他的个人晋升受效率原则制约）时，完全忽略了在苏维埃制度下单凭能力向上爬和党的庇护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这种区分也未出现在鲍特契尔的著作中（前引书 108 页及以下）。另一方面，季拉斯（前引书 92 页）则完全认识到凭能力向上爬作为钻进“统治阶级”行列的一个基本条件的重要意义。

突出地建立在能力的基础上。在苏联，能力这一原则特别表现为组织劳动的基本原则。

无论如何，苏联拥有受过大学和高等技术学校训练的专家，这些专家具有原子时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能力，他们占据着所有的重要领导职位，此外，也占据着某些进行统治的职位。由于他们行使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即使他们并非权贵人物的一部分，也能够对制约着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和法制施加影响。^①

除党的领导干部是按照特殊的吸收程序进行挑选外，苏联权贵人物主要来自上层和中上层阶级。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在这些权贵们中占有一种声望的地位，这使他们除本阶级的成员外，能够有效地影响整个社会的态度，有时是违反统治集团的愿望的。^② 在某些场合下，苏联的道德准则更多地是由这些社会名流的知识影响所塑造，而不是由经济工作人

^① 可见，社会分化以及它所表现的不平等，不能单单追溯到权力结构，象达伦道夫在杜宾根首次演说中所作的那样。见R·达伦道夫，《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1961年杜宾根德文版）28页及以下。他虽然最初开始是把制度化权力理论和一体化理论等同起来，可是最后却作出结论即分化要从权力出发、一体化要从强制出发、稳定要从变化出发。达伦道夫的这些论点受到谢尔斯基的尖锐批判；见他写的《阶级概念对分析我们社会的意义》，载《社会科学年鉴》第12卷（1961年）237页及以下。谢尔斯基反对片面强调制度化了的权力，正如他反对把制度化权力理论同一体化理论完全分开一样。人们公认他没着手去区分社会领导权和制度化了的权力，但是他正确地指出，把权力片面解释为冲突和紧张是不行的，因为在权力关系中还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鉴定与合作。然而，他的关于统治者身分应该理解为不仅是权力而且是正义的想法，却很难应用于极权主义的统治。

^② 也见米哈依洛夫的内容丰富的报道：《1964年莫斯科的夏天》（1965年伯尔尼德文版）。

员取得的成就或权贵们和从属于他们的官僚机构规定的准则所塑造。^①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该所从事于苏联青年中权贵集团的道德准则、理想和抱负的研究。

调查是紧接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于一九六一——六二年冬天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的。^② 回答调查的青年平均二十七岁。他们把理想的公民确定为“一个经常抱合作态度的人”、“一个勤勤恳恳的工人”和“一个名符其实的专家”。他们对“野心勃勃和卓有成绩的经济工作人员”（他们被树立为最好的劳动者的样板）以及“忠心耿耿的劳动者”都没有给予肯定的评价。目空一切和不能勇于承担责任的人特别受到抵制。回答调查的人正面肯定的道德准则中列为第一位的是“有趣的工作”（百分之二十二），第二位是“个人和家庭的幸福”（百分之十八）。其次，男性偏爱的道德准则是“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女性则把“纯洁的良心”列为她们偏爱的道德准则的第三位。另一方面，没有人把名望和“对他人的权力”列作正面肯定的道德准则。

为了检查上述结论的可靠性，随后进行的调查表明：百分之二十三的回答调查的人断然拒绝把“对他人的权力”作为社

^① 1956年英国社会学家曾在个别国家中对职业声望进行过比较研究，据说医生、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苏联都位居阶梯的顶端。在他们之下的是工业经理和会计员、官员和教师。熟练工人的名次高于集体农庄主席，普通集体农庄农民则位于最底层。见A·英凯里斯和P·H·罗西，《各国职业声望的比较》，载英文《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1卷4期（1956年）336页及以下。

^② 又见V·B·奥尔桑斯基，《品格和道德准则》，载俄文《苏联社会学》第1卷491—530页；瓦根雷诺，《经验主义的社会调查》410页及以下。

会目标；百分之十八抵制“获取财富”，百分之十三抵制把名望作为更高的生活目的。只有百分之零点七的人否定把“思想和行动自由”作为人类合乎理想的目标。

当询及他们的子女时，回答调查的人认为“道德品质”（百分之二十七）和“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品质（百分之十七）、具有音乐才能和体育才能（百分之九），比任何技术资格来得重要。只有百分之四的人希望其子女成为“合格的熟练工人”，百分之三的人希望成为“宇宙的征服者”。这些道德准则同党所规定的意识形态标准迥然不同，清楚地表现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人道主义影响，苏联各阶层的人民仍然在阅读这些文学。个人同非正式的社会风气的融合，是传统的行为准则深化的连带结果，这些传统的行为准则表明俄罗斯知识生活无间断的连续性。^①

加上若干保留，这种情况对于宗教领域也是适用的。在上述调查中，只有百分之三的人表明自己有时偶而去教堂做礼拜。但是在回答调查者中的已婚者，有半数以上的人允许他们的子女受洗礼。^② 由于人们都能理解的原因，上述社会调查并没有明确提出问题，调查苏联人民中具有代表性的一

① 苏联的歌剧和戏剧在保持这种连续性方面是很起作用的。

② 这些被询问者（平均年龄为二十七岁）有百分之四十七说他们的子女曾受过洗礼；百分之十八回避了这个问题，可能他们的子女也受过洗礼。关于教堂和国家的关系、基督教派特别是浸礼会的成功、无神论政体和宗教社会之间的尖锐冲突，见 W·科拉兹，《苏联的宗教》（1963 年弗赖堡德文版）；辛达斯，前引书 108 页及以下和 126 页及以下；米哈依洛夫，前引书 99 页及以下；R·杜派因，《基督教面貌的苏联》，载德文《方针》杂志，1965 年 10 月号 26 页及以下；《苏联的教堂斗争方法》，载德文《新苏黎世人报》1965 年 11 月 13 日。

部分人同财产的关系。^① 但是,苏联报刊的报告清楚表明:属于各阶级的苏联人都希望得到更高的收入,^② 更多的私人财产。^③ 党的领导必须考虑这些愿望并迎合这些“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党采取各种措施来挡住建立更多私营企业的冲击,如果必要的话,不惜诉诸严酷的刑事制裁。^④

从苏联 1959 年的统计中可以看到挣薪金和工资的人,他们的收入是多么的低微。统计表明,有四千万人(占工人、职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月平均工资为六十或低于六十卢布(一新卢布等于一点一美元)。^⑤ 要到一九六五年,才考虑把月平均工资提高到九十九卢布。^⑥

根据苏联材料,1960 年国民总产值为一千四百六十七亿卢布,工业总产值为七百六十四亿卢布。因此,工业在国民总

① 问题是如果有钱会想要什么;上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想要一套较好的住房或家具,百分之十二点三想要文化用品(书籍,乐器等),百分之十一.三想要服装和食物,百分之十点五想要机动车辆(其中百分之九想要自用的汽车),百分之十七未表态。百分之九则宣称他们没有多余的钱而且永远也不会有。

② 1963 年在列宁格勒进行的一次调查(有两千七百名工人被征询意见),表明有百分之七十七宣称他们是把工作的物质利益当成主要的事情。只有百分之二十三愿意去干党让他去干的工作。见 H·瓦根雷诺,《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发展》,载德文《国会》周刊增刊,1965 年 9 月 8 日第 19 页。

③ 在阿奇米诺夫的书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④ 见 K·奥尔金,《关于社会学和苏维埃学》,载德文《苏联研究》杂志 1965 年 6 月第 18 期 60 页及以下。

⑤ 见《四千万最低薪工劳动者》,载德文《东方问题》12 期(1960 年)367 页及以下。这个分析是根据 1961 年 1 月 1 日货币改革前的标准,货币改革后则以十抵一。为了同目前进行对比,薪工数额已换算成新卢布。

⑥ 根据薪工劳动者收入而做出的官方统计表明,在 1965 年只达到月平均收入九十五卢布的水平(按照苏联的汇率合一百零五美元)。如果考虑到国家的社会服务和其他各种收入,那末月平均总收入则达一百二十八卢布(一百四十二点二五美元)。见德文《科尔纳城市通报》,1966 年 2 月 3 日第 8 页。

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要比农业大得多。而1959年，全部工资和薪金只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一。^①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包括萨尔区和柏林)，工资(就业劳动者的总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1959年为百分之六十点八，1960年为百分之六十一。^②如果把独立劳动者的收入包括进去，劳动人口占有社会总产品的份额甚至将会更高。这些数字表明，苏联社会受到更高程度的剥削。这可以从这样的事实得到说明：社会总产品很大的一部分本可以用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却被作为储备存放起来。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上层阶层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收入的差距更加扩大了。上层官僚分子和一些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得到社会报酬中特别高的份额，这种报酬不仅仅限于现金收入。^③上层阶层普通成员的收入水平较之仅次于这一阶层的成员的收入水平也要高得多。^④区分中上阶层和中下阶层收入的差别更为困难，因为属于中下阶层的熟练工人或技工往往比医生或高校教师赚更多的钱，后者按照其他标志来看，

① 数字摘自俄文《统计通报》杂志1961年第7期94页，以及德国工业研究所编《经济手册》(1961年科隆德文版)565页。

② 见季拉斯，前引书57、64、69和86页。只有一部分扣留下来的社会产品是被用于统治者的个人福利，此一情况在这方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去注意如下事实，即与其他工业社会中的情况相比，权贵们的收入显著地高于一般公众。

③ 苏联最高级官员的确切收入水平是保密的。在1960年，院士的薪金(按新卢布计算)为八百到一千五百卢布，歌剧明星约五百到两千卢布。见E·奈什，《苏联工人的购买力》，载英文《劳工评论月刊》第4期；德文《东方问题》第12期(1960年)372页。

④ 根据奈什，前引书372页，在1960年工厂经理的平均月收入为三百到一千卢布(新卢布)，一级教授为六百到一千卢布，各部的司局长为七百卢布(各项津贴等除外)，讲师为三百到五百卢布，工程师为一百到三百卢布。

显然属于中上阶层。^①收入作为区分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的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另一方面，把收入作为区分下等阶层内部各集团的尺度则不那么容易，因为很难确定集体农庄农民收入的确切数额，^②集体农庄农民的现金收入大大低于不熟练工人^③和小职员。

虽然收入是划分苏联各社会阶层的可靠基础，但由于生活水平相对低下，社会声望一般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苏联社会的阶级意识既取决于文化水平，也取决于职业身份。因此，机关工作人员往往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的熟练工人，尽管他的收入低得多而且官方是把他列入较低的社会阶层。

在斯大林时代，上层阶层(特殊情况例外)的生活方式看来并不比中上阶层和中下阶层更为资产阶级化。后来，仿效西方习惯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倾向，开始逐步出现。^④

今天苏联社会的社会阶层分化同1917年革命前俄国存在的社会结构颇不相同。差别是实质性的。

首先，苏联的社会金字塔比沙皇俄国要低得多，同时更为

① 1960年技术员的月平均工资为八十到二百卢布，有一定资历的工人专家为一百到二百五十卢布，医生为九十五到一百八十卢布，中学教师为八十五到一百五十卢布。月平均工资为六十到九十卢布的普通熟练工人和小学教师，列在中等收入的最低一级。

② 在1960年，一名非熟练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二十七到五十卢布，集体农庄农民为十卢布左右。

③ 较高的收入系来自在集体农庄市场上的较大交易额和农产品官定购买价格的急剧上涨。更近一些，从1952到1964年，平均价格已经增加了十五到二十倍；马铃薯价格已经增加了四十倍。见瓦根雷纳，《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发展》第19页。

④ 见G·斯皮考维斯，《俄国人和别国人》(1963年杜塞道夫—维也纳德文版)。

均衡。居于苏联金字塔尖端的各集团，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低于俄国的上层阶层。其次，苏联金字塔赖以建立的基础要低得多。劳改犯的人数在斯大林死后侥幸有所减少，但他们仍然组成一个单独的社会集团，比旧社会大多数贫民遭受更大的屈辱。如果撇开这一集团，则不熟练工人、小职员和人数众多的集体农庄农民(包括个体农民)组成金字塔的最底层。然后是受过训练的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和具有一定资格的集体农庄农民。中下阶层包括熟练工人和“工人贵族”(工长和资历极深的熟练工人)以及同级别的职员。中上阶层包括没有成为最高层官僚分子的受过高等技校训练的“专家”。上层阶层则由不受文化水平限制的最高层官僚分子和大学毕业生组成。从这方面来看，它比革命前的上层阶层要广泛得多。^①

总人口的社会阶层分化情况同就业人口的社会阶层分化情况可能在基本项目上都是一致的，后者把各大社会集团分成阶层。

确定那些属于上层阶层、中上阶层和中下阶层的人比较容易。这三个阶层的成员大多限于知识分子和职员。除了集体农庄农民比较容易确定和分类外，缺乏区分最底下两个阶

^① 从理论上说，把上层阶层加以分类将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上层阶层约有八十万，包括四十万最高层官僚分子和人数差不多相等的具有高等专科院校经历并占据最高层职位的知识分子，而上下阶层则由约三百万人组成。由于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不断增加，具有高等专科院校经历可能已失去它迄今在区别上层阶层和中上阶层方面的重要意义。1959年，由于其职业所发挥的作用而属于上层阶层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几乎同那些没有受过高等专科院校训练的局外人相等，即同作为上层阶层的组成部分的作家人数几乎相等。

层的可靠尺度。因而只有去苏联进行实地调查，才能帮助我们更正确地确定各个阶层。由于目前没有可能进行这种调查，表二十四只是根据总的特征所确定的苏联各社会阶层的分化情况。

表二十四 1959年苏联人口阶层分化情况

阶 层	就 业 人 口		总 人 口 (万人)
	人 数(万人)	%	
合 计	9,910	100	20,880
上层阶层	380	3.8	790
中上阶层	650	6.6	1,380
中下阶层	1,550	15.7	3,280
下上阶层	2,730	27.5	5,740
下下阶层	4,600	46.4	9,690

上层阶层人数(三百八十万)和中上阶层人数(六百五十万)是根据“职员”和“知识分子”该部分的估计数。中下阶层人数(一千五百五十万)中包括二百四十万职员(一百六十万属于资历极深的工人,其中约六十万未曾受完大学或高等技校训练)和一千三百一十万人(其中约七百七十万是生产工人),即占工人总数(四千六百一十万人)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四,其中约有一百一十万人,他们大多数受过高等技校训练。下上阶层人数(二千七百三十万)中包括二百八十万“机关工作人员”和同级职员,一千五百万受过训练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其中约八百二十万是生产工人)和九百五十万具有一定资格的集体农庄农民(生产队长、拖拉机手,等等),其中一小部分受过高等技校训练。下下阶层包括四百二十万“小职员”、一千八百万非熟练工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一)和二千三百五十万普通集体农庄农民,尚有差额三十万人,包括分别属于最低三个阶层成员的个体农民和手工

业者。苏联总人口的社会阶层分化统计是根据各阶层占就业人口的百分比估算出来的。同范德金的数字作一比较，他关于最高两个阶层的数字比本表大：上层阶层五百八十万（本表为七百九十万）；中上阶层一千九百万到二千四百万（本表为一千三百八十万）；中下阶层三千三百万到三千六百万（本表为三千二百八十万）；整个下层阶层一亿四千四百万到一亿四千八百万（本表为一亿五千四百三十万）。

6. 苏联阶级结构的真相

现代工业社会具有高度的可变性。苏联之所以比西方高度发达国家表现出较低程度的社会地位可变性，这主要是渊源于独裁一极权主义制度的过度集中和过度官僚主义化所造成的。苏联社会学家为了不致被迫对统治结构同社会不平等制度的相互关系提供更多的细节，他们到目前为止总是回避讨论任何有关社会地位变动同社会阶层分化之间的联系问题。^① 近来只有某些文学界人士敢于肯定：权力是产生战后日趋激化的阶级差别的重要根源。^② 苏联当代的文学透露（正如社会实际本身尖锐地表明那样），苏联社会已经跨越以能力为唯一基础的杰出人物统治的工业社会；它已明白无误地成为一个阶级社会。这个社会具有一些独有的特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按照极权主义模式的要求，对苏维埃制度的墨

^① 鲁特凯维奇，《苏联社会学》第1卷774页。

^② 例如，见1953—1954年冬出版的列昂利德·索伦写的剧本《客人们》，曾重载于德文《东欧》杂志第6卷（1954年）4页；又见乌拉季米尔·杜丁切夫的著名小说《不单靠面包》（1957年纽约英文版）；瓦勒里·塔西斯，《矢车菊》（1963年纽约英文版）；亚历山大·索尔任尼琴，《在伊凡·丹尼索维契生活中的一天》（1963年纽约英文版）。还见米哈依洛夫，前引书102页。

守成规和生气勃勃两方面一视同仁。^①

到目前为止,有关极权主义的讨论总是受到这样的干扰,即基于希特勒政权和斯大林主义的经历而过分强调了大规模恐怖活动的重要性。^②与此同时,对于独裁——极权主义统治制度的根本特征则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③这种政权的第一个主要特点是:由于实行持久的一党专政,党的独裁统治不受任何限制。党的独裁统治不受限制,连同下述另外两个主要特点,是使它同专横政权区别开来的主要之点,后者现在也大多依靠一党专政。^④

^① 直到现在,由于对低估大规模恐怖活动的重要性以及低估名符其实的社会冲突给当权党带来的影响缺乏足够的概括,要建成这样的极权主义模式更加困难了。见P·Ch·卢兹,《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大纲》,载卢兹编《德国社会学研究与资料》(1964年科隆—奥泼拉登德文版)11页。关于对极权主义的探讨情况,还可见德文《社会世界》杂志第12卷2期(1961年)特刊,其中载有O·斯塔姆勒、G·舒尔兹和P·Ch·卢兹的文章。关于极权主义统治的概念和性质,又见O·斯塔姆勒的《政治社会学》,载A·盖林和H·谢尔斯基编的《社会学》第3版(1955年杜塞道夫—科隆德文版)290页及以下。

^② 总之,这对象汉纳·阿伦特、卡尔·C·弗利德里希和兹比涅夫·K·勃尔杰辛斯基一类作家来说是真实的。

^③ 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类型极权主义的三个基本要素的详细讨论,见迈斯纳,《苏联统治制度和宪法权利的改变》,载鲍特契尔—李别尔—迈斯纳,前引书142页及以下;《自赫鲁晓夫以来俄国在党和政府方面的改革》,载英文《观察》杂志1965年7月号31页及以下。

^④ 马丁·德拉特在给E·里查德的书《未经委任的权力,德国苏驻防区的国家机关》(1958年科隆—奥泼拉登德文版)写的序言中,曾把想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准则制度的努力描述为极权主义(他把它同专横政权区分开来)的“首要现象”。的确,当这个目标同全面计划制度联系在一起时,它便成为极权主义的特征了。然而,从政治社会学观点来看,这很难被作为“首要现象”。这在极权主义组织原则从党转移到国家从而转移到人民的性质上尤其如此,因为这样的转移强调了党的独裁的无限性。另一方面,专横政体是一种独裁类型,它实行政权的集中化和对社会某些部分的有限控制;计划是有限的并且同是否试图建立崭新的社会准则制度无关。

第二个特点是“自上而下”的全面控制。这种控制借助于众所周知的传送体系，不仅仅扩展到一切具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和有关的消息报道。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全面控制的结构之内，恐怖只不过用来显示控制机构的效率而已。极权主义制度决不会摒弃以使人感到害怕和恐怖作为达到社会一致的手段。这并不意味着实行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构成极权主义独有的特点的并不是实行广泛形式的恐怖活动，而是对生活各个领域的思想和行动实行全面控制。由于赫鲁晓夫的努力，近年来在这方面有进展，这就是调整极权主义一党统治和“自上而下”的全面社会控制，使之适应于已经发生变化的国内形势，从而允许一定程度的社会自发性和个人主动性的存在。

第三个特点是实行不仅包括经济领域而且也包括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全面计划。采取这样的计划，是实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需要，而实行这种社会变革则出诸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要求。从这个意义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只不过是走向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形态。唯一的问题是怎样实现“无阶级的社会”（撇开它的乌托邦性质），因为苏联新的党纲中采纳了“永存的党”这一论点，而把原来设想的共产主义不再存在着强制机构的基本思想作为教条予以摒弃。^① 从理论上讲，苏联的结构性社会变革要靠革命方法来实现。实际上，人们宁愿通过渐进的方法，而不是通过革命的方法来实现社会变革。把苏联的极权主义描绘成为“自上而下的持久革命”

^① 见迈斯纳：《苏联共产党党纲》106页。

并不完全正确，特别因为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一直鼓吹用渐进方法实现社会变革。

卢兹肯定是正确的，他不把极权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单纯看作是由党操纵和指引的一个过程而已。^① 但是他在批判“持久革命”理论(主要由理查德·洛温撒尔发展的)时走得太远了，因为这一理论并不排斥卢兹上述的看法。^② 对于这一理论能够说的一切，就是它过分强调了一个适应意识形态要求的过程的革命性质和随之而来的暴力性质。只要党具有控制自发的社会过程以及由这些过程产生的社会自发性的意志和力量，社会就将继续(尽管有时缓和一下)置于极权主义统治之下。这种说法决不意味着苏联社会的基本冲突——这是存在于党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同一个工业社会的发展需要之间的冲突——能够由此得到解决。在这方面，卢兹提到的“执行命令摇摆不定”的情况^③ 是衡量这种矛盾现状的重要标志。但是，如果认为一个极权主义政党仅仅由于不一贯地诉诸行政命令就会演变成为一个“专横”政党，那无疑将是错误的。^④ 这只有在党的独裁统治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党和国家最高层官员支配和决定社会政策的职能是建立

① 卢兹：《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大纲》18页及以下。

② 见西林(R·列文塔尔)，《资本主义的彼方》209页及以下，和《极权主义和民主革命》40页。

③ 见卢兹：《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大纲》19页。

④ 卢兹的进一步论点(见前引书21页)——布尔什维克制度在一个工业社会的条件下与其说趋向于极权组织，毋宁说更趋向于专横组织——可能讲得过头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制度往何处去的问题仍有待深入讨论。

在这样的基础上，即党的独裁统治不受限制以及国家由于占有一切土地和生产资料而对经济权力实行绝对的垄断。^① 最高层官僚集团行使的社会计划和社会控制职能是同“自上而下”的全面控制过程相联系的，是同受意识形态制约的社会计划过程相联系的。实际上，党的总机构就是这种最高层官僚集团的核心；它是极权统治的真正的发源地。正如我们在论述职员和知识分子时已经提到的，“权贵们”约有四十万。如果把官僚集团和军事部门的其余知识分子包括进去，权贵们约有七十万。拥有更大权力并不是使苏联权贵们不同于西方权贵们的唯一因素。实际上，苏联的情况同工业社会的杰出人物结构有所不同，因为它并不完全受经济合理化的制约，这种经济合理化是以才能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的标志。“提供生存和发展”（福斯托弗）这样的目标，或者满足社会的需要，对苏联的权贵们来说是次要的。首要的目的是巩固和扩大他们权力的基础。

由于苏联权贵们对权力的绝对垄断和对所有生产资料的不受限制的控制，他们处于这样的地位，可以畸形地把一大部分社会产品用于实现巩固、扩大权力基础的目的，同时并为其成员获取更高的个人收入。^② 这样，统治集团便从它对国家

^① 同民主组成的社会中的政党的决定截然相反，布尔什维克党的决定往往不需要官方审批，而是被视为必须执行的命令。

^② N·贝尔迪耶夫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坚持这点了。见《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1960年〔1937年初版〕安恩·阿伯英文版）128页。他说：“这个新的苏联官僚集团比沙皇制度下的更加强盛。它是一个可以无情地剥削广大群众的新的特权阶级。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着。”对官僚统治的率直的讨论，可以从优琴尼·什瓦茨在1940年写的讽刺剧《影子》中找到。又见季拉斯，前引书57、64、69、86页及以下。霍夫曼（前引书500页及以下）没有足够地考虑到下列事实，即

并进而对国家财产的控制中得到巨大的个人利益。如果把较大一部分社会产品用于经济投资和群众消费，统治集团就将丧失许多个人利益。^③ 这种通常的情况在“领导干部”内部，在权贵们和经济工作人员之间引起尖锐的利害冲突，后者愿意对经济方面的考虑给予更大的关注，希望巩固和扩大工业自治和“个人财产”。统治集团同拥有声望的杰出人物之间的利害冲突更加严重，后者试图通过对具有无上权威的国家施加限制来扩大个人自由的范围。

经济工作人员和大多数属于拥有声望的杰出人物的人在国家机关任职，这就使他们同时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然而他们比权贵们更接近于苏联其他社会阶层，权贵的核心人物具有明显的寄生性。^④

因此，我们认为在大部分权贵们同苏联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对抗性利害冲突的说法是正确的。就“从事创造性

在一个工业社会的条件下，经济权力主要依靠对财产的实际掌握，而不单依靠对财产的权利。不仅如此，历史上还有过其统治不是建立在生产手段私有制之上的权贵们。见 K·A·威特弗盖尔，《东方的专制政治》第 5 版（1964 年耶鲁大学出版社纽海温英文版）。还有，霍夫曼的反对意见（前引书 498 页），即苏联的领导统治集团只拥有代表权力，并不适用于官僚权贵们，因为党的机构是国家机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内起直接职能的国家机关和党组织的领导人员，都是国家的代表，这样他们便不只是凭代表权力施行控制了。全部权力和凌驾于政府与行政机构之上的一切权力机关，统统被掌握在权贵统治者内部的一小撮最上层人物手里。

③ 霍夫曼写道（前引书 505 页），“历史上的每一个社会统治集团都依靠组织的帮助，千方百计地使它的成员比没有这种组织的个别人获得较多的利益。”苏联权贵们的情况正是这样。霍夫曼为什么只提到“杰出人物”，这倒是难以理解的。

④ 见季拉斯，前引书 64、73 页。党的工作人员的寄生性质，近来曾为一些有胆量的苏联作家强调指出来。见塔西斯，前引书 39 页及以下。

活动的知识界”来说，冲突甚至更为尖锐，因为技术界知识分子似乎是构成最高层官僚集团的基础部分。这样，今日的苏联不仅在社会上分成阶层，而且按阶级界限分化了。

从社会学角度看，能不能把权贵统治者以及同它密切相联系的最高层官僚集团看作是一个“阶级”呢？我们把苏联社会说成“阶级社会”是否正确呢？这些问题只能根据阶级理论来作出回答，这一阶级理论要考虑到极权主义统治的特点和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情况变化。

苏联社会学家经常想到的马克思阶级理论并没有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① 而且由于马克思逝世，把“阶级”作为标题的《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第五十二章）没有写完，因而这一理论是不完全的。这一理论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不仅注意到所有制形式同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而且也注意到权力制度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给阶级下了一个定义：阶级是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集团，这些社会集团由共同的阶级地位意识以及通常同这种意识相联系的阶级利益所支配。划分阶级的关键性标准是：参与运用私有财产和由此产生的能够占有劳动果实并剥削劳动者的权力关系，还是被排斥在外。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必然导致利害关系相互冲突的各集团之间的自觉斗争，使现存社会结构发生革命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弱点主要在于这样的事实：政治

^① 见达伦道夫：《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阶级和阶级冲突》5页及以下。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批判，还见Th. 盖格尔：《搪瓷盆中的阶级社会》（1949年科隆—哈根德文版）。

统治并不仅仅是由财产关系造成的，而社会结构性变革并不仅仅是阶级冲突的结果。正如达伦道夫正确地指出过那样：从财产角度给政治权力下定义，等于用整体的一部分给整体下定义。^①

支配和处置生产资料的权利仅仅是权力的一个方面，这是一个并不一定同占有财产的法定权利相联系的过程。

列宁 1919 年发表的《伟大的创举》一文给阶级下的定义更切合实际。他说：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②

列宁比马克思更着重于从各个社会集团在一定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和等级来划分阶级。从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在继续实行政治统治的情况下，苏联也将存在着高低序列的社会集团，表现为社会的阶层分化。问题只是在于苏联是否存在着双重的或三重的阶级结构。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进行深刻的分析后，这一点比较清楚了；研究权力的性质是相对弄清社会阶级结构真相的可靠方法。达伦道夫遵循这一途径提出他自己的关于冲突和权力的理论。^③他认为，每个

① 见达伦道夫，前引书 139 页。

② 见中文版《列宁选集》第 4 卷上册第 10 页。

③ 见达伦道夫，《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阶级和阶级冲突》159 页及以下。

工业社会都存在着许多或多或少相互作用的政治利益集团。在每个工业社会的统治组织内部都存在着两个集团：(1)掌握权力的集团，它希望维持现存的权力结构因而希望维持现状；(2)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集团，它力求改变现存的权力结构。

因而对于达伦道夫来说，衡量阶级特征的关键性标志并非象马克思所说的，是拥有或者不拥有生产资料这种私人财产，而是置身于政治统治地位或者被排斥在政治统治地位之外。

由于已经体制化了的权力分配不均，达伦道夫认为每个社会都分裂为上述两个集团。

由于社会分为两个集团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社会作用，结果，代表着明显不同的基本利益(即具有自觉的目标)的两个阶级，总是相互对立着。^①

把这一理论应用于苏联，所有那些占据官方统治地位的人(不仅指权贵们，而且指整个知识界)便形成一个封闭的“统治阶级”，同广大的被统治群众相对立。这一结论简直不符合俄国复杂的社会实际。只有一起考察关于(政治)统治地位的理论 and 关于职能的理论，只有考察政治统治同领导地位的差别，才能抓住这一实际。有两种方法可以彻底弄清苏联的阶级结构。如果我们一开始不仅记住体制化的权力地位同社会领导地位的区别，而且承认人民被排斥在领导地位和统治地位之外的可能性，我们就能看到三重分的社会，从而能提

^① 见达伦道夫，《谈谈关于社会冲突的一种理论》，载《哈伯格经济和思想-政治年鉴》(1958年杜宾根德文版)84页及以下。

出一种三重的阶级结构。^① 就苏联这个例子来说,组成“统治阶级”的是那些占据政治权力职位的人,即那些没有同时占据社会领导地位的人(拥有社会领导地位的人组成现代工业社会的杰出人物结构)。这意味着属于“统治阶级”的只是权贵们中的大部分人而已。^② 另一方面,所有拥有真正领导地位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同时占有政治权力职位,则形成一个第二阶级,处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地位。^③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经济工作人员和拥有声望的杰出人物,可以划入这个第二阶级,它比权贵们更接近居民中的其他阶层。^④ 至于这里所说的其他阶层能否作为第三个阶级的组成部分,或者把城市无产阶级同农村无产阶级划开是否更为正确,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⑤

不可否认,在统治者和在其统治下的大多数人民之间,以及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张的社会关系。^⑥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紧张关系是非对抗性的。

① 在苏联占据真正统治地位的人都被命令为“政权的代表”。

② 季拉斯(前引书 58、62、68 页)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在他看来,“政治上的官僚集团”,即党的官僚集团及依靠于它的那些机构,组成一个“新的阶级”。他认为这个新的统治阶级的成立已经使党削弱。他写道(前引书 65 页):“党产生出阶级,但结果是这个阶级成长起来并把党当作基础来使用。这个阶级日益强大,而党则越来越衰弱;这是共产党的不可避免的命运。”

③ 官僚集团按狭义来说可以被视为统治阶级的,但不是每个政府主管人员的附属物(《谈谈关于社会冲突的一种理论》84 页及以下)。

④ 党员身份在这里并不是完全起决定性作用的。1958 年在七百五十万“专家”中,有二百三十万(百分之三十七)是党员;五百二十万(百分之六十九点三)是非党员。见迈斯纳,《赫鲁晓夫统治下的俄国》194 页。

⑤ 关于工人和农民无产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见鲍尔-英凯里斯-考克宏,前引书 189 页。

⑥ 见鲍尔-英凯里斯-考克宏,前引书 182 页。

根据阶级观点,把所有被统治者看作一个整体,将上述三重阶级结构修正成为二重阶级结构,这样的论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知识分子”中占有学术领导地位的主流阶层将扮演同权贵们相对立的反对派角色。^①

在最后分析极权统治条件下发生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时,知识分子是否被看作一个单独的阶级,或者它的上层集团是否被看作反对派,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论哪一种情况,都必须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努力推动同“非斯大林化”有关的改革的一股力量,这种改革的矛头部分地公开指向党的官僚集团——“统治阶级”的核心。可以肯定,“知识分子”必须扮演着相互冲突的角色,而这便妨碍它成为动力,去推动苏联社会进入极权主义以后的发展阶段。

由于所有这些人的特殊地位,他们在一个工业社会里主要发挥着领导作用而不是玩弄着权力,我们确实不能接受达伦道夫这种论点,认为起因于权力结构本身的社会冲突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根源。

谢尔斯基完全正确,他指出不应该把社会冲突理论说成是只是以政治统治关系为基础的权力冲突,从而在分析社会冲突时,把它看作似乎只是一种权力理论而已。^②

^① Th. 登格尔在他著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任务和地位》(1949年斯图嘉特德文版)中把知识分子描述成典型文化即智力文化和文明的精华的创造者和保卫者。苏联智力解放的过程表明,苏联知识分子,严格地讲,将逐渐被给予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杰出人物的身分。除了米哈依洛夫(前引书91页及以下)所讲的党的无限家长制以外,尚有抑制这一发展的范围极其狭窄的职业教育。

^② 见谢尔斯基,前引书262页。在达伦道夫看来,权力冲突是主要的社会冲突。他认为这不是社会变革的唯一渊源。

按照达伦道夫的观点，极权主义社会的权力冲突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革命使真正的社会变革有可能发生。这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是：潜在的相互冲突的集团有可能单独成立组织。^①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极权主义国家的整个结构就会瓦解。在这方面，他正确地强调指出这样的事实，统治者不断担心，党作为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它本身将会引起反抗和革命性的冲突。

达伦道夫的冲突理论，没有足够注意那些主要行使社会领导职能（而不是行使已经体制化的权力职能）的人物的力量 and 影响。他的理论漠视了思想和精神力量在引起社会变革中的作用。^② 这些因素通过渐进的方法，的确逐步削弱了独裁—极权主义的统治制度，从而有可能加速实现社会变革。

在这方面，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冲突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从社会领导地位角度来看待权力的成分。部队和许多政府官员尤其如此。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权贵们并非象通常认为的那样铁板一块。在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之间，以及在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之间是存在着摩擦的。^③

上面我们提到的都是一些具有独特性质的组织，它们对

① 达伦道夫，《谈谈关于社会冲突的一种理论》90页及以下。

② “马基雅维里式的”权力理论的所有代表人物（莫斯卡、巴列托、米歇尔等），并且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解释者，都照例不提这点。

③ 见培勒，前引书74页及以下。这一论断正为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冲突所证实。例如，可以想一下贝利亚的被枪决，马林科夫的被撤职，赫鲁晓夫和“反党”集团之间的交易，朱可夫元帅的下台，反赫鲁晓夫的“宫廷革命”，等等。作者在他著的《赫鲁晓夫统治下的俄国》一书中以及在《东欧》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和报告中，讲到了发生在权贵人物中间的这一切冲突。

党的影响较之苏维埃、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群众组织为大。^①

对苏联权贵们的调查研究将会对这些冲突的根源和性质提供可贵的材料，可是这种调查研究迄今尚未进行过。^②冲突之风正在苏联社会纵的方面各阶层之间和横的方面各阶级之间兴起，这种冲突将推动社会变革。^③各上层人物集团之间进行公开的竞争是民主社会的特点。极权主义社会不允许存在这种竞争。然而有证据说明在独裁—极权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着多元化的上层人物阶层。迄今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党，依靠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的控制方法，成功地不使阶级分裂，不使不同的社会集团和社会力量联合起来。但是，鉴于苏联社会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密，今后要做到这一点将困难得多。那些认为极权主义形式的党是俄国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并力求消除苏联阶级社会的剥削特征的人，他们的人数正在不断增长。

① 关于列宁和斯大林时代这些权力机构的发展情况，见B·迈斯纳，《转变中的俄国》（1961年法兰克福德文版）；又见他著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工具的苏联工会》，载《外国研究》杂志第2期（1953年达姆施塔特德文版）19—33页。

② 这里所说的调查研究主要是指对苏联权贵们的出身、履历、社交活动、人事关系等的调查。党的活动将受到特别重视。这些方面也会在对经济主管人员和有声望的上层人物进行的调查中予以考察。达伦道夫的一个学生最近曾对德国上层人物作过一番调查研究。见W·扎普夫，《德国上层人物的变化，1919—1961年德国领导集团的循环更迭》（1965年慕尼黑德文版）。关于对美国上层人物的调查研究，见F·杭特，《美国的最高级领导》（1959年查培希尔英文版）和C·W·米尔斯，《权贵们》（1956年纽约英文版）。

③ 在技术—经济方面和科学—文化方面的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米哈依洛夫（前引书101页及以后）甚至认为未来的苏联国内冲突将较少地指向党的官僚集团（它正越来越受到排挤），而更多地指向专家政治。这类冲突极可能发生在智能一级上而不是在物质一级上。要解决这类冲突，将需要一次“精神革命”形式的“第三次革命”，这将会促成俄国社会生活的更新。

三、小结和展望

苏联社会是两种深刻的社会革命的产物，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工业社会，必须同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难问题作斗争。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按照极权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阶级社会，社会关系高度紧张。现代俄国社会形势的特点是：进步的社会力量努力争取使苏联社会从党和极权主义国家的监护下解放出来，以便建立一个对内对外都更为开放的社会。

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和官僚知识分子之间进行。

权贵们连同依附于它的官僚分子，组成了“统治阶级”。这些权贵们内部也存在着冲突。

苏联上层阶层发生的冲突，主要是在最高层官僚集团、经济工作人员和有声望的杰出人物之间进行。中上阶层不那么全神贯注于这些冲突。在官僚集团中，斯大林分子那种因循守旧的阻力居于统治地位。如果在经济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和拥有声望的杰出人物中的“进步力量”取得优势，高层官僚分子不恢复斯大林主义就很难避免这种发展的后果。“技术界知识分子”中的“进步力量”是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努力争取更高层次的经济合理化，更加关注“物质利益”、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从事创造性活动的知识分子”中的进步力量是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反对社会不公正，要求抛弃过去的斯大林主义，维护人类尊严，争取更多的言论自由、科学客观性和

政治自由。

由于这种斗争的结果，在党的总机构同苏联上层阶层其他部分之间产生了一种潜伏着的冲突，前者是极权主义统治的真正的代表，后者则寻求更高程度的自治，分享更大的政治权力，以实现他们的特殊利益。

被统治者的惰性同那些争取变革的力量所施加的压力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的进步的变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问题在于，在缺乏深入的实地调查的情况下，要正确估计这些可变因素在一个“封闭”社会结构中的影响，是困难的。

宣称苏联正在发生社会变革，这是能够用文件加以证实的，但是它根本没有提及这种变革的方向。

这种变革并不一定包含着真正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象偏重以法治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所要求的那样。

把极权主义统治改造成较为人道的专横统治，象共产党革新派鼓吹的国家学说和社会学说所设想的那样，从苏联社会的观点来看，就应该算是一项巨大的进步了。

从俄国民族主义的力量来看，这样的发展是否将缩小东西方之间的裂缝，这仍然是非常捉摸不定的。

俄罗斯民族共产主义能够很容易地同法西斯主义的特性相适应。

苏联社会已经走到它发展的十字路口。即便它的发展方向暂时尚难确定，现在有一件事看来是肯定无疑的。俄国的前途将由这些集团来确定，它们今天在一个以工作成就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的结构内，正在作为一个拥有真正领导地位的阶层在发挥作用。

苏联的教育政策和社会结构

奥斯卡·安韦勒

教育政策同社会变革之间的紧密关系，在本世纪下半叶已表现得十分明显，但许多因循传统的欧洲国家在规划它们的学校制度和教育远景时，直至最近仍未认识这一点。通过对比，考察一下致力于革命性的社会变革而经历了迅速的社会经济改造的那些国家，我们看到：经济的、社会的和教育的政策这三个领域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紧密联系着的。

苏联尤其如此。那里认识到这三个政策领域之间的联系已有几十年了。由列宁提出并为斯大林采纳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体现了社会教育的革命目标；它也简洁地说明了主要的社会结构性变革的性质，这一变革，即俄国从一个基本农业国改造成工业国，成为二十世纪俄国历史的标志。

以下的考察就是根据经济、社会和教育政策之间的这种联系进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三个因素在俄国历史上总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者每个因素同另一个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变的关系。这里我们要探索的问题是确定教育政策在1917年革命后俄国的社会改造中曾起过怎样的作用，以及现在它在苏联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就本文所涉及的范围来说，我们将不考虑苏联教育政策的这些方面，如课程改革和教

育方法，或革命后出现的思想改造和苏联教育内容业经进行的改革。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隐藏在这些事情背后的下述社会学问题：苏联学校是怎样促进社会进步的？苏联人口怎样按照受教育的程度发生分化的？共产党领导对苏联社会的教育水平正在制订哪些计划？

为了更精确地分析教育政策的影响，有必要对下列疑问也作一番探讨：苏联是否真正存在着教育机会均等？城乡之间，以及地方城市、共和国首府和大城市之间十分巨大的差别，对青年在那些地区接受的教育发生怎样的影响？进入不同类型学校诸如寄宿学校或增加外语教学课程学校的学生，其社会背景是什么？苏联的十一年制中学毕业生从事何种职业？居住于苏联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人民，在他们的民族、教育机会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地位之间，是否存在着什么联系？考虑到直至三十年代苏联教师主要来自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一事实，今天苏联各级教育补充的教师来自哪些阶级？

一、从社会学角度对苏联教育的分析

想回答上述和诸如此类问题的企图，由于几乎完全不存在任何研究苏联教育的现代社会学而受到阻碍。二十年代的确出现过这种研究，但在斯大林时代却没有进行下去。^①

^① 直到 1931 年，关于学生的社会出身、宗教信仰、钻研对象以及收入和职位之间的关系的调查报告与统计资料才在期刊中出现。从当时教育被视为社会所决定的过程这一事实来说，上述调查是很平常的，不过它未能做出系统的理论总结。

直到1956年以后，随着非斯大林化的到来，苏联学者才寻求用“严格的社会学研究”以取代作为他们早先工作特征的教条主义；在此期间，开始零零落落地出现从社会学角度对苏联教育进行的研究。^①他们研究的主要是同劳动人民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家庭的结构和空闲时间的利用等有关的问题，这些都是在社会计划中起重要作用的事项。因此，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苏联将发展一种以经验主义研究方法为特点的关于教育的劳动社会学，并将最终赶上美国和西欧的学术水平。这种研究能够经受批判性检查的程度，归根到底并不取决于苏联社会科学家是否能在实际上收集和公布严格的社会学材料，这些材料将能满足对其可靠性所作的经验主义的核查。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确需要得到此类研究的结果，因为它对经济和社会计划具有实用价值。但是，公布那些不适合苏联社会发展计划的研究结果却受到严格限制；施加这些限制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为了党的利益。

只要此类公布的材料一直付之阙如，从事苏联教育的社会学研究的西方学者就会千方百计地设法找到其他可靠的情报来源。例如，其中有公布的苏联统计材料，从事其他学科的学者们的研究，西方观察家目击后提出的零星报告，最后但并

^① 见瑞纳·阿尔贝格，《苏联社会科学和经验主义的社会调查》，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3卷（1963年）679—694页。（从1966年完成这项研究以来，在苏联一些城市和乡村中进行的以经验主义调查为基础的，对当前教育方面社会学问题的探讨，便出现了。见M·N·鲁特凯维奇，《青年人的生活计划》，载俄文《社会学研究》杂志第2卷（1966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国民教育的社会学问题》，载《优琴尼·扎里斯基文集》第56卷（1967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又见M·扬诺维契和N·道奇，《社会阶级和教育，苏联的调研结果和反应》，载英文《比较教育评论》杂志，1968年248—267页）。

不是最不重要的，还有可供社会学分析的各种有关教育政策的官方报告。这种探索比试图着手在这个制度内进行教育学方面的实地调查更有价值，因为这一制度仍然很不愿意向外国人打开门户。^① 虽然上面提出的问题中有些已成为研究的项目，^② 但其中大多数仍未得到解答。因此，以下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教育政策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只能完全是一种尝试，尤其这里首次被讨论到的问题更是如此。然而，这种研究作为引玉之砖，作为考察俄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不是不受欢迎的。

二、1917 年后的苏联教育： 它的平等—民主时期和 无产阶级革命时期

俄国现代社会史中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旧俄的人口分成两端：顶端是薄薄一层受过高等教育者组成的上流社会，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欧化，底下则是大量的未受教育的平民。从教

^①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曾在苏联学习过几星期的七十来名英国学生和教师的一部集体著作。见 G·Z·F·伯里岱、W·W·波利克曼和 G·H·里德，《变革中的苏联学校》（1960 年坎布里奇英文版）。此书的撰写，只是根据对苏联开学的学校的零星观察，而不是根据对确凿的材料的系统分析。

^② 见奈里克·鲍埃彻尔，《苏联公开的教育方针》，载 R·达伦道夫和 H·D·奥特利伯，《现代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两种教育方针》（1959 年海德堡德文版）152—173 页；尼古拉·戴维特，《苏联的教育和就业》（1961 年华盛顿英文版）。（戴维特的书虽然主要讲教育系统的组织，但富于社会学方面的统计材料。）还见罗伯特 A·菲尔德梅瑟，《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社会地位和机会：美苏对比》，载英文《哈佛教育评论》杂志第 27 卷（1957 年）92—106 页；马克 G·菲尔德，《对苏联教育的若干社会学考察：为进修而进行的选择和训练》，载 G·Z·F·伯里岱和扎安·潘纳主编的《苏联教育政策》（1960 年纽约英文版）175—191 页。

育方面来看，这种两极分化是同普通小学和预科学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相一致的，只是在沙皇政权的最后年代这种巨大差别才略有缩小。这种情况一直盛行到革命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方式是受从彼得一世时起的国家官僚政治发展起来的社会等级所制约的。

然而不应忽视的是，自十九世纪末起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教育稳步走向民主化。由于俄国知识分子努力启发人民，开展成人教育，在乡村中分发大众文学作品，在此以前完全未受教育的俄国老百姓慢慢地得到解放。这种民主化趋势还表现在进入预科学校、普通中学、大学和高等技术学院的“下层阶级”的子女日益增多。^①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俄国着手执行一项受到国家支持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以后，出现了一些强大的力量，要求在职业训练方面采取新的形式，从而破坏了教育制度赖以建立起来的旧的阶级结构。由最后一位伟大的教育大臣伊格纳提耶夫伯爵拟定的一项广泛的1915—1916年学校改革计划是这一发展的顶点；该项计划规定了三级制的普通教育以及一项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体制，伊格纳提耶夫认为这一切是满足正在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国的现代需要所必需的。在旧俄，正式教育只是决定个人的社会等级的许多因素之一（贵族出身和拥有财产是更重要得多的因素），

^① 贵族出身的上男子预科学校的学生，从1863年注册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下降到1914年的百分之三十二，同时城市各阶级和农民出身的学生则相应地从百分之二十四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七。在普通中等学校里，这些集团之间的比例还要“民主些”。在1914年上大学的每百名学生中，三十六名是来自贵族和公务人员家庭，三十九名是来自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十四名是来自农村。见尼古拉·汉斯，《俄国教育政策史，1701—1917》（1931年伦敦英文版）239页。

这时它和职业训练开始迅速地取代传统的身份象征。正在发展中的俄国中产阶级设立了他们自己的学校；在那里特权不再同出身联系在一起，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正式权利。列宁把这一发展称之为“俄国实现普遍的和广泛的欧化过程中的一步”^①。

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其社会政治方面的冲击从两方面影响着教育。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初期实行的几项政策可以看做是上述民主化过程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和极端化的继续；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干预又一次侵犯了教育机会人人均等的民主原则。正如法国大革命期间孔多尔塞和累佩累提埃的宏大的教育计划中反映了民主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两种对立的模式一样，1917和1919年之间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发表的政治文告中也提供了平等—民主和无产阶级革命两种目标之间的鲜明的对照。1918年8月，实行了一项自由进入大学的政策，预科训练和社会出身已无足轻重。可是后来在为中学、技术学校和大学挑选学生时，却逐渐严格应用和有效掌握政治和社会标准。出于使大学以及九年制劳动学校实现无产阶级化（从社会的和党的这两方面政治意义上说）的明确目的，1919年设立了工人学院，这是一种专门的预科学院，其毕业生可以获得同其他学校毕业生一样的特权。^②

1917年，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文盲；这对于早期的苏维

① 《列宁论国民教育》（论文和演说），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21页。

② 见O·安韦勒和K·梅耶，《1917年以来的苏联教育政策》（文件和条例），1961年海德堡德文版。

埃教育当然是个严峻的问题。二十年以后，主要由于推行成人教育计划和1930年开始的四年义务教育，^①这一问题大部分已获解决。十九世纪开始的民主化过程，就每个人现在都必须至少具有读、写、算的基本知识这一意义说业已完成。可是苏联的负责人士完全知道，这些基本的教育成就，只能满足一个正在迅速工业化的社会在教育上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要培养人数众多的技术员、经济专家和科学家阶层，苏联必须作长时期的努力。

斯大林时代把实现这一努力作为中心目标，在转而讨论这种努力以前，我们将更仔细地考察一下二十年代教育政策的社会效果。用历史的观点进行观察，我们就可看到：苏联的学校制度远非象任何人会对共产主义教育政策预期的那样成为一种社会政治工具。尽管这一政策规定了种种限制和要求，高等院校学生的社会成分，从周密计划的阶级遴选过程的观点看，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表一表明了1926年12月1日最大的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种学校的社会成分；它显示各阶层劳动人民在这些学校里所占的百分比；从而反映了社会阶级在教育体系中的实际重要性。

^① 根据1939年1月17日的普查，九岁以上的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一·二，九到四十九岁的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九·一，能够读和写。见戴维特，前引书72页。

表一

%

学 校	工人	农业 工人	农民	职员	自由职 业者	手工 业者	无业 居民	其他
初级学校(四年)	8.4	1.7	78.9	5.5	0.5	2.4	0.9	1.7
七年制学校	35.3	—	25.8*	26.5	—	—	—	12.4**
中级学校(五年到九年)	13.6	—	30.7*	34.0	—	—	—	21.7**
职业学校	28.3	1.0	32.2	27.9	0.9	2.5	0.8	5.4
技术学校	20.8	0.9	33.6	34.7	0.9	2.5	0.7	5.9
工人学院	53.4	3.5	35.3	5.4	—	—	—	2.4
高等教育	23.7	1.6	24.7	39.3	4.6	3.0	0.7	2.4
劳动人民中各社会阶级 所占%(家属不包括在内)	17.0	***	64.4	12.3	0.4	3.8	0.9	1.2

资料来源：《国民教育》，1928年第12期72页及以下。

注：* 包括农业工人。

** 包括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和无业居民。

*** 缺准确数字，它可能被包括在农民或工人的总数内。

本表最引人注目的是职员和自由职业者两类的子女进入这些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数字大得不相称。此外，其他材料^①说明：随着年级的升高，工人阶级子女的数字大量下降，特别在小学的四年级以后；因此，被划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那些阶级在高等院校中占着绝对优势。^② 莫斯科的城市学校总管理处主任在提到中学学生的社会成分时说过：“革命十一年后，在我国的无产阶级的中心，中级学校主要仍是为

① 见 V·卡萨特金：《我们工人学龄儿童是受到怎样待遇的？》，载俄文《国民教育》杂志，1928年第10期26—36页；S·赫森和 N·汉斯：《苏联教育事业五十年》，1933年兰根萨查德文版80页及以下。

② 在第九学年，工人阶级子女的比例从百分之三十七点三下降到百分之十七点九，而职员子女在该学年的注册人数则从百分之三十一·八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四点二。卡萨特金，前引书。

中产阶级服务，这些学校必须无产阶级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了。”^①

出现同当时苏联政府的社会政治目标明显相矛盾的这种令人吃惊的情况，是有许多原因的。最重要的原因无疑在于苏联教育制度结构本身的缺陷。苏联领导人简直无法克服四年制小学校同高一级的中等教育学校数量悬殊所造成的教育制度上现存的不平等，这一情况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结束时仍普遍存在。^② 特别是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的教育机会相比，从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1926年，将近百分之八十二的人口住在农村地区，但在1927—1928学年，只有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四名儿童在八年级和九年级注册入学；与此相比，城市学校却有十一万四千四百零一名儿童在这两个年级注册入学。^③ 在城市里，正式规定城市工人的子女有权进入这些学校，但他们不能完全利用这个机会。收入不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因为产业工人实际上比教师或机关工作人员挣得多。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工人阶级对预科学校存在着传统的陌生感；他们的子女不会因预科学校改名为“统一工人学校”就被吸引到中学里来。另一方面，受过教育的旧阶级，连同其地位尚未完全为苏维埃政权所承认的职员，为了使他们的子女得到充分的教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借此就能为自己在

① M·阿列克辛斯基：《普通教育学校问题》，载俄文《教育通报》杂志，1928年5—6期第7页。

② 在1927—1928这一学年开始时，苏联有九百九十一万名儿童是一至四年级学生；一百三十三万二千名是五至七年级学生；只有十二万六千六百二十五名是八至九年级学生。见《苏联文化建设》，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122页。

③ 前引书123页。

苏维埃政权下处于劣势的社会地位取得补偿。只要到四年级以上的学校上学这种事情仍然是由父母决定，这些阶级的子女便会由于他们父母的明确目的而得到好处，而工人对于高等教育往往缺乏任何兴趣，直到他们年龄已大。

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将近结束时，各级学校未能按照共产党的期望，贯彻根据阶级出身招收学生的政策；因此，1928年在五年计划的体制内开展了使学校特别是大学和技术学校无产阶级化的第二次努力。党致力于培养由政治上可靠的“红色专家”组成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事业。正如以前在1919年时，革命的无产阶级曾企图借助工人学院改造大学的性质，党的领导人于1928年夏，开始采取了一整套旨在改变大学和技术学校的面貌的措施。新进入高等技术院校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起先达到入学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后来达到百分之七十；^①他们在其他高等院校和技术学校中的比例差不多一样地高。由于对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否能大大改变学生成员的社会成分存在着某些怀疑，大学和技术学校的入学要求也大大地降低了。^②

另一项重要措施是于1928年开始采取并逐渐实行到1931年的，把党员、工会会员和共青团员派到大学和技术学校去学习的政策；这批人支持大专院校中的政治积极分子，后者正在努力消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对者。通过这些努力，在工人学院学习的人数1929年达到七万人，1932年达到

^① 见中央委员会1928年7月12日和1929年11月16日决议，载德文《1917年以来的苏联教育政策》，文件46和49。

^② 见1929年7月26日苏共中央决议，载《苏共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第2版171页及以下。

三十三万九千人。^①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无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在高等教育中已占全体学生的一半以上，而在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院校中几乎占全体学生的三分之二。^② 从 1928 到 1938 年，全部高等教育机构中学生的社会成分经历了以下的变化(数字表示百分比)：

表 二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8
工人	25.4	30.3	35.2	46.4	58.0	50.3	47.9	45.0	33.9
农民	23.9	22.4	20.9	19.3	14.1	16.9	14.6	16.2	21.6
其他	50.7	47.3	43.9	34.3	27.9	32.8	37.5	38.8	44.5

资料来源：戴维特，《苏联的教育和就业》(1961 年华盛顿英文版) 655 页。

在采取这一切措施以后，俄国知识分子的性质彻底改变了。一个由技术和行政专家组成的新阶级——实际上这是苏联的半知识分子^③——出现了，而旧俄的知识分子，一个受过古典模式教育的阶级，开始消失了。这个新的“技术界知识分子”，相当大的一部分出身于工人阶级；可是有关这方面的官方统计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不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往往能够取得无产阶级身份证，他们借此获准入学。或许比这些措施的社会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共产党因此能建立起

① 戴维特，前引书 577 页。

② 见 A·V·科尔考夫，《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 期间苏联的文化建设》，1960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 158 页。关于一些大学的统计数字包括在内。

③ 我是使用里查德·派浦斯写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演化》一文中的说法。该文载于他所著的《俄国知识分子》一书(1961 年纽约英文版) 32—46 页。

一支在政治上忠诚于它的知识分子干部队伍；无论如何，在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过程中从大学和技术学校出来的那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党才获得上层官方人物的地位的。但是，作为这一切的代价，则是旧俄知识分子表现得非常特出的“批判性思考力”丧失殆尽；在斯大林领导下，知识分子这种批判性姿态丝毫没有幸存下去的机会，更不用说盛行起来的可能了。

三、在斯大林干部政策下的社会分化

俄国知识分子社会基础发生的这一改变，是国家干部政策的一项副产品。从1928年7月12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严厉批评培训工作同对具有一定资格的人员的需要严重脱节以来，干部培训已成为苏联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依靠一项系统的教育和集中分配工作计划，干部们被组织起来以满足苏联经济对受过训练的人员的需要。各种教育机构的目标、组织和学习课程，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劳动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我们有理由把整个教育制度看作生产和再生产熟练劳动力的手段，因为培养干部已成为1928年以后苏联教育政策的关键。

这里我们关心的是从社会学角度探索斯大林教育政策的影响。从1931到1940年期间，这些政策中具有特别意义的方面是：（一）整个学校制度的扩展和“稳定”；（二）1935年废除大学和技术学校入学的社会政治标准，大约五年以后在高等院校采用收费制；和（三）（1940年后）“动员”农村和城市

地区的青年，以便把他们培训成为劳动后备军。

经过初期的教育实验以后，苏联的学校制度到了1934年前后，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它将在未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继续被采用下去。四年制小学以及七年制和十年制中学等普通学校体制，必须为不同的职业类别提供训练，并把学生输送到政府指定的经济领域中去。这就是这些学校的主要目的，这一点在对这些学校的特殊职能进行更严密的考察时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后来发展为七年制学校的义务制小学的基础上，为下层的工人群众办起了职业学校和训练班。那些上学少于七年的人，结果不是当集体农庄的农民，就是当半熟练的产业工人；上过七年学的人则有资格得到当熟练工人或低级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然后是技术学校，它们的毕业生被安置在工业、农业、机关和公共教育等方面的各种中等职位上。十年制中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进入大学或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必要条件。^①高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是在那些按规定属于新的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之列的。

自三十年代中期起，总的来说，存在着一种相当清楚和明显的倾向：各类教育机构严格根据人们所受的训练和教育来安排他们的职业。以前有关遴选和安排职位的标准，如一个人的农民或无产阶级出身或政治上的忠实，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从讲究社会的和党的政治标准到注重学历和专业才能的这个大转变，在1935年12月通过的大学和高等技术学校新的入学条件中表现出来。现在进入这些学校全凭一次考试的

^① 工人大学在1940年停办，而在那时前后夜校也很少。

结果，不再依据社会出身了。对优秀的中学毕业生授与金质和银质奖章并特许他们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这明显地突出了智力和知识的重要性。^①

上述措施本身作为改进高校学生学术质量的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40年9月1日实行的关于中学(八至十年级)、技术学校和大学入学办法的改革，^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改革的意图是为了根据社会政治路线限制入学还是为了尽量增加后备劳动力？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澄清。^③即使我们无意把这些直到1956年仍然有效的规定看作明显的证据，表明正在有意识地计划造就一个新的苏联上层阶级，但收费入学这一项却意味着今后家庭收入的大小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谁可以进入较高学府学习，并使人联想到1918年的平等原则已被废弃，并同社会主义平等观念实行坚决的决裂了。

重新强调以学术能力作为继续接受正式教育的根据，这对知识分子的子女是有利的，因为他们的家庭里存在着知识分子的氛氘和对教育成就的尊重。具有同样意义的是1940年10月2日(入学收费生效的同一天)颁布的关于劳动后备军的法令，^④它把大量的青年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限制在物质生产领域内。逐步“动员”了大约八十万到一百万年龄在十四

① 见1935年12月29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大学和技校入学政策”的命令，载《苏共和苏联政府关于国民教育的法令和决议，1917—1947年文件汇编》第2卷(194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89页，和1944年6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改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措施”的实行程序，载《1917年以来的苏联教育政策》，文件91。

② 《1917年以来的苏联教育政策》文件83。

③ 比较戴维特，前引书64页及以下。

④ 《1917年以来的苏联教育政策》，文件82和附注。

岁到十七岁的男青年，把他们作为一支劳动后备军送到各种职业“劳动后备学校”去接受训练。训练完毕后，命令他们至少留在指定的岗位上工作四年。

斯大林领导下的教育政策同早期苏联教育的平等—民主时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大相径庭，它倾向于巩固正在出现的业已发生分化的社会等级，这种社会等级部分地是由教育制度发展起来的。农民和工人靠着他们受到的正式教育还是能象以前一样上升为知识分子，但在政府停止实行按社会政治条件正式招收工农子女的政策后，这要困难得多了。尽管在农村地区设立了中学，在农村的教育质量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的情况下，真正的教育均等的机会是不可能存在的。今天苏联的情况仍然如此。^① 即使在城市，如前所述，也是上层社会阶层的子女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非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开始于三十年代末期，作为这个过程标志是苏联从1938年起不再公布关于学生社会成分的统计。1958年赫鲁晓夫谈到莫斯科高等院校中“显然不正常的情况”时说：只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学生是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的子女，而大多数学生出身于知识分子或职员的家庭。他还说：“我没有必要指出，中止了劳动生活去当一个正规学生的工人和农民简直是屈指可数。”^②

^① 在1958年，一到十年级的全体学生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二是在城市学校里，百分之五十三点八则是在乡村学校里。然而，在高年级（八到十年级）中，百分之五十五点九是在城市学校里，百分之四十四点一则是在乡村学校里。见戴维特：前引书 142 页。

^② 1958年9月21日“关于加强学校和生活之间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农村公共教育制度”的备忘录，载《1917年以来的苏联教育政策》，文件 102。（俄文原件载《真理报》1958年3月21日）

四、苏联全体居民的教育水平和社会结构

苏联扫除了文盲，规定了最低教育标准，结果却使它的全体居民在所受的教育上高低迥异。苏联人对教育等级作如下的区分：

1. 不完全中等教育：学制七年；实行 1958 年的法令后改为八年。

2. 完全中等教育：学制十年；1964 年后改为十一年。

3. 中等专业教育：学完技术学校或某种中等职业学校全部课程。

4. 高等教育：学完大学或高等技术学校全部课程。^①

除此以外，还有低级职业学校——在不完全中学之后——和成人教育方案，接受这两种教育的学生都没有资格继续接受更高级的教育。

1959 年 1 月的调查首次提供了关于苏联居民教育情况的精确数字（见表三）。^②

根据表三数字，1959 年仅仅近一半的苏联成人进过四年以上的学校；百分之四十左右至少受过七年教育，百分之十六至少受过十年教育，百分之二点五受完高等教育。^③

① 按照盎格鲁-撒克逊语，1—2 组相当于初等和中等学校，3 组相当于中等专科或半职业学校，4 组相当于学院和大学。

② 对照戴维特，前引书 439 页及以下。

③ 当苏联认为把这些数字同美国数字（1959 年）相对比会有利时，苏联便这样做了。在美国，十四岁以上的一亿二千二百八十万居民中有百分之七十九点八至少上过七年学，百分之四十一.三是在高等学校（十二年）、学院或大学毕业，百分之六点八至少受过四年大学教育。见戴维特，前引书 440 页。

表三

15岁以上的居民	(万人) 14,818.6	(%) 100.0
教育程度		
受过四年或四年以下教育的	7,697.8	51.7
受过七年以下教育的	1,250.0	8.4
受过不完全(七到九年)中等教育的	3,538.6	23.9
受过十年普通教育的	993.6	
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	787.0	
受过完全中等教育的总人数	1,780.6	12.0
受过不完全高等教育的	173.8	1.5
受过完全高等教育的	377.8	2.5

资料来源：《1959年苏联国民经济》(1960年莫斯科俄文版)21页。

这次调查还透露：城乡居民间的教育差别仍是巨大的。同1939年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三十一左右，农村地区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左右。大约每五名农村居民中有一人至少受过七年教育，而城市居民每三人中就有一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男女在受教育的程度上比较平等，并有大量的妇女受过高等教育。妇女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占百分之四十九；在受过中等专业训练的人中实际占百分之五十六点六，这一点主要归功于大量妇女参加了教育和医务工作。

各加盟共和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也是令人感兴趣的。苏联每一千人中平均有十八人受过高等教育。大大超过这个平均数的有：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每一千名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三十八人，亚美尼亚二十八人，阿塞拜疆二十一人，拉脱维亚二十一人，爱沙尼亚二十一人，远远低于

苏联平均数的有：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十人，塔吉克十人，哈萨克十二人，白俄罗斯十二人。这里，不同的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影响看来是十分明显的。

要确定各社会阶级内部的教育程度更困难得多。苏联统计没有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分类，这多半是由于苏联关于社会阶层划分的理论是以只存在工人、农民和职员三大社会范畴为前提的；这使苏联理论家被要求来划分和确定各社会集团，特别是知识分子内部各集团时，遇到了困难。^① 苏联统计在这点上也不是很有用的。

表四同样是以 1959 年的调查为根据的。在我们持有上

表 四

单位：每千人中的人数

	高等教育(完全的)和中等专业教育	普通中等教育	不完全中等教育	小学或七年以下教育
城市人口				
工人	17	49	209	290
职员	286	128	190	132
集体农庄农民	32	92	190	222
农村人口				
工人	7	21	154	279
职员	251	77	176	129
集体农庄农民	5	15	124	242
农村和城市人口				
工人	14	39	190	286
职员	276	114	186	131
集体农庄农民	7	19	127	241

资料来源：《1959 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汇编本）（1962 年莫斯科俄文版）111 页。

^① 见 L·拉贝兹：《苏联知识分子的构成》，载理查德·派浦斯主编的前引书 63—79 页。

述保留看法的情况下，表四向我们显示了各个社会阶级和职业集团的一般教育程度。

表四说明全部人口的情况。另一方面，表五则揭示了就业人口的教育程度。

表五

单位：每千人中的人数

	高等教育(完全的)和专业教育	普通中等教育	不完全中等教育	小学或七年以下的教育
城市人口				
工人	24	71	329	408
职员	491	151	256	88
集体农庄农民	19	30	192	357
农村人口				
工人	12	35	264	435
职员	487	127	265	104
集体农庄农民	9	23	194	355
农村和城市人口				
工人	20	59	307	418
职员	490	145	258	92
集体农庄农民	9	23	194	355

资料来源：《1959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15页。

表六提供在各产业特定部门工作、受过专业训练的那些人的教育状况。这些表并不区分是从事非体力劳动人员还是体力劳动人员，或者是行政人员还是管理人员；然而表七关于从事体力劳动人员和非体力劳动人员的教育程度的材料，为我们洞察苏联的社会结构以及苏联社会本身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①

^① 这些集团的区分，在许多情况下，是任意做出的。例如，怎样把店员或试验室助理员加以划分呢？关于这次调查中划分阶级的依据的报告，见《1959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11页。

表六

单位：每千名在业人员中的人数

	高等教育	中等专业教育和没有学完的高等教育	普通中等教育(包括不完全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和七年以下的教育
整个国民经济	33	76	324	331
工业	20	63	426	364
建筑业	30	63	378	405
农业	3	15	226	359
运输业	13	63	415	380
商业和公共供应部门	16	87	467	278
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门	108	309	242	197
教育	213	350	217	114
科学(包括辅助机构)	213	163	346	201
艺术	81	135	517	206
行政	130	153	456	177
党、共青团、工会、合作社和其他社会团体	152	242	426	107

资料来源：《1959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123页及以下。

表七

单位：万人

	1939	1959
在业人员总数	7,880	9,910
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6,500(=82.5%)	7,860(=79.3%)
主要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	1,380(=17.5%)	2,050(=20.7%)

资料来源：《1959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130页。

表八

单位：每千名在业人员中的人数

	1939	1959
在业人员总数	123	433
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43	316
产业部门		
冶金	176	535
化学	113	514
铁路	71	408
纺织	60	478
采矿	55	407
建筑	30	318
农业	13	220
主要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	498	884
科学家、教师和教育人员	892	991
作家、记者和出版人员	818	989
司法人员	684	987
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	674	969
艺术家	644	894
工程师和技术员	630	910
农学家、兽医和林业专家	622	936
经济专家、会计员和有关人员	515	900
政府、党、共青团、工会和其 他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员	359	908
工业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	285	853

资料来源：《1959年全苏人口调查总结》177页。

表八提供各产业部门每千名在业人员中至少受过七年教育的人数。

上列各表清楚地显示了两种现时的平行的趋势：

(一) 从四十年代实行人人必须接受七年义务学校教育以来，在工业和农业中工作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的一般教育水平不断提高。1959年，每千名体力劳动者中有三百零二人曾上过七至十年学，可是只有十四人升学进入技术学校或高等院校。即使共产党未曾有意识地要消除学历方面的不平等并且按照党的正式路线把“劳动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这些成绩也不是惊人的。

(二) 上列材料同样清楚地表明：主要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所受的教育明显提高了。属于这一类别的人员，每千名中有四百七十六人受过高等教育或中等专业教育(体力劳动者中是十四人)，而另外四百零八人受过七至十年的普通教育。专业训练作为取得知识分子身份条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实行一项真正均等的教育政策(1958年以来一直在试行中)所遇到的困难也是同样明显的。

五、从社会学角度看赫鲁晓夫的教育改革

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经过两年左右的深思熟虑，于1958年开始了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促使他们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出于社会政治上的考虑。^① 我们曾经指出：在斯大林的干

^① 见作者写的《苏联教育事业的改革》，载德文《东欧》杂志第9卷(1959年)128—143页，和《苏联学校改革的成效》，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1卷(1961年)285—301页。

部政策实行了二十年以后，新的上层阶级同工农群众之间的社会差别扩大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苏联专家要具有较高的学历，以保证他们取得苏联知识分子的身份。越来越多地从知识分子中招收大学生这种事实，加强了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趋势。赫鲁晓夫无疑把这点看作实现他的“向共产主义过渡”、拉平苏联社会的计划的主要障碍。他尖锐地批评了：把教育纯粹作为进身之阶、关于入学考试的主张和新的上层阶级的优越感。这些批评揭露了苏联教育制度的要害，用共产主义关于一个平等的社会的理想来衡量时，更是如此。

按照均等路线重新制订共产主义教育政策（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这主要是由于中学毕业生人数同大学招生人数之间越来越大的悬殊，造成了尖锐的经济和劳动问题所引起的；出现这种悬殊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青年不愿参加劳动。直到大约1952年，几乎全部十年制学校毕业生都指望能升学，可是四年后中学毕业生同苏联高校新生之比是五比一。1958年赫鲁晓夫宣布：仅在1954年和1957年之间就有大约二百五十万中学毕业生未能被高等院校或中等专业学校录取入学。他说：“这些学生拿到文凭后，大多数人没有走向生活的准备，他们愿意从事哪种职业也茫无头绪。”^①

根据1958年12月24日的法律和第二年苏联政府颁布的许多法令实行的教育改革，^②具有两个方面的社会学意义：

（一）这一改革力图把全体居民的一般教育程度提到甚

^① <1917年以来的苏联教育政策>，文件102。

^② 除了上页注中引用的我的文章以外，可对照安纳德·布希兹兹所著《苏联教育和科学的新路》（1963年科隆德文版）一书。

至比过去还要高的高度，以便缩小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在教育上的差距。

(二) 除智育成绩外，在挑选新一代学生进行培养时重新采用社会标准。

前面引用的苏联的调查材料显示：苏联的成年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四十受过七年以上的教育。因此，赫鲁晓夫的教育改革，以及1961年苏共纲领中提到的长期改革，计划提高全体居民的一般教育程度，并分成两个阶段予以贯彻：从1963—1964学年开始，所有学龄儿童必须接受八年义务教育(可是这项计划在所有学区中都没有完成)；到1970年这些儿童应该在日校和夜校中接受十一年义务教育。与此相平行，根据党纲也是到1970年，“那些提早在国民经济中就业因而未能接受相应教育的青年将受完八年教育，到下一个十年每个人都将得到机会接受完全的中等教育。”^①

因此可以期望：通过延长青年接受正式教育的年限，以及实行普通性质和职业性质的成人教育计划，全体居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将会提高。根据上述所有小于十八岁的青年必须接受十一年义务教育的规定，预期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人数，将从1960年的三千六百六十万增加到1970年的六千万左右。这一切在学校建设和师范教育方面意味着什么，当然是一目了然的。这些目标为1966年的第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所肯定。

宣布努力提高劳动人民教育程度一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

^① 《真理报》，1961年11月2日。

义,虽然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要困难得多。苏联学者从社会学方面进行的研究表明,工人的教育水平同生产量是息息相关的;这些研究还详细说明了提高工人教育程度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①1957到1959年间,在乌拉尔地区几个工业部门所作的调查表明:虽然受过较长时间学校教育的工人在数量上正在不断增加,但他们在适应这些工厂业已采用的新工艺时仍然困难重重。这是由于他们一般缺乏基础知识,和技术训练水平不够。事情这样明摆着:如果苏联的技术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使人民受到完整的基础教育、补充的技术训练,给他们传授职业技能,使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这样才可望达到上述目的。

为此,苏联教育计划规定设立夜校和函授学校。在成人教育方面,夜中学、技术学校的函授班或夜校班,以及大学的类似课程具有三方面的主要作用:第一,很大一部分劳动人民仍然没有达到八年教育的最低要求,更不用说到1980年把这最低要求提高到十或十一年的设想了;在这部分居民中实现这个目标的长期任务分配给了夜校和函授学校。第二,这些学校有助于保证职业上的知识和技能将跟上苏联社会日新月异的要求。实际上这是国家把开设这类学校的计划放到第一位的主要原因。这些学校的第三个作用只是让人民有机会在职业训练的需要之上接受文科教育,或者在一个他们愿意钻

^① 见 M·T·尤甫楚克,《苏联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的增长》,载俄文《哲学问题》杂志,1960年7期34—49页。(与此同一书名的,有尤甫楚克等主编的集体著作,其中详细地介绍了调查研究的结果)。又见《技术进步的社会-经济问题》(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技术进步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劳动问题》(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

研的专门领域继续深造，在这里教育本身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目的——一种享乐——而不仅作为提高国家工业能力的一种手段。这方面，由诸如“文化大学”这类社会机构执行的各种普及教育计划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①

因此，如果苏联的教育虽然首先是为国民经济服务而开设的，但同时允许人们沉湎于为学习而学习，那末教育政策制订者无论如何必须考虑一个发展着的社会的影响，这个社会的成员由于得到更多的个人自由，未必会把他们的自由仅仅看作提高生产率的手段。然而，借助于象以斯特鲁米林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所鼓舞的对未来共产主义文化的想象，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样的发展是可能的。斯特鲁米林对世界长远的看法中包括这样的观点：每天最多不过工作四小时，从而使每个人都有闲暇来计划自己的生活，以求得人们个性的全面发展。^②

共产党领导人期望旨在提高工农文化-技术水平的这些努力，将消除目前存在于苏联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之间的差别。尽管苏联的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拒不承认社会阶级的存在，苏联各个社会集团在生活条件上的巨大差别是显而易见的。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那些受过大学训练、从事统治和管理社会的专业的集团同那些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和担任普通行政职务的集团之间存在着教育上的差距。

① 哈特穆·沃格特，〈苏联的成人教育〉，载〈德国国民高等学校柏林工人周报〉第19期（1963年）1—56页。

② 见S·G·斯特鲁米林，〈苏联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问题〉（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369—396页。

有人认为，根源于过去资本主义的这种两面性即使不能完全消除，也能减少到最低限度。关于这个问题有过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工人和农民开始必须按技术员的要求进行训练，最后要具有担任工程师和其他高级技术职位的资格”^①。他们认为通过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普通教育计划和职业性的深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第二种观点认为，在一项把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结合起来的制度下，将产生一种新型的所谓“工人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现代工业社会对知识分子日益增长的需要也将得到满足。于是由教育程度悬殊所造成的社会差别将逐渐消失，此后人们就只存在着在社会中担任必要的和专门的职务的区别。

关于马克思和他的俄国信徒们所了解的、以及上述评论提出的“无阶级社会”的性质和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让我们把注意力转而集中到苏联制度的某些现实问题和新近的教育改革所发生的社会学影响上，这些教育改革是同我们已注意到的存在于现代教育政策中的平等主义思想和培养杰出人物倾向之间的对立有关。我们可以这样描绘苏联的窘境：它的教育政策的方向是实现无阶级社会的理想，但是这种教育政策同时又受到计划经济迫切需要的制约。这两方面目标的冲突，是导致自1958年颁布教育改革法律以来实行的许多改革中产生种种矛盾的根源。

这里涉及三个复杂的问题：大学招生政策、各种专门学校

^① M·T·尤甫楚克：《工人文化-技术水平不断高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载《技术进步的社会-经济问题》（1961年莫斯科俄文版）194页。

的任务和苏联教育的综合作用。我们仔细地逐个研究这些问题。

从1935年到1954年的二十年间，智力是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唯一标准，根据这一点，十年制学校毕业生中的金质奖章和银质奖章获得者，以及技术学校毕业生中的尖子，可以免试入学。1955年起，招生政策逐步改变。^①一方面，优等生即学习中获高分数的入学申请人不再被优先录取，而且几乎完全不加考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从1957年起，具有两年工作经验的人进大学可以得到照顾。^②从1957年到1961年，进入高校的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人数，从占入学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八猛增至百分之六十。^③1959年实行了新的改革：工厂、集体农庄和国家行政部门可以选派有工作经验的人到大学学习。^④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深造的申请人必需持有党、工会、共青团的，或工厂、集体农庄负责人的肯定的介绍信。

显然，在大学招生条件中引进社会标准（工作经验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不断提高偏重实用课程的职业夜校和函授学习的重要性^⑤，其目的都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生的、从而

① 见戴维特，前引书 248—251 页。

② 见 1958 年 6 月 4 日《真理报》刊登的关于新的大学入学标准的通知，载《1917 年以来的苏联教育政策》，文件 101。

③ 《1961 年苏联统计数字》（1962 年莫斯科俄文版）324 页。

④ 1959 年 9 月 18 日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载《苏联中等专业教育》（1962 年莫斯科俄文版）218 页及以下。

⑤ 在 1961—1962 这一学年，苏联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有百分之五十四点五，受中等专业教育的学生有百分之四十九点二，都在读夜校班或函授班，他们大多数在本行内或经受训练的专门领域内继续深造。

是下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成分。在普通中学的高年级中实行多种工艺教育和职业训练具有同样的目的。每一名未来的专家都将是这样一个人，他从扶梯的底层开始，作为一个工人不断地攀登，以达到他自己职业的顶点。赫鲁晓夫说：“一个边劳动边上学的青年人，将更有能力在社会上取得他的地位。”^①他喋喋不休地强调必须克服存在于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疏远状态。人们希望，学生们（其中有知识分子的子女）在义务劳动期间将在社会上找到当工人、农民或者职员的位置，并通过这样的体验获得“工人的觉悟”，这种觉悟将在随后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可是这些期望能否实现是大有问题的。虽然直到1965年才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学生经历了一段义务工作时期，但上层社会的子女有许多办法来逃避这项规定；例如，他们能容易地搞到一张关于他们有劳动经验的正式证明。这些学生由于他们的家庭能提供保证和物质支持而占了便宜，能更容易地逃避边劳动边学习的经历而进入大学。而那些社会地位妨碍他们接受进一步教育的学生，为了能进入高校深造，常常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新的规定为挑选新一代大学生设置了严格的遴选手续，但这种控制能否用“重新无产阶级化”的办法在实际上改变全体居民的社会特性，却还是有疑问的。自1964年赫鲁晓夫被解职以来的事态发展和随后对他的大部分教育改革所作的修正，证实了我们的怀疑。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讨论了各种高等院校招生政策的社

^① 《1917年以来的苏联教育政策》，文件102。

会影响。但赫鲁晓夫如此热心地为之战斗的这些政策主要是为国家的经济目标服务的，这是毫无疑问的。1958年的教育改革，目的是使教育制度同经济要求紧密地联系起来以改进劳动政策。例如，普通中学不把原来建议的广泛的多种工艺训练，而把专门化的职业训练列入课程，这是出于要减少被积压起来的要求升学的申请者数量的需要，也是出于要有组织地把学生转送到工业和农业中去的需要。

1960年和1965年之间实行的教育政策，通过把青年输送到需要他们的工作和生产领域（特别是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农业），力图对工作分配施加更严密的控制。这样，个人选择学习领域的自由进一步受到了限制，而先前主要是通过控制职业学校、技术学校和大学的招生名额来施加限制的。可是，正如一些苏联报纸和贸易杂志的报道指出的，职业方向的确和职业指导落后于经济计划人员的期望。只有较少的中学毕业生实际上从事他们曾按边劳动边学习计划受过训练的职业；大多数中学毕业生都想从事更为合意的其他职业。

这些教育政策实际上阻止大量的苏联青年，特别是居住在农村地区的青年，直接进入高校学习。强调夜校班和函授班是“达到高等教育的主要途径”，这一方面对已经就业的人获得进一步的训练从而在专业上有更大的提高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特别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训练并没有为他们继续学习一直达到大学程度提供足够的基础。

我们已讨论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平等主义目标和苏联社会的相反倾向之间的冲突；这些倾向表现为上层阶层获得了权势的地位。这种情况起因于科学、技术和日益复杂化的经济

迫切需要很高资历的人员；结果，教育政策不得不转向选拔和招收有才能的人。苏联正是在这里陷入了窘境：实行以能力为基础而不是从政治考虑的“杰出人物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可是又是同平等主义思想相冲突的。

二十年代以来，苏联教育政策一直认识到对在艺术上有才能的孩子——尤其是那些童年就被鼓励进美术、音乐和舞蹈学校的孩子——的特殊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设了一些专门的学校以接纳军官们的孩子（苏沃洛夫学校和拿希莫夫学校）。一个人只要进入这类学校中的任何一所，通常就能保证获得苏联上层阶层的身份。当1958年对教育改革展开讨论时，许多社会集团，特别是科学家们，强调了为那些表现出数学和科学才能的孩子们设立专门学校的重要性；赫鲁晓夫以及党中央委员会也承认设立这种学校是正当的。可是1958年12月24日颁布的教育改革条例没有明白提到这类学校，因为思想上产生了怀疑，这样或许会破坏统一的学校制度。

可是，在以后几年中，除了中、小学生的课外活动组织外，又为青年人设立了所谓“数学学校”，在自愿的基础上给予补充辅导，^①并开办住读的专门物理中学和数学中学，其中四所一直办到1963年底（最著名的一所系由科学院诺沃西比尔斯克分院创办的）。苏联的科学家们显然已成功地使党和国家领导人确信：对有才能青年的培训，虽然减少了学生可以化在边劳动边学习计划上的时间，但是为了培养需要有高度理论

^① 见优琴尼·伦伯格：《苏联教育事业中天才的挑选和培养》，载《关于学校的法律和经济》第2卷（1961年）65—69页。

修养的未来科学家，这还是必要的。

1957年以后出现了类似的、增加外语课程的学校，虽然挑选学生的条件不象上述学校那么高；到1965年竟达七百所左右。^①这类学校从二年级开始就对学生集中讲授一种现代语言，其目的是为了有系统地培养能够使用一种外语的苏联知识分子阶层。由于苏联是一个世界大国，从事外交、国际贸易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业务人员比过去在更大的程度上更需要掌握至少一国外语。这些高等语言学校为其学生取得苏联上层阶层身分打开了大门，这是很清楚的。政府似乎承认语言学习同社会地位有关，它准许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中讲授外语，但家长必须为此支付费用。这样，在苏联教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上实行了自愿付费的原则。

由于上述经济上的原因，共产党显然乐意冒这个风险，即便这些特权会导致上层人物阶层的出现。因为毫无疑问，这些教育改革有助于苏联上层阶层保持同他们的学历有关的优越地位。并非所有被家长送进“较好”学校的孩子都比普通学校里的孩子天赋更高。但上层阶层的孩子有着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他们的家长对教育的意义有更深的体会，并且自己就是知识分子的一员。^②

同上述改革成为有趣的对照的是：在1956年办起了寄宿学校，其目的并非为了在招生方面进行挑选。1965年，这类

^① 见伯恩哈德·斯契夫：《苏联的外语教学》，载德文《东欧》杂志第13卷（1963年）810—817页。1961年5月27日苏联部长会议命令全文见1961年6月4日《真理报》。

^② 从社会学观点，对这类学校中的学生所作的分析，证实曾参观过这些教育机构的许多人的印象，即它们乃是城市知识分子开设的“上层阶层的学校”。

学校的学生总数几乎达一百万名。^① 这类学校以前是同社会收容所和孤儿院联系在一起的，招收穷孩子的那些学校更是如此。一些高质量的寄宿学校之所以存在，固然是为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一些特殊目的服务的，然而大多数却是为了作为发达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集体化教育的样板，其作用同业已迅速发展的、新的合为一体的“学龄前儿童机构”（托儿所和幼儿园）非常相象。1961年的党纲提到：“在今后几年中，对学龄前儿童设施的需要将完全得到满足”和“到1980年将有可能使所有家庭，只要愿意的话，把他们的子女在整个少年时期免费安置在这类学校里。”1962年的非官方数字估计：到1980年，在这类学龄前机构中的儿童将有四千万名左右；在寄宿学校和时间延长的走读学校中的学生将有五千五百万到六千万名，这几乎占十八岁以下的全部学龄少年的百分之八十。^②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情况表明，这些计划是相当乌托邦式的，不得不加以削减。

共产党领导人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心目中首先关心的是教育制度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化的长期目标，不应低估这一目标作为一种手段以消除苏联教育中存在的分化现象的意义。重要的是在这一点上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学校在培养一种超越一切社会和教育差别的公民意识方面起着重要的综合

① 1961年透露寄宿学校学生人数不再象原先计划的那样要在1965年达到二百五十万，从这一年起，苏联统计便将寄宿学校和各类日校的学生人数合并在一起了。

② A·M·阿森耶夫，〈改造苏联学校的当前任务同建立苏联共产主义国民教育体系的远景是一致的〉，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科学院报告〉（1962年）第1期5—11页。

性的作用。在一切现代民主社会中，学校都起着这样的作用，但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党的领导人坚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向青年灌输：他们生活在一个处于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过程中的单一的、非对抗性的社会中，通过这种灌输把青年的注意力从政治冲突和权力这些迫切问题转移开去。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学校中灌输社会和协这种意识形态决非徒劳无获的；但这一方面的期望并没有完全实现。意识和存在之间的不一致，以及马克思提到过的意识形态的掩盖现实的作用，同样适用于苏联社会。

六、现代社会的教育在苏联的变种

我们的讨论已经表明：在苏联教育政策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主义的社会思想、苏联政府的经济目标和教育政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要了解这一研究结果在目前和将来的意义，我们必须看到：苏联尽管具有它独有的特征，却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变种，在本世纪的下半叶显示了西方国家共同的一些特征。

特征之一就是教育的民主化。全体公民，不问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在接受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后，都有升学的机会。可是苏联的教育仍然没有完全民主化，因为低等教育范围以外的教育机会均等还没有完全实现，其障碍与在某些西欧国家中所看到的不同。撇开象农村青年所面临的其它性质的不利条件，造成这种障碍的乃是官方的教育政策本身。

重要的是应对苏联近代教育政策的两面都进行考察。一

方面是作出了努力,建立广泛的可供选择的各种学校,例如各种夜校班和函授班(比在斯大林领导下所作的努力要大得多);但另一方面,为了各种实用的目的,教育制度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工具,在这方面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志愿。机会人人均等的民主教育观同国家对教育渠道的控制之间的对立,是苏联制度所固有的。换言之,在苏联接受高一级教育的面要比在西德广得多;但选择个人喜爱的学习领域的可能性所受到的限制也大得多。教育计划化的想法(不仅限于规划未来的需要和费用的意义上)正在西方各民主国家中抬头,对我们来说,主要得记住象苏联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可能威胁到个人的自由。

另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是有关一种“终身学习”的现象,这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中越来越普遍。由于职业上的需要和要求是发展和变化的,现在已不可能象直到几十年前所能做的那样,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以毕业告终的受正式教育的时期,另一是接着立即开始的从事职业工作的时期。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在学校毕业后继续接受教育,这一现象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变动。在苏联和美国,继续接受教育以职业性和非职业性的学校和训练班的形式经历了最迅速的发展。随着这种发展,苏联社会正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同前面提到的空暇问题作斗争。空暇使人有时间学习,在这点上政府关于教育的政治愿望有可能同公民的教育要求相一致。一方面,人们的空暇为政府提供一个机会,通过成人教育计划培养统一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不应低估人们利用学习作为从智力上解放自己的手段的倾向。

可是，这些考察超出了我们探索的范围。高等教育是否带来更多的自由，后者是否会被用于同社会有关的目的，发展多元化知识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党对教育的意识形态影响是否受到限制，这些问题不在本文分析之列；可是它们已成为苏联社会的严重问题，其意义在今后这类研究中是不应加以忽视的。^①

^① 见安诺德·布赫霍兹：《为一个美好的世界而斗争》第2版（1962年斯图加特德文版）；乔治·帕洛兹-蒙瓦斯：《叛乱——这是事实》（1963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

从社会学角度看苏联经济政策的影响

卡尔·C·塔尔海姆

卡尔·马克思非常突出地强调存在于社会同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他在着重说明社会与经济这两个可变因素的相互关系时——这种关系在古典经济学说中只是有限地提到而已——给了我们一种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新的观点。今天苏联的科学就研究有关苏联本身的国情而言，几乎完全忽视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联系，尤其当我们想到苏联制度一直把马克思看作它的神圣的祖先时，这种情况实在令人吃惊。苏联学者在考察“资本主义”世界时怀着极端的偏见描述这些联系；至于自己的国家，他们现在才仅仅开始探索当前的社会现实。^①初一看，好象有点奇怪；仔细一瞧，即可发现今天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现实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当前的现实同苏联的神圣祖先的终极目标之间的这种脱节，主要是苏联的经济政策造成的，特别是斯大林时代的经济政策造成的。

俄国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社会力量和经

^① 的确，以经验主义为指针的、从社会学角度对苏联的考察近来已显著地盛行起来了。

相互联系的实例。这里我们不要忘记困扰过旧俄的四个未曾解决的社会问题：(1)俄国广大农民的悲惨状况，(2)迅速壮大起来的工业无产阶级的阴暗前景，(3)缺乏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和(4)俄国知识分子正在暴露出来的态度——一部分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四个未曾解决的问题汇集到一起，就造成一种潜在的革命形势，为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正是这次革命使俄国能够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理想，关于这种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曾有过描绘。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制订他们自己的计划时真正依据卡尔·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设想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许多人认为马克思的教导并不很重要。我根本不同意这个论点，并愿意提出(也许有点太武断了)相反的意见：实现马克思关于改造社会经济制度的思想恰恰就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目标。无论如何，事实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对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都进行了革命的改造。

我认为这一事实是关键性的，在西欧和中欧，资本主义带来的工业革命主要是由社会力量自然地引起的，虽然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上、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种种决定加速了这一革命；另一方面，在沙皇俄国，在苏联甚至更是如此，工业革命的发生是国家有意识计划的结果，可是在布尔什维克时代，我们必须记住：共产党总是天经地义地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表。我们还必须记住：在苏维埃帝国统辖下的各国，在中东欧、东南欧，同亚洲各共产主义国家一样，革命是用极端的暴力从上面强行实现的。

为了按照马克思的革命目标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制度，布尔什维克直接间接地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措施。采取的间接措施具有政治经济和财政的性质。在苏联制度下，当然不会有经营独立的经济的可能，因为经济是完全计划化的和集中指导的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按传统的西方标准应被看作是政治和经济性质的措施，在苏联却是根据社会政治的原因、而不是根据经济的原因才予以推行。在过去十年中，西方世界主要为了社会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已变得更加重要了。这里我想起了西方世界几乎每个国家的财政政策都越来越想达到非财政的目标。

除了使经济国有化和集体化的直接措施外，我想举出几个例证，说明基本上属于政治经济和财政性质的政策被用于社会政治目标的各种方法。其中首先是税收政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结束后，那些在新经济政策期间被允许存在和开办的私营小企业，主要就是通过使这些企业不可能继续存在的剥夺性税收政策而被悄悄地消灭的。了解德国苏占区情况的人对于冷酷无情的、精心策划的社会化政策是很熟悉的，在第一次国有化大高潮发生后制定的这种政策几乎可以同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结束后所采用的办法相匹敌。我们发现苏联在不久前又运用税收政策以达到社会政治目的。赫鲁晓夫在停止废除所得税的同时对所得税进行修订，使减税的全部效果只有利于低收入的人们，并且还减少属于中等和高等收入一类的职员的薪水，减少的部分相当于被废除的所得税额的一部分或全部，这样主要属于财政性质的一项措施就成为同社会有关的了。这是赫鲁晓夫企图用以缩小斯大林时代扩大

的收入差距的一系列措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个例证是利用信贷政策；当新经济政策时期接近尾声时，苏联的信贷政策正如后来在德国苏占区实行的一样，因涉及的是国营企业，或生产者合作社，还是私人企业而有所不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对由于社会政治原因必须予以消除的某些类型企业实行歧视。最后一个例证，就是对大、中、小农场运输货物采用不同的运费率；这种运费率上的差别同这些农场的经营效率没有什么关系，其真正的意图是要消灭大农场主。在这方面，德国苏占区又实行了同样的政策。

改造经济制度后出现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其基本轮廓是众所周知的。可是不幸，我们对于社会结构中的这些变化和在这个结构中人们的地位没有掌握什么特殊的材料。至少我们不能使用通常的科学研究的标准来确定已经发生的变化。我已讲过，对社会过程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在苏联还只是刚刚开始。然而，即使只是由于苏联有关社会发展过程的统计极端残缺不全，我们仔细考察这些原始的研究结果还是重要的。有关收入的增长和分配的情况尤其如此。结果，这种研究实际上提出的问题比它能解答的问题还要多。

苏联经济政策的哪些方面是同社会学有关的呢？我们显然能提出一长串这样的因素，但由于本文研究范围的限制，只容许我们着重说明从社会学角度看具有极端重要影响的那些政策因素。在我看来，苏联经济政策的如下七个方面似乎与此特别有关。

1. 生产资料的全面社会主义化或集体化。
2. 共产党对国家机构的控制并通过它的工作人员对组

织经济发生的相应影响。

3. 实行集中计划制度，其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需要设立一个庞大的机构，人们在其中得到其社会职能高度专门化的地位和工作；第二，它规定着经济的主要目标，这些目标是由那些在没有群众参与下决定着国家政治意志的人们提出的。

4. 决定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以便“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5. 重点发展工业。

6. 优先发展重工业。

7. 特别强调建立在社会学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大规模的巨型企业。

下述问题也同样与此有关：从社会学角度看，在决定苏联经济政策这七个方面的影响的因素中哪一些是重要因素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个人同社会的关系这个总的问题。第二，社会结构引起了用西方的社会学方法和范畴能对它真正理解到什么程度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并不要求解答。第三，关于收入的构成。第四，关于社会流动性问题。第五，关于象工人和职员这样的独特的社会集团的状况，对于职员我们必须区分办事员和技术员。第六，关于主要以工会为代表的社会团体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最后，关于经济企业的社会结构问题。

显然，这并没有包括全部有关的问题，因为还可以提出许多其他的重要问题。例如，从社会学角度看，苏联经济政策对家庭产生什么影响？妇女在如此广泛的经济领域里就业对家

庭产生什么影响？还有不属本文探索范围的有关统治制度同经济制度之间的联系等重要问题，更不必说有关政治社会学的问题了。总之，在目前这一阶段的探索中，我们只能对上面提出的问题给予部分的回答。

至于个人同社会之间的一般关系，我完全明白：在苏联的共产主义下，现在同以前一样，个人是完全从属于集体或社会的。问题在于这是不是苏联经济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我看来显然是的，在牵涉到财产关系时尤其如此；社会的完全社会主义化是突出集体主义的直接结果。“社会主义”财产是同私人财产水火不相容的；是同赋予个人最大限度自由这种正统的自由主义概念相对立的；这个概念同无产阶级最初要求解放、后来要求消除阶级差别似乎是完全不相干的。

关于自由的观念并未完全失去活力，但这是一个同自由主义学说所指的概念很不不同的概念。这里指的不是历来所谓的个人自由，而是阶级的自由，特别是摆脱阶级统治的自由。法国大革命曾错误地企图解决存在于自由与平等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冲突，后者（即平等）作为纯粹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似乎更重要得多。荒谬的是：今天的苏联社会在通向这一最终目标的道路上既没有实现自由，也没有实现平等，与此相反，却表现为极端缺乏自由和更大程度的不平等。近年来，德国苏占区在社会上突出了政治口号一类的东西。为了使残存的私商和手工业者乐于接受，断言国家干预和进入生产合作社是使他们有可能“从小我走向大我的步骤”，从而使他们免于沦为可耻的资本家剥削者。

肯定集体主义第一的结果，是普遍排除任何生产资料的

私人所有制，从而也排除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我所强调的是对这类活动的“普遍排除”。这是使共产主义区别于今天任何一种西方式的社会主义的特征。这种极端激进主义还表现在原先把最小的农民和工业企业组织成为生产合作社上。长期以来，它们正式地或习惯地被称为合作化的生产企业。它们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并被看作是“低级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以区别于“高级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如果曾经有过社会标准的判断的话，“高”“低”之分就是这样的判断）。但后来它们完全被收归国家所有了。近年来，苏联还把大部分商业合作组织转变成为国营企业，同时正如统计材料所表明的，建立国营农场（即农业方面的国家所有制）的工作势不可挡，正在取得进展。最后，表现在这些目标上的激进主义还可在某些文件中得到证明，这些文件力图限制集体农庄农民的私人经济活动。他们把这种私人活动说成是“辅助性的经济企业”。此外，政府还想方设法制止私人饲养牲口。赫鲁晓夫大大缩减这些小型“庄园”，虽然经验证明这方面的经济情况恰恰需要采取相反的措施，即发展私人企业，就畜牧业而论，尤其如此。^①生产畜产品的目标所以远远没有达到，部分因为这是私人经济最有把握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个领域。这一切似乎证实我的论点：意识形态在今天的苏联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的确，苏联的中央计划制订者不得不把共同的经济目标置于私人愿望之上。只是由于心理的或政治的原因看来是可取或必要的情况下，他们自然可能会考虑个人的利益。

^① 赫鲁晓夫下台后，这些限制又被取消了；但是，现在同过去一样，显然都没有想扩大自留地面积的意图。

苏联制度的中心目标是取得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这需要高速度的增长率，没有大量投资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意味着要削减供个人消费的物品数量。可是，这样做的结果是生活水平降低了。

苏联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如生产资料的全面社会化，计划工作的中央集权和经济的最大限度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曾经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实际提到过？我认为我们应该逐项区别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相对重要性。生产资料社会化显然是马克思学说的中心；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必然结果。但是有人可能会问：马克思是否真正想把个人借以生活，而不另外雇工的财产收归社会所有，例如，手工艺者或小农从事劳动并借以养活自己和直系亲属的财产？这里似乎不存在对抗，因为这类财产并不用来剥削工人。撇开这点不谈，生产资料社会化显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设想，这当然是正确的。

实行集中计划是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中引伸出来的。从马克思这种根本的批判中必然得出结论：必须用集中计划和对经济事务的指导来代替这种“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不能肯定马克思希望经济的最大限度增长要达到什么程度。至少可以说实行这个原则并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必然结论。但是所有这三个因素以下列方式联系在一起：如果一种经济制度是优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地认为他们想建立的经济制度正是如此，那么这种优越性将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圈子里体现出来，因为经济的飞跃增长被认为是管理人员进行领导的结果。所以，加速经济的

增长不仅因为它可以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或者因为这样的增长特别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是一种有用的宣传武器，而且也因为这提供了关于经济制度优越性的证明。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社会结构。上面提到的苏联经济政策的七个方面以某种方式促进了社会结构方面发生的变革。这种主要属于经济方面的变革是由工业化和旨在加快这一过程的其他措施造成的。工业化是一种具有最深刻性质的变革，它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影响并加以改造。当经济由于实行工业化而发生根本变革时，不论社会组织、政治或文化事业、甚至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没有不被触动的。

尽管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很少，我想从职业结构着手来说明在苏联发生的这些变革的深度。1928年，农业劳动者约占全体就业劳动者的百分之八十，这实际上要比1913年的数字（约占百分之七十五）高一些。五年计划开始后，工业雇用人数一个五年期间比一个五年期间增加，而农业劳动者占劳动队伍的比例1937年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五，1961年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七。农业劳动者人数比1928年下降了一半以上，这是一种惊人的变化速度。另一方面，把这些数字同西方先进国家比较，可以看出这种发展还没有达到它的尽头。美国只有百分之八的人口从事农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数字是百分之十一左右。人们很难设想，苏联将会完全赶上这两个国家，但目前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关于这一点——埃里克·鲍特契尔在《十字路口的苏联经济政策》一书中曾加以探讨——在我看来，这百分之三十七中有可供农业劳动以外利用的大量人力储备，这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确实，他们不可能马上被分派

去干别的工作，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农业的逐步机械化，他们将被其他企业吸收。

农业劳动人数的下降，同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经济部门就业人数的不断增长形成鲜明的对照。从1928年到1961年，工业和建筑业的就业者从百分之八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三；商业和饮食业的就业者从百分之三增加到百分之六；而在1913年，后者曾略高于百分之九。这方面的下降是苏联经济计划工作者长期忽视发展零售商业所造成的。作为工业化的必然的副产品，运输和邮政就业人员占劳动力的比例从百分之二提高到百分之七。最后，也是重要的一点，教育和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从1928年的百分之二猛升到1961年的百分之十二。^①

显然，这种大规模的职业重新分配具有巨大的社会学意义，因为在矿山、工业和铁路工作的工人所处的社会气氛是同他们所由来的农业环境完全不同的。除了长期经济计划带来职业结构的重新安排外，社会化和集体化的有关政策还改变了各种专业和职业的社会地位。经济社会化和集体化的结果，完全消灭了在西方国家里起着一系列重要作用的某些社会集团，而由其他一些社会集团取而代之。例如，今天苏联不再存在这些集团，如大地主、“资本家”承包商以及“独立的中产阶级”，即手工业（除某些微不足道者外）、小工厂（新经济政策时期曾经存在过）、商业和运输业的小业主。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这些恰恰是最适合个人从事独立经营的领域。第四个被完全消灭的集团是资本投资者；第五个集团是自耕农，但

^① 现有统计数字，由于统计分类的原因，很可能把这个集团的人数给搞错了。

有个别例外。^①与此相对照，合作化农民和合作化手工业者是在苏联出现的两个崭新的社会集团；的确，合作手工业者的重要性随着商业性的生产合作社改变为国营企业而降低了。合作化农民，即集体农庄庄员，在西方没有相类似的对手；这种类型的生产者合作社，在西方国家中如果存在的话，那也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工人今天成为苏联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苏联人仍然保留着“工人”和“职员”的区别，虽然这两个集团之间不再存在任何法定的差别。德国苏占区的情况同样如此。在这方面，1959年的人口调查，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苏联人口组成的综合数字。根据这一材料，1959年的就业总人数是九千九百一十万人；其中六千三百万人是工人和职员，而三千二百二十万人是集体农庄农民或其他农业合作企业的劳动者；三十万人是个体农民和苏联还存在的“非合作化”的家庭劳动者。既然个体农民只有十万人，那末一定有约二十万名手工业者，即商业性家庭劳动者或家庭手艺人。军队人数约有一百六十万。这样，在就业总人数中工人和职员正好占三分之二；这些数字当然不包括农业人口中在家里做辅助工作的家属。他们大约有一千万人。

这六千三百万人，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国家雇用的人员。我所能找到的只有三种例外：消费合作社雇用的不属于生产合作社的雇员，实际上为生产合作社工作的人数极少的雇员，和最后，少数私人家务雇用人员。从工人的社会地位来看，几乎每个人都受雇于国家这一事实是极端重要的，特别因

^① 在1959年普查以后，仍有九万二千自耕农。

为不存在着来自独立工会或者代表工人的其他组织的相抗衡的影响。国家既是雇主又是劳动法的制订者，正是由于这一点，工人的自由是非常有限的。

这是一个同经济的“社会主义化”有关的问题。从意识形态上说，社会主义据认为在把工人从资本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后给他们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可是实际上，社会主义制度把他们沦为附庸奴隶，其残酷性在市场经济体制内或自由的社会政治制度内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们甚至可能忽略这样的事实，即强制劳动尽管自斯大林时代以来已经大大减少，但仍然在苏联存在。^①这不仅是对人类自由的极为严重的侵犯，而且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原先的目标的最大的违反；这些劳改犯实际上只不过是“国家的农奴”。由于不存在着自治工会组织能够提供的保护，单独的工人发现自己单枪匹马地面对着几乎掌握全部再生产资料的国家权力，这样的现实意味着他的个人自由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

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分布发生深刻的变化。1926年，城市人口二千三百万，1959年上升到接近一亿，几乎占苏联人口的一半。人口平衡发生这种急剧的变化是苏联采取特殊形式工业化必然带来的副产品；因为居民重新定居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该政权优先发展大型工业企业所决定的，结果对人口统计发生了影响，它大大降低了出生率，并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

下面两个因素也具有社会学上的重要意义。第一，当大量不熟练工人被机器淘汰下来时，另外一部分劳动力正在接

^① 见迈斯纳所著本书中的“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社会变革”一章。

受补充的基础训练。然而这种训练并非总是同业务训练相等同的；自动化要求各种新形式的高度熟练劳动，它需要的并不是这样的业务训练，而是能够传授作出严密判断的技能和作出决定的能力，这远远超过从前对一个受过训练的工人的一般要求。第二个因素是职员人数的不断增加，这不仅是由于工业化本身，而且也是由于它的附带作用所造成的。工业化必然引起社会、政治和行政机构日趋复杂化，结果必然会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远远超过工业本身直接提供的就业机会。在苏联制度下，我们还必须考虑上述集中计划的影响。

这就需要有一大批工作人员在国家的中央机构里和企业里履行职员的职责，处理一系列无穷无尽的秘书工作、报告和统计资料，等等。

因此高速度工业化的结果，大大扩大了职员这一劳动队伍。根据苏联统计，从1926年到1959年，工程师、技术员和农学家的人数从二十六万七千人增加到四百六十八万三千人，教师从四十八万六千人增加到三百二十七万六千人，医生和医务人员从十九万九千人增加到一百七十万二千人，同时科学家从一万四千人增加到三十一万六千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因为这些数字是同我们从其他方面获得的有关社会发展的印象相一致的。

我由此得出结论，根据我的观点看来，这整个过程产生什么极为重要的社会学影响呢？这就是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的发展。这个阶级是由这样一大群人组成的，他们由于其社会经济地位而处于社会结构的最中心，虽然按照这个集团的收入来看，其中一部分人挣的钱要比上层产业工人少一些。

然而这并非苏联制度所特有的，西方世界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同样，按照他们的物质条件来衡量，许多工人也是属于中产阶级的。

职员人数的增长还没有到顶，苏联在这方面，特别是在服务性行业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今天美国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不到就业人数的一半；正是服务性行业的就业人数特别高。虽然苏联现在刚刚处在这个发展过程的开始阶段，但它显然是朝着类似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发展的。

在工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只有一小部分实际上属于上层阶级。他们是工业方面厂长一级的管理人员，在物质上远比工人群众要好。另一方面，虽然社会地位较高，但他们的前途相应地取决于国家和党，取决于他们完成国家计划的能力，很可能还取决于他们是否得到当前那些党的官员的宠爱。因此，他们尽管享有很高声望，但是非常不牢靠。

那末，我们一定要问：这个“社会主义厂长”集团发挥多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呢？当我想到利别尔曼建议讨论的结果时，我倾向于认为，这种影响是比较小的。在这些讨论中，经济工作人员几乎完全站在利别尔曼和与他意见一致的经济学家一边；但是政治领导人从这些讨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直到现在只在非常有限的基础上得到贯彻。这表明这个集团所能发挥的政治经济影响是相当小的。^①

^① 1965年10月4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关于社会主义国营生产公司的法令”。改革者的建议通过这项法令得以实现，但执行法令时异常小心谨慎，照作者的看法，这说明狂热拥护把更大的决定权移交给工业的那些厂长们的影响不会很大。

关于收入的结构，下列六点看来是重要的：

1. 在苏联几乎不存在不劳而获的收入；实际存在的不劳而获的收入（例如，储蓄、银行存款和公债的利息）对这个社会结构来说是很不重要的。

2. 积累财富完全是国家的职责（如果我们可以撇开那些象住房之类的耐用消费品的话），而不是私人的事情。国家积累财富的速度很高，可是结果，一般生活水平则很低；这里不存在着积累财富的私人财产所有者。我相信在今后同苏联共产主义发生的任何争论中，这两个因素都会成为极重要的议题，特别因为不劳而获的收入，长期以来已经受到攻击。

3. 经济增长政策和斯大林时期开始的不惜任何代价加速生产的努力，使收入分配方面发生重要的差别。

4. 高速度增长迫使广大群众大大降低他们的消费需要。而且他们的收入仍然远比工业发达国家低，甚至比在苏联采取另一种经济政策（一种并非不惜任何代价追求最大限度经济增长的政策）可能得到的收入低。

5. 按照我的看法，苏联人为了超过他们的计划指标——至少象现在他们在寻求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那样，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这个运动要到1980年才达到高潮——而作的努力，迫使他们遵循根据工作成就分配报酬的原则，从而造成收入上的巨大差别。

6. 赫鲁晓夫试图用提高特别低的收入和稍许降低最高层“社会主义管理人员”的薪金来缩小收入的差距。^① 然而我

^① 见迈斯纳写的“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社会变革”那一章。

相信,为了增加经济生产,任何缩小收入差距的努力都只能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有关这种收入的差距问题,赫鲁晓夫(斯大林更为突出)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而抛弃原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样说实际上是不会错的。^①让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在其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极力主张的论点:在社会主义下,要实行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下,则实行按需分配。这仍然是今天苏联共产主义实行按工作成就使收入发生很大差别的真正的依据。我相信,当马克思于1875年宣布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时,他的确没有预计到收入差距会发展到象苏联斯大林时期那样悬殊。

我们有必要对社会地位可变性问题说几句话。全体居民中很大一部分群众,不论其社会出身和父母的物质地位如何,都有机会使自己的社会地位显著上升,这无疑是苏联制度吸引人的突出特点。这方面有三件事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老的领导阶级消失以后必须有人前来接班;第二,1928年以来推行经济增长政策提供的机会;第三,教育政策。据我看来,共产党领导人社会出身的变化特别使人感到兴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那些“老兵”),除很少几个例外,都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相比之下,今天的领导人则大部分是无产阶级或者农民出身。

以下是几个看来与此相关的问题:某些领导岗位上需要的人员是否已经得到满足?计划拟增加的人员曾否大量削减?巩固一个新的上层阶级的存在(且不论由于尽可能依据世袭制为上层阶级补充成员致使社会地位上升受到阻碍),对飞黄

^① 这丝毫不涉及许多西方国家所倡导的斯大林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形象和赫鲁晓夫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的形象。

腾达的机会曾起过什么影响？

据我看来，除了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以外，关于社会集团的状况还有两点特别有关。第一是社会保险问题。人们很难争辩说，苏联经济制度为个人提供比市场经济可能提供的更大程度的社会保险，如果个人保障是靠牺牲个人自由获得的话；果真如此，那末，代价的确是非常高的。另一个有关之点是关于社会声望问题。所有宣传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工人和农民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工农国家”里；这样的信念现在确实完全成为字面上的观念了。^①因为苏联不再是一个工农国家；反之，它已变成一个官僚国家。社会声望现在完全同称号、职衔和勋章连在一起，例如，人们可以指出，就某些特殊的职业集团的标准而言，技术员的社会声望要比商业部门职员的社会声望高得多，他们收入的高低不同特别突出了这一事实。

最后，关于社会团体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得说几句。首先是工会。布尔什维克统治初期，工会还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但是在斯大林统治下它们完全失掉了独立性，今天这方面的情况看来没有什么改变。工会没有自治权，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从属于共产党的。结果，工会的任务也完全改变了，工会不再是工人的联合组织，后者的首要和实际上唯一的目的（至少在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本来是为了改善工会所代表的人们的境况并改进劳动条件的。苏联工会首先是实现国家经济目标、完成国家计划、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工具。工会只不过是国家伸到经济管理领域中的手臂，这样的说法

^① 见迈斯纳写的“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社会变革”那一章。

并非言过其实，这里我想起了列宁关于输送带的著名言论。工会在这些新职能方面得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有些表现在对整个社会保险计划的管理上，有些表现在工会执行委员会的职能方面，等等。

据我看来，产业部门的社会结构在斯大林时期以后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现在和从前一样，产业部门是在一长制原则统治下的，所谓一长制，是指由国家任命的一位业务负责人实行绝对控制。当然，这位业务负责人发现自己面对着党组织和工会执行委员会两个集团的争夺。可是这两个集团同一长制发生的争夺并非表现在，例如工会执行委员会面对着计划经济目标，首先会以代表工人社会利益的面目出现。赫鲁晓夫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建立新的机构以便共同作出决定，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这里我们指的是“定期生产会议”，加强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还有赫鲁晓夫1962年11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提到的生产委员会。虽然说的说了，做的做了，可是产业部门的独裁机构丝毫没有为这些规定所触动；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苏联的社会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党和党的经济目标，尤其是党争取经济和生产率最大限度增长的努力。对于苏联共产主义来说，实现经济最大限度增长的目标，比消灭社会阶级差别的经典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更加重要得多。按照新的党纲，一个“平等社会”看来是未来的希望和前景；然而我认为这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因此，尽管工人的处境发生许多变化，有了很大的改进，

可是苏联的社会现实的发展,即使在斯大林时期以后,却偏离了早期社会主义制度预期的道路;通常是以马克思 1875 年的声明来为这种脱节辩护,马克思在这个声明中宣称,在社会主义第一阶段,起支配作用的是按劳分配原则。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增加经济生产的政策——人们可以说这纯然是一种真正的辩证发展——则使一个远远不同于沙皇俄国的现代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现在我们可以记录下这个成熟的工业社会开始提出的要求了。例如,特别在七年计划开始以后,住房建筑已经以比从前要大得多的步伐在进行;这似乎是正在发生变革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后果之一,特别是广大中产阶级不断增长带来的后果,对他们来说,令人满意的生活场所是最重要的社会需要。部分为了形式的和宣传的目的而对改善社会状况不断作出努力,看来这表明,在苏联经济政策所建立的现代工业社会同对这个社会尚不适应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脱节现象。正是这个因素,对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